

美国研究

季刊

AMERICAN STUDIES

1992 年第 3 期

第 6 卷

9 月 5 日出版

面临挑战下的经济调整

陈宝森 (4)

——1992 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评介

核裁军的进展

吴展 (12)

美国安全战略向何处去

宋久光 (18)

是提供援助, 还是袖手旁观

时殷弘 (25)

——论美国援助南斯拉夫的开端

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期间美国的台湾政策

郑永平 (35)

美国总统幕僚与阁员的权力消长

袁瑞军 (44)

对美国主流文化的挑战

沈宗美 (54)

平庸与浪漫

赵梅 (69)

——读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

本期责任编辑: 赵梅

编辑出版

中华美国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照排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印刷装订

北京仰山印刷厂

发行、订阅处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刊号

ISSN1002-8986/CN11-1170 / C@

国外代号

Q1122

国外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 399 信箱

定价:

国内版 3.00 元

国际版 3.00 美元 (邮费在外)

AMERICAN STUDIES

Autumn 1992

Vol. 6, No. 3

CONTENTS

COMMENTS ON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1992*

Chen Baosen (4)

U.S. economy is faced with serious challenges at present.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1992*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to meet the challenges and to carry out economic readjustments. It reflects the features of pragmatism and steadiness in the economic policy of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The accomplishment of the readjustments, however, will rely upon concerted actions based on bipartisanship.

PROGRESS OF NUCLEAR DISARMAMENT

Wu Zhan (12)

During the last decade, the U.S.-Soviet/Russian nuclear arms control has undergone changes from limiting the quantity of nuclear weapons and preserving the status quo to real and substantial reduction of those weapons, from limitations on an equal footing to unequal cutting, and from difficult negotiations amidst mutual suspicion to successful agreements. All these changes have come about on account of the softening of position on the part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Russia at present caused by economic failure.

WHERE IS U.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HEADING FOR

Song Jiuguang (18)

To get adapted to the post-Cold-War world situation,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has undergone requisite readjustments. Nevertheless, they are mostly shifts of policy priorities rather than changes of the fundamental framework of the strategy. This means that the continuity of that strategy has not been broken after all.

GIVING AID OR JUST STANDING BY: THE BEGINNING OF U.S. AID TO YUGOSLAVIA

Shi Yinhong (25)

Judging from U.S. policy toward Yugoslavia after early 1949, the United States dealt successfully with the dilemma in its policy toward Yugoslavia after the Soviet-Yugoslavian split. This was due to the maintenance of a sensible balance among basic geopolitical strategic interest, indirect strategic interest and ideological interest.

U. S. TAIWAN POLICY DURING THE SECOND TAIWAN STRAIT CRISIS

Zheng Yongping (35)

This essay reviews the American policy toward Taiwan and the Offshore Islands in 1958. It points out that the measures taken by the United States were aimed at containing the military operations by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ommunists over the Taiwan Strait with limited U.S. armed involvement, and thereby separating Taiwan from the mainland.

THE POWER BALANCE BETWEEN THE WHITE HOUSE STAFF AND THE CABINET MEMBERS

Yuan Ruijun (44)

In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White House staff and the cabinet, the status and role of the president's staff are steadily growing and becoming the primary force that the president can rely upon. This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helping the president fulfill his duties more effectively, but at the same time poses worrisome problems to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ystem because the internal power structure within the executive branch has been seriously shaken.

CHALLENGES TO THE MAIN STREAM OF AMERICAN CULTURE

Shen Zongmei (54)

The values on which the whole system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founded has been confronted with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For instance, changes in the content of college courses and in the social backgrounds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the inversion of the value system all indicate that the character of American society is undergoing a drastic transformation.

NOTES ON *THE GREAT GATSBY*

Zhao Mei (69)

If considered only in the general sense of the "American Dream", Gatsby, a hero in F. Scott Fitzgerald's novel, has his dream realized after having built up his huge wealth by personal efforts. Yet to Gatsby, the eternal dream of humanity – the dream of love – has been shattered.

AMERICAN STUDIES, a quarterly, is published jointly by the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American Studies, and the Institute of American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he content of the articles in this journal should not be construed as reflecting the views either of the Association or the Institute.

面临挑战下的经济调整

——1992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评介

陈宝森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一年一度的美国总统经济报告是美国经济形势和政府政策的一面镜子。尽管价值观和政治需要常常会使真实情形受到某种扭曲，但只要细加剖析，仍然不难窥其底蕴。1992年是大选年又逢经济萧条，选民们对布什总统的国内政绩颇多非议，报告自然要作一番辩解和回答，这就为我们提供了认识美国经济现状和问题的绝好素材。

挑战与回答

布什总统开宗明义就提出“美国面临严重经济挑战”的问题。挑战从何而来？复苏乏力，人民不满，是其来源。报告是这样描述复苏的曲折道路的：“春天的确出现过温和的扩张。工业生产和消费者开支有过几个月的增长，然而到了夏末，经济表现平平，后来几个月更陷于停滞。”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白宫认为这是宏观经济不平衡，决策失误和外部冲击的一种不寻常的汇合。按白宫的说法市场经济通常是能适应这类事件的。但如果各种事件汇合在一起，“自我调节机制不足以支撑整个经济的增长”而“生产率又上升缓慢，缺少减震器来吸收掉市场为不滑入衰退而自然形成的调整”，那么这种局面又是难于避免的。

报告列举了过去20年积累起来的，约束当前经济增长的四大结构性问题。

首先是人口趋势。家庭的增减对住宅、汽车和家用电器的需求有很大影响。婴儿景气时代，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已近尾声。近年来对住宅、汽车以及其他耐用品的需求下降，部分地反映了这种趋势。在60年代家计单位（Household）年平均增长1.8%，70年代2.5%，1983年到1989年1.7%，从1989年到1991年下降到0.8%。商务部中期预测从1990年到2000年家计单位的增长率为1.3%，高于近几年，但低于近几十年。家计单位增长放慢必然要影响消费需求。

其次是私人债务的积累。在1982—1988年的扩张期，私人债务比个人收入增长更快。家计单位借钱的年增长率为12%，而个人收入只增长7%。同样，公司债也以11%的年率增长。及至扩张结束，许多消费者积累了相当高的债务。与此同时，他们拥有的最大资产——住宅却不涨价或降低，以致房屋所有者对他们房产净值持续上升的乐观预期未能实现。从1984年到1989年，房主拥有的住宅和土地的价值以7.5%的平均年率增长，即以相当于通货膨胀率两倍的速度增长，可是在1990年却下降了1.6%。整个家计单位的资产净值在1990年下降了1%。人们手中持有的财富价值下降了，对借债就要小心谨慎，消费信心也随之下降。

再次是金融业的失衡。储蓄与放款协会的危机给金融业以沉重打击。除此之外，其他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平衡也面临困难。这是因为商业性房地产的价值下降，许多大银行还背着第三世界国家的债务包袱。结果银行家们对放款变得更加谨慎。这种谨慎也反映为在经济增长放慢之后对贷款盈利的信心不足。与此同时银行的管辖政策也起了一些副作用。鉴于过去

的教训,严格监督是必要的,但有些稽查人员竟发展到不鼓励金融机构从事有利可图的放款。此外1988年主要工业国在巴塞尔达成了协议,要提高资本对风险资产的比率,也促使一些银行减少放款,以便把自己的资产转为比较可靠的国库券和其他政府证券。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都对过于紧缩的信贷供应或“信贷困境”起了作用。银行的工商业放款在1990年增长放慢,1991年下降4.8%,这是自1975年下降3.8%以来第一次下跌。

最后是国防费的削减。80年代的多数时间里国防费都在增长并对经济的上升起了推动作用。到80年代末,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国防费由第一优先变为削减对象,它的影响随处都能感受得到。从1979年到1987年实际国防采购上升60%,但从1987年到1990年下降4%。在联邦支出中国防费从1979财政年度占23%,到1987财政年度占28%,但在1991财政年度则下降到21%。国防的收缩还要继续,并已影响国防部的就业以及国防工业的就业,这种调整非一朝之功,也不能没有代价。在国防工业集中的地区,经济将受到很大干扰。

除去上述四大问题,白宫对联储的金融政策也有所批评,认为在过去几年联储通常保持相对紧缩的金融政策,以求达到稳定物价的目的。这种努力抑制了通货膨胀,但也成为过去三年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报告认为“作为回顾,金融政策应当更早、更快实行低利率”。

上述分析是布什政府对反对派的回答。对布什经济工作的攻击既来自民主党,也来自前总统的经济班子。他们都把出现当前经济困难的责任推给布什。布什政府则要说明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很多问题在80年代已埋下了种子,里根政府和联邦储备委员会难逃其咎。

迎接当前经济挑战的对策如何呢?报告提出了促进经济短期增长必须与中长期目标相一致的思想。换句话说,布什政府认为一切只顾眼前的短期行为是不可取的。

报告提出美国政府要解决的长期经济问题是促进这个国家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即每个工人小时产量的增长。美国目前在生产率方面仍然是世界冠军,比其他工业化国家平均高20%,但后者在近几十年中却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美国1973年至1981年间劳动生产率的成绩最糟,此后虽有回升,制造业并有较好的表现,但欧洲和日本由于有较高的储蓄率,所以通过投资缩小了在劳动生产率方面同美国的差距。

报告强调生产率的增长取决于资本投入、工人技能和科技进步。认为美国不能对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基本状况自满自足。没有足够高的生产率增长将不能满足民众对生活水准提高的期望,也不能继续保持超级大国的地位。

布什政府以长期生产率增长为目标的政策有五项原则,即:(1)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为此要鼓励企业精神和储蓄投资,并继续降低持续多年的结构性预算赤字;(2)促进经济增长的贸易政策,要求开放全球市场;(3)不增加企业和消费者负担的管辖政策;(4)突出教育、培训和预防性保健的人力资本投资政策;(5)保持低通货膨胀和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并为扎实的实际经济增长提供足够的货币与信用。

报告提出了短期刺激经济复苏和长期促进经济增长的两套措施。

短期措施包括:(1)修改联邦预扣税率,对纳税人少扣钱,在今后12个月里把250亿美元投入美国经济;(2)指示联邦各部加速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消费,在今后6个月中给经济增长额外投入100亿美元;(3)在90天内由联邦各部全面审查一切新旧规章制度,废除有碍经济增长的规章;(4)消除银行放款的关卡,使勤劳、负责的工人和商人能获得银行贷款;(5)对投资实行15%的税收减免,鼓励商界加速投资;(6)修改最低选择税,简化并放松折旧提存;(7)允许第一次购买住宅的美国人从个人退休帐户中支取储蓄而不罚款,并为第一次购买该住宅的人提供免税5000美元的优惠;(8)降低资本收益税率;(9)提高所得税个人豁免额;(10)对学生借款的利息实行课税扣除。

长期措施包括:(1)鼓励研究和开发,为此实行的税收减免政策长期不变;(2)实行2000年教育战略;(3)打击犯罪和贩毒;(4)实行综合职工培训计划;(5)全面改

革健康保险；（6）为“希望”住宅计划拨款；（7）控制联邦赤字；（8）实行银行改革；（9）加强家庭纽带，减轻抚养儿童的负担。

在此基础上报告对经济前景作出了预测。一种是实行布什建议后的前景，预计1992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将增加2.2%，1993—1995年为3%，1996年2.6%，1997年2.8%。另一种是布什建议被国会拒绝后的前景，在此情况下1992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将增长1.6%，以后几年在2.4%、2.5%、2.6%之间摆动。这样布什就把球踢到国会的大门前。

布什政府强调促进复苏不应损害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目标无疑是对的。实际上在美国联邦政府财力拮据的情况下也没有可能搞强有力的短期刺激。所以人们认为布什的一套短期措施零敲碎打，对刺激经济复苏，作用有限。更重要的问题是布什政府虽然提出了抓劳动生产率的长期战略目标，却对控制财政赤字提高总储蓄率没有找到有效办法，还是停留在1990年12月同国会达成的减少5000亿赤字的协议上，而这两年的经验已经证明这个协议对控制赤字是远远不够的。不解决财政赤字和储蓄问题，增加投入提高劳动生产率也就成为空谈。

关于美国劳工市场

既然美国所面临的长期问题是加速提高劳动生产率，那么考察美国劳工市场寻找劳动生产率增长放慢的原因就很必要了。

报告说美国劳动生产率目前在世界上仍然是最高的。在1990年每个美国工人每年平均提供价值45918美元的商品和劳务，比日本高25%，比德国高35%。

但是报告承认近年来美国工人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是放慢了。据史料记载，1889—1937年美国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每年增长1.9%；1937—1973年每年递增3%；1973年以来每年只增0.9%。

生产率的增长为什么会放慢？报告认为首先是由于资本积累放慢。数字表明，1959—1973年，每个工人装备的资本在私营部门是以2.4%的年率增长，当时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是2.8%。1973—1989年每个工人装备的资本以0.8%的年率增长，这时劳动生产率的年增长率是0.9%。大数定律说明工人的资本装备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劳动生产率可以提高1/4或1/3个百分点。这个假说同所发现的不同国家投资率与生产率增长相关这一研究结果是一致的。近几十年在主要工业化国家中美国的投资率最低，它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也最慢。在1971—1980年间美国总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9%，在1981—1989年间是18%。同期日本的数字是29%。从1950年至1979年间，在工业国的“七国集团”中，美国每个工人资本装备的增长率是最低的，而且设备陈旧。1979年美国当时的资本装备比日本陈旧73%。报告认为这些数据说明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放慢的主要原因要从资本市场上去找，而不是从劳工市场上去找。要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就必须提高投资率，布什在这里找到了降低资本收益税的依据。

报告认为创新或技术进步的速度也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决定因素。谷仓和推车再多也不能提高今天的生活水平，只有新生产方法、新产品、新组织方式和新的信息手段才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率。创新要求把资源投入新产品开发和加工中，并改变生产组织。政府可以用各种方式推动创新，从支持基础研究到保证税法不挫伤创新活动。报告认为在私人投资者难以获得新知识全部利益的领域，政府对鼓励创新能起特殊作用。

报告认为劳动队伍的质量或者说个别工人的生产能力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第三大功臣。“人力资本”这个名词说的是知识储存和工人具有的技能，有时也被用于类比机器设备的存量。经济学家一般都同意人力资本的存量是生产力广泛而重要的源泉。在其他条件相等时，

人口受教育的水平越高,每个工人的生产水平就会越高。然而生产技术并不完全与在课堂上接受教育的年数相关。讲授的高质量和内容的适宜性也是重要因素。此外,近年来人们很关心建立一种使学生为未来工作场所的需要做好准备的教育制度。布什政府宣称他们已把改善全国教育制度列为最优先考虑的事项。

近年来美国工人实际工资下降,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对此布什政府从两个方面做了解释。其一是就业人数的迅猛增长。报告说尽管在衰退中受到暂时挫折,从1971年到1991年这20年中,美国的职工队伍仍从7100万人增加到10900万人,共增加3800万人,增长53%,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了大多数其他主要工业化国家。日本同期增加的就业人口只相当美国的一半,德、法、英等国不及日本的1/5。可以这样设想,如果有一天一个只有100人的工厂突然增加53个新工人,那对这家工厂肯定是一种沉重的压力,它不会不对工资的下降发生影响?

其二是劳动生产率的下降。报告说自1959年以来,美国工人的平均实际小时工资增长了69%,如从1973年起计算则只增加了11%。后一阶段之所以放慢主要反映了劳动生产率的下降。报告认为比较同一时期私人企业劳动生产率和实际小时工资各自的增长率就可以看出两者的关系。从1959年到1973年劳动生产率以平均每年2.8%的速度增长,而实际小时工资则以2.9%的速度增长。1973年以后劳动生产率以每年平均0.9%的速度增长,而实际小时工资则以0.7%的速度增长。报告还引用了日本的材料说明工业化国家的共同趋势。

但是这两种解释都是缺少说服力的。因为实际工资下降是一个分配问题,只有从国民收入分配的角度考察才能判断是非。而国民收入分配的核心问题是工资和利润各自的份额。根据报告397页和346页提供的数据我们可以把时间分为三段进行比较。就制造业公司税后利润率说1959—1968年10年平均为11%,1969—1978年10年为12.3%,1979—1988这10年为12.5%,呈逐步上升趋势。再看这三个10年的工人实际小时工资,1959—1968年为7.27美元,1969—1978年为8.27美元,1979—1988年为7.79美元,80年代比70年代下降5.8%。这说明80年代资本家利润率的上升是以牺牲工人的实际工资为代价的。

关于工人工资同劳动生产率的关系,我们从美、日、欧的比较中倒是可以看到一种同报告论断相似,但说明不同问题的另一方面。美国80年代就业人口增加了2012.3万人,其中91.1%从事服务业,不过这个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只增长了0.4%。日、欧等国在80年代服务业的新增就业远比美国少,不过他们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则提高了2%。这是因为,他们对服务业进行了设备投资,每个工人拥有的固定资本增长速度比美国快一倍。日、欧的资本家为什么愿意进行设备投资呢?因为这些国家工会力量强,对服务业有最低工资标准,靠压低工资扩大服务业就业的路走不通,所以他们情愿用机器取代工人。相反,美国服务业极力压低工人工资(美国服务业工人工资只相当制造业工人工资的67%,而日本是93%,德国是85%),雇主愿意多雇工人少用机器。这样美国服务业就成为制造业失业工人和新工人的蓄水池。可见80年代美国的高就业率是以服务业的低工资为前提的。布什政府为美国就业率高过其他国家而自豪,殊不知它是以压低服务业工人工资为代价的。

关于收入水平和分配

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在美国仍然是公众所关切的问题。一般认为60、70年代的经济政策虽未能根本解决问题,但确使贫富差异有所缓和,而80年代的政策又使情况发生逆转。90年代和布什政府的政策究竟如何呢?这也是报告试图回答的问题。

报告认为政府的各种再分配计划对缓解贫富悬殊是起了作用的。报告说据统计局估算,

联邦、州的税收和转拨款项为20%，最底层收入家计单位提高了8800美元，即从2100美元提高到1.09万美元。最上层20%家计单位所付税款和转拨款项相抵多付2.2万美元，使他们的收入由9.4万美元下降到7.2万美元以下。报告承认尽管收入和转拨款项长期增长，贫穷仍然是美国的一个严重问题。社会能够也应当为那些不能供养自己的人提供最低水平的支援，而从长期看对一般贫困状况最有效的纠正办法是持续的经济增长。为了证明这一点，报告引用了历史数据。它说在1967—1969年间中位家庭收入急剧上升，在1969—1970年经济衰退时期收入停滞，在1971—1973年经济扩张期又上升。在第一次石油危机后1974—1975年的衰退中又下降，直到1979年收入重新上升。然而70年代后期的高通货膨胀和后来1980年和1981—1982年紧密衔接的两次衰退又把收入迅猛地压了下去。1982年中位家庭的实际收入低于1973年。从1982到1990年，中位家庭收入约增加3300美元或10.4%。这说明收入的增减和经济的紧缩或膨胀是密切联系的。

报告按现金收入的多少把所有家计单位分为五等，每等为户数的20%，然后考察其收入的变化。结果发现1967—1990年最高一层收入增加了35%，最低一层增加25%，中间一层增加17%。不过报告认为低收入层的改善情况被低估了，因为只计算了货币收入，没有计算实物收入。

报告还用基尼系数的统计方法研究了家庭收入的分配状况。根据这种方法如果基尼值等于零，家庭收入的分配最平等，如果等于一，则家庭收入分配最不平等或者说等于把所有收入归于一个家庭。在采用这种统计方法分析历史数据之后发现在1947至1968年间家庭货币收入的基尼值是逐渐下降的。自此以后基尼值缓慢而稳定地上升了14%。不过报告强调基尼值的上升并不说明贫者越贫，富者越富，而只是说明最高一层家庭收入的增长最快而已。

尽管人们的收入和政府的转拨款项是不断增长的，但贫穷仍然是美国的一个严重问题。报告对此是确认无疑的。根据官方的统计，美国的贫困率（按人）曾从1959年的22.4%下降到1973年的低点。在整个70年代起伏不定，然后从1978年的11.4%急剧增长到1983年的15.2%，1989年再下降到12.8%，1990年再上升到13.5%。不过报告认为官方贫困线没有把实物补助计算在内。

美国的安全网通常是指用于保证不能为个人和家庭提供最低生活标准的穷人而实施的政府计划 and 政策。家庭生活调查项目（它与社会保障项目不同是由财政拨款用于家庭救济的，因此必须做家境调查）是其中的核心部分。在1978年至1982年间联邦和州用于这个项目的开支是下降的，但从1967年到1990年则增长了300以上。1990年在此项目下的开支为每个穷人5160美元，大部分用于医疗救助。

报告特别指出了贫困化领域几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首先是儿童问题。儿童在美国比任何其他年龄组有更高的贫困率。1990年在所有儿童中约有20%生活在穷人家，黑人儿童则要占45%。对儿童的高贫困率有一种解释是单身妇女当家长的家庭的增长。生活在单身妇女家庭中的孩子从1970年的11%上升到1990年的22%。1990年半数以上的穷孩子生活在单身妇女当家长的家庭。贫穷和经济的不安定对孩子的成长有消极影响。在穷人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孩子死亡率更高，体重偏低并且在学习与健康等问题方面有更大风险。社会安全网在很多情况下不能直接帮助孩子而常常必须经过孩子的父母。布什政府主张通过教育来解决问题。

工作中的穷人是另一组需要特别给以关注的人。大多数工人家庭并不贫穷。1990年有一个就业人口的家庭其贫困率为7.5%，而全日、全年工作的工人家庭贫困率为3.1%。然而工作并不总是迅速脱贫的办法。1990年60%的贫穷家庭中至少有一名就业工人，有20%的家庭中有一个全日全年工作的工人，不过一般都是较大的家庭。

税收和转拨款项用食物券、医疗援助、儿童看护援助以及工作所得课税减免等方式对低工资的工人家庭提供帮助。工作所得课税减免降低纳税义务,并按减免额得到付款。基本减免率由1990年的14%提高到对有一个孩子的家庭减免23%。到1994年提高到对有两个或更多孩子的家庭减免25%。最高减免额将由1990年的953美元提高到1992年的1300美元和1995年的1900美元以上。

无家可归者是美国另一个热点问题。这种人的确切数字说不准。1987年某星期所进行的广泛调查把这个数字定在50万至60万之间,不过在某一年的某个高峰点上可能是它的两倍。

城市住房市场的变化常被引用为无家可归的重要原因。房租、地价的上升以及商业区的复原常使低收入人口失去立足之地。为单身汉提供的寄宿舍在许多城市已消失。在许多地区控制房租,建筑法规规章以及划区规章也减少了低收入房租的存量。刑满释放者不正常的心理、吸毒和配偶虐待也是无家可归的原因。

布什政府对解决这些问题提出了计划,但许多措施有待国会立法。能否落实,尚难预料。

报告关于经济增长是解决贫穷问题根本办法这一论断是以新保守主义“利益逐层渗透”的理论为依据的。但是最近有一派美国学者已经用统计数字对这种论断给予了反驳。他们认为尽管大部分战后时期特别是60年代经济的的增长的确使贫困率下降了。但是“80年代的涨潮却对贫困发生率很少影响”。他们比较了1963—1969和1983—1989两个经济扩张时期,发现生产的增长、通货膨胀以及失业的下降都很相似,但60年代贫困率下降7.4%,80年代只下降2.4%。学者们认为对此既不能用人口原因如单身妇女当家长的家庭增多作解释,也不能用增加了食物券、住房补贴作解释,因为在80年代这一类实物补贴并没有增长。根据他们的判断,问题发生在低收入工人的实际工资在80年代的下降上。这使许多工人在贫困的泥淖中不能自拔。恰在此时处于收入阶梯顶端的人却大得好处。这一派学者的结论是“一个扩张的经济不再是使我们变得更富裕时减少贫困的良药”。

关于改革规章倡议

30年代为挽救大危机而制订了限制竞争、稳定经济的许多规章制度,到70年代已有不少不再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改革规章、放松管理的呼声日高。到里根时期更加否定政府干预和规章制度的作用。“政府不解决问题,问题就在政府自己”的名言就是里根提出的。80年代许多方面的管理大大放松,于是又发生了储蓄与放款协会危机和商业银行困境等问题。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使布什政府必须重新估量规章制度在经济中的正反作用,纠正里根时代对规章制度的偏激作法。

布什在重申放松和减少市场管辖的一贯立场之后,提出了一项改革规章倡议。它的要旨是在需要政府进行直接干预时,采取的方法必须使用并还原市场力量,而不是对产品价格实行官僚主义的控制,以便让市场保持其灵活性,并鼓励对经济资源的最佳利用。

报告强调竞争性市场有三个重要优点。第一是竞争纪律鼓励有效的生产;第二是竞争性市场保证生产性资源的最佳利用;第三是通过竞争对消费者的需求可以作出适应性调整。因此政府的一种作用是建立有利于竞争的制度框架,在市场不能良好运行时建立以达到接近竞争结果目标的规章制度。

报告认为建立规章的目的之一是纠正市场缺陷或“市场失灵”。公司之间不完善的竞争是一种市场失灵。在“自然垄断”的产业如城市供电,其特点是只要有一家供应商就能最有效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因此限制竞争者的数目同时管制价格就很必要。

建立规章的第二个理由是存在“外部影响”或对第三方的影响。当人们不考虑他们行动

对其他人的影响时就发生了外部影响。例如一个供应商往河里倒污染源而不考虑对下游渔民的损害时制订规章就很必要。不过一种外部影响可能对第三方有利而不是有害。信息是一个重要的例子。但有时生产者感到提供信息成本大于收益而不很积极,这时就要政府干预,如由政府要求生产者必须对食品、药物、家用电器提供使用说明。

为纠正市场缺陷而制订规章制度的典型事例是反垄断法。联邦政府通过司法部的反托拉斯局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执行反托拉斯法。这些机构首先对不利于开展竞争的兼并以及合谋抬高价格的行为进行干预。其次对价格和竞争的管理,主要对象是自然垄断部门如城市供电、供水、供气、电话网络等等。作法是划定区域,限制经营者的数目,然后管理其价格。第三对环境保健和安全进行管辖,目的在于克服上面所定义的“外部影响”。

政府管辖在三种情况下会遇到问题:第一,难于确定谁以及在什么程度上受到外部影响的伤害,如空气污染和有害物质污染;第二,政府管辖给第三者造成无意的损失,如药物管理局在对有效药物检验期间可能迫使患者不得不使用较少疗效的药品;第三,政府管辖能使一个利益集团得益而使另一个利益集团遭受损失,并导致收入的再分配,但不一定都合理。

布什政府的改革规章倡议主旨是使联邦管理机构在法律范围审查现行规章,加速取消不必要的或不利于经济增长的规章。审查的目的是:(1)修改(或者对不适宜的地方加以取消)成本明显超过效益的那些规章;(2)保证以可能的最低成本实现管理目标;(3)保证现行规章在可行的范围依靠市场力量而不是实行指挥和控制;(4)保证规章对被管辖的对象具有明确性和确定性。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要求政府在90天内不颁发新规则(有法定最后期限的、促进经济增长的以及对保健和安全至关重要的规章除外),以便集中精力对现行规章进行评估。

不过对于布什政府来说,如何管辖金融机构仍然是一个难题。80年代对金融机构监督大撒手的弊端已充分暴露,所以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管理是政府的当务之急,为此布什政府已强化了对商业银行和储贷协会的监督,对银行保险基金补充了资本,但是由此又导致了金融紧缩,使经济复苏受到阻碍。为了表明解决这个问题的决心给企业吃定心丸,布什宣布他所提出改革规章倡议的第一个行动是增加给企业和消费者能得到的贷款和资本。由此可见如何保持市场竞争的优点同时又发挥政府管辖的合理作用,使之得到最佳的结合,仍然是美国经济未能很好解决的难题。

关于国际市场

在这个领域布什政府面对的是国内日趋高涨的贸易保护主义,由于对外国资本大量流入感到抵触而日益抬头的民族主义以及乌拉圭回合谈判受挫和区域经济集团化等新问题。

布什政府是以自由贸易的捍卫者自居的,但是在美国竞争能力江河日下的局面下,只唱高调于事无补,这就决定了他从理论上顶住国内保护主义,而在实践上面对外国竞争者实施强硬政策以保护自己的两面态度。

报告列举了美国为贸易保护主义所付出的昂贵代价。如“在1981和1985年间美国从日本进口汽车受自我约束协议的限制,日本同意减少他们出口到美国的汽车”,这使“美国消费者在1984年多花58亿美元”,“一项研究估计取消美国钢铁进口自我约束协议可以使美国消费者在1988年节约8亿美元。”“糖的进口限额维持了相当世界价格二至三倍的国内价格。1987年消费者的损失估计为19亿美元”。“1987年由于花生进口限额使美国消费者损失4亿美元以上”。美国生产者虽然因此得到了好处,但算总帐得不偿失,而且农场主从糖和花生中得到的好处又会资本化到土地价格中去,使农场主必须对地主付出更高的地租和地价。

报告认为减少贸易壁垒可以提高效益,改善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准,某些个人由贸易自由

化遭受的损失不应当成为一个国家抵抗向开放的市场前进的理由。相反它应当成为允许逐步分阶段地实行贸易自由化的理由,即给那些遭受不利影响的个人以适应环境的较好机会。事实上逐步分阶段的做法是国际贸易协议的典型实践。

报告还认为“从开放的贸易政策偏离出去的诱惑力是很强大的”,“短期内贸易自由化马上可以看到的分配效果可以产生强大的游说利益,尽管取消贸易壁垒对国家整体有利,还是会抵抗取消贸易壁垒。”“在失业增长的时候牺牲外国人的利益用保护的办法刺激国内就业的诱惑会特别强”,这就提出“用强有力的国际规则避免所有国家短视地实行这种政策导致相互打贸易战的局面”。报告认为农产品贸易是缺少纪律约束的例子。“农业曾经长期处于关贸总协定的约束之外”,“在美国和欧共体之间为农产品出口所进行的战争就使纳税人在 1988 年为直接出口补贴花费 110 亿美元。”“在美国 1988 年的出口补贴超过 10 亿美元”,“出口补贴是欧共体和美国农业支持计划的直接后果。”欧共体用补贴出口剩余产品的办法支持国内高价。美国自 1985 年起开始补贴出口,有一段时间为了反对欧共体的出口补贴,美国的补贴高达世界价格的 30%—40%,而欧共体的出口补贴则高达世界价格的两倍。报告对大萧条时期“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特别是美国的“斯穆特—霍利”法表示深恶痛绝,认为这是不该重演的历史教训。

但是美国在贸易条件日益恶化时如何能不用打贸易战的办法,维持市场份额呢?对此,报告并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办法。而美国真正在做的是用所谓“公平贸易”、“双边主义”的口号把美国引向贸易战的危险边缘。“公平贸易”的意思是说,“我实行自由贸易,我的市场对你开放,如果你对我实行关门主义,那就不要怨我对你报复。”在这里,关键是由谁来判定贸易伙伴的行为是否“公平”。美国政府认为应当是美国。两个平等的贸易伙伴在发生贸易争端时不是由第三方担任裁判,而是由争执的一方作裁判,这本身就是不公平的,因此它是一种危险的大棒政策。

针对美国国内对外国资本大量流入,甚至兼并和购买了美国人引为民族骄傲的名企业、名建筑而引起的不满情绪,布什政府重申美国官方对外国人在美投资的立场,确认资本在国际间畅通无阻地流通无论对东道国或是投资者的家乡都是有好处的。报告强调开放性的投资政策应以所有国家都必须给予外国投资者以“国民待遇”为原则。外国投资者应像本地投资者一样,能在同样条件下进行相同种类的投资。不过也有例外。美国对外国在美国投资有所限制的领域包括航空、能源、通讯、广播、船运和国防。美国对外国投资的跨部门委员会受权调查外国投资以决定他们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在一定条件下可向总统建议停止或预防企业被外国人收购。

布什政府认为各国对外资的政策有很大差别,特别在企业建立、本地产品含量、出口要求、利润返还以及保护知识产权等方面差别极大,需要达成国际共识,建立多边规则以指导各国对外资的政策。

报告也谈到了关贸总协定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问题。强调关贸总协定在两个条件下是允许建立自由贸易区或关税同盟的。这就是:(1)对区外的出口商不设立比成立自由贸易区或关税同盟前更有限制性的贸易壁垒;(2)在区内大量取消贸易屏障。报告为建立北美贸易区的动机辩解,认为只要缔约国遵守关贸总协定的原则,无论是多边主义还是搞区域集团化都能对提高国际经济效益起作用。不过从北美自由贸易区谈判中突出金融服务业、知识产权等重点,可以明显看到美国是要通过建立自由贸易区为自己的优势产业打开出口通道,然后用自由贸易区谈判的结果反过来促进关贸总协定就这些问题达成协议并确立相同的规则。以双边主义促多边协定来维护美国的利益,这一动机是非常明显的。

1992 年总统经济报告反映了布什政府在经济政策上比较务实、比较稳重的特色,对美国经济长短期存在的问题和出路有比较清醒的认识。美国经济的确面临严重挑战,需要有危机感,抓住冷战后的大好时机,用大力气去调整。然而布什政府的近期经济措施力度是不

足的, 长期调整措施仍然停留在口头上, 如果没有两党一致的协调行动, 仍不免是纸上谈兵。对美国来说要进行宏观经济的结构性调整, 提高储蓄率、投资率, 以实现劳动生产率的快速增长, 以保持其第一经济大国的地位仍将是任重道远的。

核裁军的进展

吴 展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一、从针锋相对、维持现状到不均等裁减

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核武器控制, 自美国于 1945 年试图建立原子能的国际控制开始已经过了 47 年。1945—1949 年是美国独占核武器时期。1949 年苏联试验成功了原子弹后开始了两国间核竞赛时期。1950 年初两国先后试成了热核武器, 于是核武器就成了威力强大无比的武器。此时双方一方面力求争夺核优势, 另一方面又害怕这种武器, 害怕竞赛失去控制, 就不断进行控制核武器的谈判。从 60 年代到 70 年代美苏达成了许多控制核武器的协定, 如: “禁止在大气、外空和水下进行核试验条约”(1963)、 “核不扩散条约”(1968, 约有 100 国参加)、 “限制反导弹条约” 和 “限制战略进攻武器的临时协定”(1972)、 “限制地下核试验条约”(1974)、 “限制战略进攻武器条约”(1979)。这些条约的特点都是维持核力量对比的大体均势, 而不是真正裁减。即使是对核试验的限制, 也是在世界舆论的压力下, 双方都对某种试验基本试够了, 才达成协议的。

自 1985 年戈尔巴乔夫在苏联上台以来, 苏联实行了 “新思维” 政策, 不再谋求在核武器上同美国的均势, 而采取了 “足够” 的方针, 并积极争取美苏之间的核裁军。它这样做的背景是其经济江河日下, 无法维持巨额军费 (据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20% 以上, 而美国则只占 6%), 因而无力同美国进行核武器竞赛。两国间核裁军的第一个突破是历经 9 年艰巨谈判而于 1987 年签署的 “中程核导弹条约”。根据该条约, 两国的中程核导弹将全部销毁。条约有两个重要的意义: 第一是世界上第一次全部消除一种核武器, 第二是裁减的数量不均等。根据条约, 苏联要销毁 1752 枚导弹和 2572 个弹头, 而美国则仅销毁 859 枚导弹和与导弹同等数目的弹头。这实际上表明苏联做出了重大的让步, 开辟了核裁军的新阶段。

达成协议的原因之一是中程核导弹已经无用。苏联自 70 年代起一直加强其中程核导弹的部署, 这种武器的射程约 5000 公里, 只能攻击欧洲和亚洲。由于西方当时没有相应的武器, 所以苏联占有优势。美国从 1983 年起也开始在欧洲部署中程核导弹, 打破了苏联的优势。尽管苏联暴跳如雷, 却也无计可施。就核威慑来说, 双方既拥有了庞大的战略核武器库, 那么中程核导弹的威慑就成为多余。而且苏联的中程核导弹打不到美国, 美国的同类武器却能打到苏联。这对苏联来说自然是不利的。

二、艰难的新突破

中程核导弹的问题解决以后,下一个难题是战略核武器的裁减。这类武器指的是能打到世界各地的洲际弹道导弹、远程潜射导弹、重型轰炸机等。裁减战略武器谈判(S T A R T)也进行了9年,到1991年7月才达成协议,签订了“裁减和限制战略进攻武器条约”,简称S T A R T条约。谈判的过程极为艰苦,只是在签署了“中程核导弹条约”后才逐渐突破。

这项条约的主要内容大体是:

1. 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导弹和重型轰炸机等运载工具的部署限量为1600,包括重型洲际弹道导弹(苏联的SS-18,美国没有)154枚。

2. 配套的核弹头限量6000,包括洲际弹道导弹和潜射弹道导弹弹头限量4900,其中重型洲际弹道导弹弹头1540和机动式洲际弹道导弹弹头1100。

以上裁减分三个阶段将在1998年之前完成。

从数字看,弹头数好像比双方现有各约1.2万枚减少了50%,但实际不然。条约规定,不载远程巡航导弹的重型轰炸机无论装载多少核炸弹和短程攻击核导弹,都只算一个弹头。美国重型轰炸机可装20枚核巡航导弹却只算10个弹头,而苏联的重型轰炸机可载6-16枚核巡航导弹却只算8个弹头。从限额看,重型轰炸机的核弹头不能超过1100,但由于计算方法的关系,美国可以装4600个弹头,实际弹头数可达9500,所以削减量只有20-30%,苏联共可装2024个弹头,实际弹头数共约6900,削减量30-40%。因此美国占了便宜。以上数字中还没有包括海上发射的远程核巡航导弹弹头880枚,这是双方在条约外公开声明的限额。尽管实际削减数字比条约的计算数字小,但是两国的战略进攻武器总算是开始削减了,这一开端还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战略进攻武器与中程核导弹不同,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能够真正削减就很不容易。

战略核武器的谈判比中程核导弹的谈判更难,从一开始,S T A R T就为以下几个问题所困扰:1. 中程核导弹条约规定全部消除这种武器,而S T A R T条约则只规定裁减一部分武器,其大部分武器还要进行试验和维护,生产也不能停止,因此后者的核查要复杂得多。2. 美国的主要目标是大大削减美国最担心的苏联强项,即共308枚的10弹头重型洲际弹道导弹SS-18,而苏联的目标则在美国的8弹头潜射弹道导弹三叉戟D-5,双方矛盾较大。3. 美国积极开展战略防御计划(S D I),即反导弹系统,一旦技术过关就要部署,而苏联则认为这违反了“限制反导弹条约”,破坏了双方战略进攻武器的平衡,并扬言若美部署S D I,苏联就要增加战略进攻武器。

美国一直要求苏联大量削减其陆基多弹头洲际弹道导弹,而自己则不愿削减其海基多弹头导弹。苏联于1986年提出以削减50%的SS-18来换取美国停止S D I计划,而美国则坚决不同意停止。由于美国的态度强硬,而且实际上S D I的技术又一时过不了关,无法全面部署,后来苏联让了步,不再以这为削减战略进攻武器的先决条件,而削减50%SS-18的条款却保留下来,成为S T A R T条约的一项基本内容。至于苏联所担心的美国潜射导弹三叉戟D-5,则根本没有受到影响。

为了便于核查,并使条约无空可钻,美苏两国经过漫长的讨价还价和争论,才在四个突出的问题上达成协议。这四个主要由美国提出的问题是:“降低载荷”、“新型导弹的定义”、“遥测”、“公路机动洲际弹道导弹SS-25的后续型号”。

所谓“降低载荷”是指减少多弹头导弹的弹头数问题。如果按条约削减了一个导弹中的弹头数,那么弹头母舱中就会空出一个位置。这样一来在战时就很容易补回削减的弹头而不易为人察觉。为了堵住这个漏洞,条约规定两国各有3种导弹(美国是陆基“民兵”三号和另外两种导弹,苏联是海基导弹SS-N-18和另外两种导弹),可总共削减1250个弹头。对“民兵”三号和SS-N-18来说,削减了弹头的母舱必须销毁,并用符合削减

后弹头数的新母舱来取代。另外两种导弹则最多可总共削减 5 0 0 个弹头，而每枚导弹最多减少 4 个弹头。如每枚导弹的削减量超过 2 个弹头，则母舱必须销毁，并以新的符合削减后弹头数的母舱来取代。

所谓“新型号”的定义问题是为了避免把现有型号作小量改变就算做新型号。由于新型号在一定条件下允许试验，那么把一个单弹头导弹的弹头数从 1 个变为 3 个而其他部分不变，如果这算新型号，就可以进行充分的试验，在战时就能迅速增加弹头数。又如多弹头导弹减少几个弹头就算新型号，它就能免于“降低载荷”条款的限制，在战时迅速增加弹头。

第三个问题是“遥测”问题。凡试验导弹都须用遥测技术把导弹各种部件在飞行中的情况用无线电传送地面，供分析试验结果使用。既使用无线电，就不能防止敌方接收。苏联的遥测数据常常编成密码，使美国难于判读。另一个问题是试验方可以用低功率、窄波束、高频率等无线电发送方式，或把遥测数据用密封箱投下，这些办法都能使敌方难于接收。为此，条约对遥测的加密和其发送方式的改变，都作了严格限制。

第四个争论问题是洲际弹道导弹的“投掷重量”问题。美国认为苏联公路机动洲际弹道导弹 S S - 2 5 有增加弹头的潜力，所以怕苏联把增多弹头的 S S - 2 5 宣布为新型号，从而能合法地进行试验，以便在战时能迅速增加弹头数。条约规定投掷重量必须增加 2 1 % 以上才能算新型号。标准投掷重量应怎样确定呢？苏联开始只同意以 1 万公里射程的投掷重量为标准来计算，而美国则坚持射程应为 1 . 1 万。所增加的 1 0 0 0 公里将使苏联在导弹其他部分不作较大变动情况下无法增加投掷重量 2 1 %。争论的结果是苏联又做了让步。

总的谈判结果是美国所要求的东西基本上得到了满足，美国所得多于苏联所得，所以美国上下对 S T A R T 条约比较满意。当然从苏联方面讲，它也达到了想要裁减核武器库的目标。

三、单方面宣布削减和大规模削减

在 S T A R T 条约签署之后不久，美总统布什于当年 9 月 2 7 日单方面宣布了削减核武器的倡议。这次主要涉及的是战术核武器，包括全部陆基核炮弹和短程核导弹，共约 2 1 5 0 个弹头；全部海基战术核武器，共约 2 1 7 5 个弹头。然而他宣布美国将保留部署在欧洲的机载战术核武器约 1 4 0 0 个弹头。在战略核武器方面他没有提出多少新倡议，只是宣布解除部分洲际弹道导弹和潜射弹道导弹以及全部重型轰炸机的戒备状态，并停止陆基机动弹道导弹的研制计划。此外他还要求双方就消除陆基多弹头洲际弹道导弹达成协议。同时他呼吁苏联也采取相应的行动，并允许部署有限的反导弹防御系统，以防其他有弹道导弹国家的袭击。

1 0 月 5 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作了反应。他也宣布苏联将撤除全部陆基战术核武器约 1 万枚，海基战术核武器约 2 0 0 0 枚，并保留机载战术核武器。在战略核武器方面，苏联将把弹头限额从 6 0 0 0 减少到 5 0 0 0；冻结铁路机动的洲际弹道导弹，并停止公路机动洲际弹道导弹的研制；还将解除部分洲际弹道导弹和全部重型轰炸机的戒备状态，并使一些核潜艇及其潜射导弹退役。苏联还同意讨论非核反导弹系统的建议，建议建立联合早期预警系统。宣布单方面停止核试验 1 年，并建议签订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协定。

美苏之所以能够迅速地消除大部分战术核武器是因为：

1. 华约已经解散，苏军不久将从东德撤走，北约和苏联之间已不直接对峙，陆上直接冲突的可能性很小，因此陆基战术核武器无用了。

2. 苏联海军的战术核武器对美国的航空母舰威胁很大，消除这类武器对美国有利。

3. 保持机载战术核武器对保证美强大空军的战斗力和维持美在北约的地位非常重要。

4. 在 8 . 1 9 政变失败后苏联解体已成定局，其核武器库面临失控危险，尤其是体积

小重量轻的战术核武器更加难以监控，所以美国急忙地提出了削减战术核武器的倡议。

用单方面宣布的方式来削减战术核武器固然是由于这类武器的必要性已经不大，但也开辟了一种先例。以前要达成裁减核武器的协定非常困难，非常费时。即使现在双方裁减核武器的意识已经加强，但在这种复杂问题上取得妥协也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单方面宣布裁减的方式虽不一定到处都能应用，但它起码能够促进相互间的信任，增强进一步裁减的气氛。

1991年底苏联正式解体，变成了12个独立国家的联合体（独联体）。1992年1月28日美国总统布什在国情咨文中再次要求独联体销毁全部陆基多弹头弹道导弹，作为交换条件，美国也将其陆基多弹头弹道导弹销毁或改为单弹头，并把海基多弹头导弹的弹头数减少1/3，以及把部分重型轰炸机改为常规用途。1月29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提出把双方的战略进攻武器的核弹头削减到2000到2500个。

为了在苏联解体后能继续执行S T A R T条约，美国与拥有核武器的4个独联体国家即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于1992年5月达成协议，由这4个国家共同执行条约。后三国将把它们战略核武器自行销毁或移交给俄罗斯，并由俄罗斯按条约加以销毁。据说后三国的战术核武器已差不多都移交给了俄罗斯。

1992年6月16日在叶利钦访美期间，美苏签订了新的“关于战略进攻武器的联合谅解协议”，规定两国在2003年以前分两期把战略核弹头从现有水平削减到3000到3500个（实际数），即美国减到3500个，苏联减到3000个。同时陆基的多弹头洲际弹道导弹（包括美国最怕的SS-18）将全部销毁，而海基的潜射弹道导弹弹头将削减到1750个。两国以后还要签订一项正式条约。这次协议签署得如此快的原因之一是俄罗斯急需从美国或通过美国获得大量经济援助，以解其国内燃眉之急，为此不得不软化立场，做出更多让步。另一个原因是前一条约已为核查等问题制订了详细而复杂的规则，解决了重大的争议问题，为第二个条约打下了基础。

至此美俄裁减核武器的协议数字已达到了总数的2/3以上，可以说是取得了重大的进展。这对于世界和平事业来说是很值得庆幸的。

四、停止核试验的问题

早在50年代就出现了全面禁止核试验的建议，但由于在核查问题上的争执，美苏始终未达成协议，而只是签订了禁止大气层的核试验和有限地下核试验两项条约。实际当时美苏双方都不真正想要全面禁止核试验，因此往往提出对方所不能接受的条件，使协议难产。当时双方都不断地研制新的核弹头，怎么肯停下来呢？1963年之所以能禁止大气层内的核试验，一方面是因为它严重影响了地球的生态环境而遭到全世界的谴责，另一方面也因为大气层内核试验中该做的双方已基本做完。实际上当时美国的一些核科学家认为这种试验还未全部完成，故强烈要求推迟签约。只是迫于政治形势的要求，美国政府才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有限地下核试验条约之能把最大当量限制为15万吨，也是因为大当量核试验已经足够了。

在全面禁止核试验谈判中的核查问题主要是设立多少监测站、设在何处、能否派人去对方的核试验场进行实地观察。在这些问题上双方一直达不成协议，因都还想继续试验。1980年美国总统里根上台后积极重整军事力量，尤其是核武器，所以对全面禁试更加不感兴趣。战略防御计划中有一项核能X射线激光器计划，被认为是新一代的核武器，很有希望，美国对此进行了大量的核试验，当然不肯全面禁试。美国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已有的核武器需要定期抽查，以保证它们的可靠性和安全性。每年需抽查的数目虽然很小，但不能完全停止。对这一点核科学家间还有分歧。许多人认为核弹头经长期储存后出现的问题主要是零件问题；因此只需拆开弹头检查零件，而无须进行核爆炸，但是当权派仍坚持必须进行核试验。

此外还有一个说不出口的理由,就是停止了核试验,从事核武器研制的技术人员将无事可做,大批人员就会转业,将来一旦需要,断了线的研制工作就很难重新组织起来。

苏联的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上台以来对全面禁止核试验比较积极。他向美国建议停止核试验,并在7月底宣布苏联单方面停止核试验到1985年底。后来这种暂停期限几经延长,直到1987年2月美国进行了核试验后,苏联才重新恢复核试验。1991年10月他又宣布单方面暂停核试验1年,等待美国的响应。

现在冷战已经结束,苏联已经解体,发生核大战的可能性比任何时候都小,而且像核能激光这样的课题计划已经因技术上一时难于过关而被大大削减了经费。但是美国仍然不愿停止核试验。每年试验的次数可以减少,但试验还是要继续。

五、战略防御计划

自从1983年美国前总统里根指示开展大规模的战略防御计划以来,美国在这方面投入了大量人力和财力。原计划应进行激光武器、粒子束武器、电磁轨道炮、电磁能武器、空间发射的反导弹导弹、地面发射的远程和近程反导弹导弹等许多项目的研究。到1990年前如研究成功,美国就要开始研制和部署3至4层反导弹防线,总共要花费数千亿美元之多。

这项计划又称为“星球大战”。它从一开始就在美国和全世界引起了巨大的争论。反对者认为它违反了“限制反导弹条约”。这项条约明确规定只能部署两处(后协议改为1处)各装备100枚反导弹导弹的地面反导基地,其次还规定不得研制、试验、部署以空间为基地的反导弹武器。苏联也表示如美国不停止战略防御计划,就不会达成战略进攻武器的协议,即使达成了也会退出,因为这项计划将破坏战略进攻武器的均衡状态。美国官方则企图用对条约的广义解释来为自己的行径辩解,并决心与苏联就条约重新谈判,甚至于打算在必要时退出该条约。

反对派还认为,就目前的技术水平看,美国搞不成滴水不漏的防御系统,在苏联核弹头的大举进攻时,必然会有一部分核弹头漏了进来,而一枚核武器就足以毁灭一座城市。因此这样的反导弹系统是无效的,花费太多的钱是不值得的。还有,进攻比防御容易得多。一旦美国部署起反导弹系统,苏联在改进进攻武器上花不了很大力气就足以突破防御系统。

尽管争论很激烈,但是美国政府却决心把计划进行下去,绝不松口。到了80年代末,研究结果已表明激光武器、粒子束武器、电磁轨道炮等高尖技术都过不了关,无法在近期照原来设想那样部署“星球大战”。于是美国缩小了计划的规模,以现实技术为基础,研制和部署防御有限导弹攻击的系统。新计划称作“防御有限打击的全球计划”(Global Protection Against Limited Strike, 或 GPALS),要求在7处地面基地部署1000枚非核反导弹导弹,并在空间卫星上部署1000枚非核反导弹导弹,而1987年前先在一处地面基地部署100枚反导弹导弹。由于这种系统既不能对付大规模的弹头进攻,而且在新情况下防御苏联已失去意义,于是该计划把目标订在防御第三国的小规模弹头进攻上。美军在海湾战争中用“爱国者”防空导弹拦截伊拉克的“飞毛腿”近程导弹取得成功后,美国政府对GPALS的信心更足了。它振振有辞地说,拥有导弹的第三世界国家日益增多,它们有一天可能打到美国,至少能打到欧洲,而保卫美国的盟友也很重要。美国国会在普遍削减军费的情况下,通过了给GPALS的1992年预算41.5亿美元,比上年度增加29%,并要求同俄罗斯谈判“限制反导弹条约”的修订问题。这表明美国国会对导弹技术的扩散和世界动荡不安的局势感到担忧。

苏联本来是坚决反对美国的战略防御计划的,但是近年来逐渐松了口。去年10月戈尔巴乔夫表示可以讨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于1992年1月也对美国建立有限的非核防御系统作出了积极的响应。当然两国在这个问题上的讨论还只是初步的,将来会如

何发展还有待观察,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俄罗斯不会坚决反对,既然它已不打算再在核武器上与美国争霸,那又何必反对呢?

美国担心第三世界国家的导弹打到美国确实有点多余,有点过分。实际上在可预见到的未来,可能拥有导弹的第三世界国家将只能有近程导弹,最多是中近程导弹。从这些国家的地理位置看是打不到美国的。要打到美国,必须有远程的或洲际的导弹,而这绝不是那些小国在一二十年之内所能办到的。如果美国想保护欧洲或其他地方免遭导弹的袭击,那么设在美国的地面反导弹基地是无能为力的。而从空间卫星上发射的反导弹导弹则不能攻击飞行在 100 公里高度以下的近程或中近程导弹,对特别设计的压低飞行弹道的远程导弹也无法对付。因此 G P A L S 部署起来究竟干什么用还不够明确。美国最后能把这一计划推进到什么程度,一时也看不很清楚。

六、美国核战略的变化

美国的核战略自 50 年代起从“大规模报复”到“灵活反应”和“确保摧毁”,到“有限核选择”,到“抵销战略”,到“实战威慑”,这一切演变都是针对苏联的威胁而来的。从苏联那方面看,它之所以努力扩大其核武器库,以求与美国平起平坐,也是对美国核战略的反应。就是说,双方都害怕对方会对自己发动核战争。由于核武器的破坏力极大,而双方又都积累了大量的核武器,足以把对方摧毁而有余,于是又不敢发动核战争,因为在一场大规模的核战争中,不仅对方将遭到毁灭,自己也不能免遭毁灭。因此核武器只是在遭到核攻击时才被用来报复,从而使对方不敢首先使用核武器,这就是起威慑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在过去几十年来的两极对立的冷战中,核武器起到了避免一场热战的作用,因为即使是打常规战争,也有升级到核战的极大危险。

核武器只能起威慑的作用,并不能真正在作战中使用。即使是在美国总统里根时期,美国政府热衷于搞核武器的实战威慑,那也只是吓唬人,只不过是威慑的一种形式而已。核威慑只是在核大国之间发生作用,而对无核武器的第三世界国家却往往不起作用,因为它们不相信会对无核国家冒天下之大不韪去使用核武器。

现在冷战突然结束了,往日的死敌苏联突然解体了,剩下的俄罗斯和其他 11 个独联体国家从美国的敌人变成向美国求援、处于困境的伙伴,已构不成对美国的威胁,核战争已经打不起来了。所有这一切都来得太突然,使美国感到措手不及,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美国的核战略应该针对谁呢?针对第三世界的动乱,不行,因为那里用不着核武器。过去有苏联这个“鬼”在时,战略方针和武器的打击对象都非常清楚。现在一切都突然变了,没有了假想敌,战略如何制订、需要什么样的武器都不清楚了。

现在美国一方面觉得战争打不起来,可以裁军,可以削减军事开支,并正在热烈地谈论着和平红利的好处。另一方面,由于双方历史上的相互猜疑和不信任一时难于完全消除,美国觉得俄罗斯依然拥有庞大的核武器库,有能力在约半个小时之内摧毁美国,而且按照裁减核武器条约规定销毁这些武器的大部分,也需要较长的时间和大量资金,所以美国在裁减核武器的问题上显得比较犹豫,总不想把自己的核武器马上削减掉,尤其是军方,他们总想保留下 3000—4000 枚最先进的核弹头,目的还是想保留足以摧毁俄罗斯的能力。此外,美国为保持其军事上的优势地位,也想把核武器多保留一些,保留的时间长一些。相比起来,俄罗斯反而更想快一些削减核武器,早一些卸下军备负担的沉重包袱。

现在既然核战争打不起来,双方都有裁减核武器的愿望,俄罗斯已经不再是美国的仇敌了,更多地削减核武器是势在必行,只待时机成熟而已。总的情况是俄罗斯想快裁一些、多裁一些,而美国则想慢裁一些、少裁一些。其结果必然是苏联多让步一点,美国多占一些便宜,而裁减核武器的进程必然会继续下去。

七、中国怎样办？

在美俄双方达成了大规模裁减核武器的协定的情况下，中国就会受到压力，要中国也参加核裁军。1986年中国政府曾经宣布，美苏应率先停止、生产和部署一切类型的核武器，大幅度地削减并就地销毁各自的各种类型的核武器。这样就有可能为召开由所有核国家参加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核裁军国际会议创造积极的条件，以商议进一步核裁军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步骤。中国的声明并未说明大幅度究竟指的是多少。

在S T A R T谈判中就有人提过中国可否参加核裁军。但那时美苏拟议的削减比例不大，而且不包括战术核武器，也未涉及停止试验、生产和部署问题。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自然不能参加。笔者曾经认为当超级大国的核武器削减到能与中国的核力量相比时（不一定完全相等），中国才可以考虑核裁军问题。中国的核武器很少，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时候，是不可能考虑这个问题的。

现在美俄两国已经协议要把战略进攻核武器削减2/3，战术核武器削减大部分，其生产、试验、部署虽未停止，但也必然会相应地有所减少，这是否算符合了中国的条件呢？笔者认为这还不够。按其协议，美俄两国各自保留的核武器，仍将大大多于中国的核武器，依然不能相比，所以还不到中国参加裁减的时候，但是在适当时候中国参加核国家间的讨论是可以的。

中国到什么时候可以参加核武器的裁减呢？笔者认为中国也不必等到美俄的核武器减少到同中国一样多时才加以考虑。如果美俄两国能把它们的核武器削减到与中国拥有的数量可以比较时，即削减了90%或95%，并基本停止了试验、生产和部署时，中国就可以考虑了。那时中国至少可以表示将其核武器库维持现状不再增加，但是要中国削减恐怕还不适当，因为那时美俄的核武器库将仍然大于中国。当然，这只是笔者个人的意见。

至于将来能否把核武器全部消除掉，现在还很难说，估计这不会很快实现，但是把核武器削减到较小的数量是有可能的，因此，核裁军的进程将会继续下去，前途是有希望的。

美国安全战略向何处去

宋久光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从1991年开始，国际战略形势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剧烈、最深刻的变化。以华约解体、原苏联消亡以及俄美开始建立“新型关系”为标志，宣告了支配战后国际局势40几年的美苏两极冷战格局的结束。

当世界各国人民庆幸笼罩在他们头上几十年的大战阴影即将消失，满怀希望地企盼新时代的到来时，却遗憾地发现，不合理的世界“旧秩序”并没有理所当然地为公正合理的“新秩序”所替代；冷战的结束也没有自动地为世界带来和平与稳定。巨变后的世界，远非“太

平盛世”，依然充满不稳定、动乱频仍乃至战争迭起。

面对这“无秩序”又充满诸多不确定因素和难题的复杂局势，国际战略、外交界人士普遍关注一个重大而现实的问题乃是，作为世界仅存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将如何处理新形势下的国家安全问题，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将向何处去？

一、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发展演变的简单回顾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概念是在战后初期遏制共产主义、同苏联进行冷战和准备热战的基础上形成的。几十年来，随着美国内外环境的变化，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经历了不断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在苏联东欧发生剧变之前的 40 几年中，美国战略的主要变化是：

1. 国家安全概念内涵逐步扩展

在 50、60 年代冷战高潮时期，对抗苏联的军事威胁和扩张，维护美国及其盟国的生存与安全是美国压倒一切的国家安全目标。军事安全几乎成了国家安全的同义语。在 70 年代，由于美国经济的相对衰落使它失去了以往的独立地位，美国扩大了国家安全的概念，把经济安全也包括其中。到了 80 年代，一些超越国界的问题，如核扩散、军售失控、国际恐怖主义等等变得日益突出，对美国安全提出了新挑战，美国国家安全的内涵因此进一步扩大。不仅如此，甚至某些传统上根本不属于安全范畴的问题，如环境恶化、温室效应、人口爆炸、毒品走私等等也都成了美国国家安全议程上的问题。

2. 解决国家安全问题的手段日趋多样化

军事力量曾经是美国用来解决国家安全问题的基本手段。70 年代以来，随着国家安全概念的扩展，手段的运用日趋多样化，由过分依靠军事实力转变为注重政治、外交、经济以及军事手段的综合运用。

3. 军事战略上变得更加灵活

战后的美国军事战略几经演变，由“僵硬”逐渐转向“灵活”为其主要特征，表现在：军事手段的运用由单一的“大规模报复”转向“灵活反应”；核战略思想由单纯地准备打核大战转变为准备应付各种级别核冲突，由单纯地发展核进攻力量转变为强调攻守兼备；建军思想上，由单纯依靠扩充军备维护安全转变为军备建设与军备控制“两手抓”；在威慑思想上，由强调单一的“核威慑”转变为与核常规威慑并重；对未来战争的设想上，由片面强调打全面战争转变为同时重视局部战争和低强度战争。

尽管美国战略出现了上述种种变化，但由于冷战时期美苏两极对抗体系的相对稳定以及美国决策人对共产主义根深蒂固的憎恨，在战后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几乎是用“冷战”这面透镜来观察和看待它的一切对外关系并以此来建立国家安全的概念的。因此，“万变不离其宗”，对付苏联的威胁始终占据美国安全战略的中心。这正是战后美国战略具有超乎寻常的历史延续性的一个基本因素。

二、布什政府对国家安全战略的反思与近期所做的调整

近年来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带来三方面的后果：军事上，苏联对西欧发动一场闪电式的全面战争的威胁基本上消失了，爆发核大战的可能性也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小。与此同时，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带来的“综合后遗症”，地区性冲突、某些处在美国视为具有重大利益地区的国家发生的动乱使国际安全局势变得错综复杂，更加不稳定和充满更大的不确定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危险性，对美国安全利益构成现实的威胁；政治上，由对付苏联威胁而产生的美欧政治凝聚力大为降低，盟国的离心倾向日趋明显；经济上，美欧、美日之间的经济、贸易磨擦和竞争更加激烈，美国的国际经济地位受到严重的挑战。

这一切,使得曾主宰美国战略观的“冷战”透镜如今已不再适用。如何建立冷战后时代国家安全的新概念,寻找国家安全的新焦点,就成为美国朝野外交、战略界人士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为此,1989年以来,美国出现了一场持续的、空前激烈的关于美国未来安全战略的大辩论。这场辩论涉及范围之广,讨论的问题之深,是前所未有的。与此同时,布什政府对以苏为中心的传统安全战略进行了全面审议并进行了一系列的政策调整。目前,这场大辩论和政策调整仍在进行之中,由国际安全形势剧变而造成的美国外交、战略真空依然存在,美国安全战略向何处去这一问题并没有在美国国内取得完全的共识。然而,透过这场论战和政策调整可以看到,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已经出现了若干重大的变化和值得重视的动向。尽管这些变化和动向尚不足以勾划出未来美国安全战略的蓝图,但却预示了它在近期内的走向和发展趋势。这些变化是:

1. 对国家安全目标重要性的调整

美国安全战略的重大变化首先表现在布什政府对国家安全目标重要性的调整上。在冷战时代,维护美国的安全免受外来军事力量的威胁,首先是苏联军事力量的威胁一直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的和压倒一切的目标。其他各项目标以及全部安全政策的制定都在不同程度上与这个目标有关。

冷战的结束,外来威胁的性质的变化,加之美国经济实力的相对衰落,使国家生存与安全这一目标的重要性和紧迫感相对降低。尽管国家安全仍然被视为美国战略的首要目标,但却失去了以往那种压倒一切的地位。相比之下,美国另外两项长期的国家安全目标——促进一种强大的、有竞争力的美国经济;在全世界促进“自由”和“民主”事业——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重要性则明显提高。强调经济安全和促进“民主”与强调军事安全,在意义上具有很大的不同。它们不是主要依靠军事力量,而是以经济竞争力、外交、宣传等非军事手段为主;这两个目标也不是主要针对前苏联的地区而是全球性的;这两个目标也不像美国传统的外交政策那样以欧洲为重点。(1)

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是美国对安全战略目标优先性进行调整的一个实证。从80年代初直到1989年,美国从对抗苏联这一最高战略利益出发,一直把“保持和密切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列为实现其国家安全目标的重要因素。在地区性安全问题上,视同我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为其亚太战略的四根支柱之一。调整后的美国安全战略改变了这一立场,强调“人权”是中美关系的重要基础,把对华关系降低到保持“磋商与接触”的水平上,并把促进中国的“变革”(实为“和平演变”)作为对华政策的目标。(2)

2. 对外政策重点的调整

美苏冷战时代,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是“确保核时代的和平与自由,即解决直接影响美国国家安全的两个特大问题——核战争危险和苏联的扩张”。在美国看来,确定这样的对外政策目标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从美国立国之初至今,还没有哪一个敌对国家能像苏联那样“既有实力又有动机威胁到美国的生存”。在这一政策目标指导下制定的“遏制”政策成为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政策的基轴。

就美国外交政策思想而言,战后占主导地位的是“国际主义”或“全球主义”。这一政策思想是建立在这样几点考虑之上的:(1)美国必须永远放弃“孤立主义”,代之以对国际事务进行积极参与的责任心;(2)美国的利益遍及全球,因而具有全球责任和义务;(3)美国是国际舞台上自由和道义的捍卫者;(4)世界的未来取决于美国的意志和随时为了建立美好的世界而在海外采取行动;(5)美国必须担负起世界领导的作用。(3)战后历届美国政府,从杜鲁门到里根直至布什无一例外,都坚持全球主义的对外政策。

苏联威胁的迅速瓦解,曾一度使美国茫然不知所措,以抗苏为中心建立的美国战后对外政策也因此面临现实的重大挑战。首先,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基石——美欧、美日联盟受到了巨大冲击,联盟的基础开始松动。对抗苏联的军事威胁是西欧和日本同美国结盟的原动力;

美国的军事存在以及“核保护伞”则是联盟的政治“粘合剂”。对美国来讲,同西欧、日本结盟不仅有助于自身的安全,也从中获得了巨大的政治、经济实惠。现在,这一“原动力”已不复存在,西欧、日本长期以来由对付苏联而掩盖的离心倾向日益表面化。

其次,对外政策的手段与目的发生脱节。虽然美国并没有因集中注意苏联而忽视其他问题;美国现行的外交政策及军事手段也考虑到了危及国家安全的其他新旧威胁。但是,历数战后以来美国 9 届政府和 22 届国会所做的工作,实际上武装部队规模的确定,武器系统的研制,外交行动的采取和外援开支,都是主要依据反对共产主义的冷战,遏止苏联发动的热战,或在热战中压倒苏联的需要来确定的。现在,威胁的性质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主要的是经济性质的而非军事的。即便是军事领域,威胁也与以往大不相同。严酷的现实是,美国的军事力量虽然强大,对于经济竞争的挑战却无能为力;美国有充足的武器对付“大战”,却缺少足够的手段维护“小和平”。

最后,国内政治、经济问题的掣肘。政治上,由对抗苏联而形成的两党一致性如同美欧联盟一样面临瓦解的危险,争着要为某些问题贴上国家安全优先项目新标签的争论已经开始。经济上,长期困扰美国经济的财政、金融赤字、债务、国际竞争力低下等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又面临大量的诸如教育水平低下、滥用毒品、艾滋病蔓延等日趋严重的社会问题。尤其是持续一年半之久的经济衰退至今未见转机。在这种情况下,主张“收缩”全力对付国内问题的“新孤立主义”重新抬头,对传统的“全球主义”对外政策提出了挑战。

布什政府的选择是仍然坚持“全球主义”,但针对国内外局势的变化,布什政府对外政策进行了若干调整。尽量避免国际秩序发生剧变,保持美国的影响力,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可以说是目前政策调整的基本特点。具体作法是:第一,逐步改变以苏联为中心考虑对外政策的作法,把巩固同盟国及友好国家之间的关系放在突出的位置。在美国看来,新时代美国安全更多地取决于经济安全和在世界范围内推进西方的民主和价值观。而一个坚固的盟国关系是完成这两个政策目标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第二,强调国际合作和发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作用。这样做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由于现实国际安全环境复杂、多样和充满不可预测因素所造成的各国间利益的相互渗透,敌我界限的模糊不清。美国在国际上的许多行动不仅要依赖传统的盟国和友邦的支持,也需要那些与美国没有外交和军事合作,或甚至没有共同的政治或价值观念的国家的合作。其次是美国的综合国力日衰,无力单独解决在建立国际“新秩序”中面临的来自政治、经济甚至军事方面的挑战,只能通过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来发挥美国的领导作用。最后,目前对美国安全形成威胁的许多问题具有全球性,仅靠美国独自行动,或仅仅依靠盟国都无法解决,需要全球范围内各国的广泛配合与合作。

第三,突出全球性和地区性军备控制和制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重要性,认为这是冷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一项紧迫任务。为此,美国采取了“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一是通过政治拉拢、经济诱惑等手段,拉前苏联继续朝更大幅度核裁军的方向努力,以便彻底消除对美国的生存仍然构成的潜在核威胁。二是通过加强现有的安排,扩展各类不扩散体系成员以及提出新的不扩散倡议这样一些措施解决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4〕

第四,对如何设计美国未来的对外政策,尽管仍有不同主张,但在有一点上基本达成了共识,即美国在世界事务中仍有自身利益并负有责任,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促进民主价值观,但它还必须解决国内问题。用尼克松和布热津斯基的话来说,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第一项任务应当是“分清至关重要的利益、关系重大的利益和边缘利益之间的区别”,执行一套明确分清轻重缓急的对外政策,在继续承担美国的全球义务、减少部分地区的安全负担、实现国内振兴三者之间保持平衡。

3. 军事战略的调整

战后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的全球军事战略和地区战略、武装力量规模的确定、军事力

量的部署、武器发展乃至各种战役战术细节都围绕着一个中心,就是如何使遏制苏联发动全面战争的军事威慑更加有效和在一旦威慑失效的情况下如何赢得战争。

苏联军事威胁的急速减小,使军事力量的平衡明显地朝有利于西方的方向倾斜。然而,对美国安全的军事威胁虽然在强度上降低了,却没有完全消失;有些威胁表面上消失了,实则转变为潜在的威胁;而威胁的来源则更加分散化、多样化和复杂化。这造成了美国军事手段与现实威胁间的脱节。为此,布什政府在前几年战略调整的基础上,对美国军事战略进一步作了补充和修改。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的“新防务战略”,其主要内容是:

(1) 继续保持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联盟体系。这被视为美国防务战略的首要原则之一。强调美国联盟政策的核心是:通过与盟国的战略合作,抗衡敌对国家或敌对国家联盟的威胁。同时通过盟约的约束力对盟国进行必要的控制,阻止盟国因苏联威胁的消失而产生的离心倾向。

(2) 为了使美国的全球联盟体系具有实质性,美国将保持前沿部署力量。这是联盟战略的关键因素。美国的地区性军事存在将进一步减少,但不能过快、过多,而存在形式可以灵活多样。

(3) 保持对危机做出反应的能力和快速支援前沿防御的机动性。

(4) 继续保持对海洋实行有效控制的强大海军力量。

(5) 适当压缩部队的规模,保持人力物力的动员基础和对付全面战争的部队重组能力。

(6) 继续保持一支强大的核战略进攻力量,同时发展战略防御技术。一旦技术成熟就投入部署。(5)

与以往相比,布什“新防务战略”的最重要变化,是“把防务计划关注的焦点从对付苏联的全球挑战转向对地区性威胁作出反应”。认为,“冷战时期华约大规模入侵西欧并升级为全球大战的危险已不复存在。冷战后时期的挑战主要来自像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所显示的重大地区性威胁”。(6)

尽管布什为这些战略主张贴上“新战略”的标签,但从总体上看,“新战略”并没有突破“旧战略”的框架。布什政府对军事战略的调整仍然持审慎的态度,除了在主要假想敌和军备削减的规模有较大幅度的变化外,冷战时期的基本战略概念,如核威慑、联盟战略、两洋海上战略、前沿部署、以欧洲为战略重点等等仍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其基本框架依然存在和继续发生作用。

三、影响、制约布什政府进行政策调整的因素

为顺应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布什政府必将对国家安全战略作出进一步的调整。过时的概念将被逐步放弃,新的战略主张也会应运而生。但是,任何一个新战略的诞生和旧战略的消亡都要经历一个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这不仅是因为旧战略的本身具有某种“历史惯性”,更重要的是,新战略赖以产生和实施的经济、技术、军事条件以及国内国际环境等战略“硬件”的形成需要远比创立战略“软件”——战略思想——长得多的时间。40 几年内形成的美国战略就如同海洋里的一条巨轮,要调头是不容易的。正因为如此,美国政府对战略所进行的调整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需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会完成。从目前看,制约美国进行战略调整的主要因素是:

1. 美国国家利益和安全目标的相对稳定性将在长时间内牵制美国安全战略的重大调整

从战略制定的角度看,国家利益是构成正确战略的基础和决策的依据。美国的国家利益是由其奉为立国之本的一整套政治、经济制度及其价值观念所决定的。正因为如此,美国的基本国家利益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是相对稳定的。环境变化会引起的只是国家利益优先次序的改变。

国家安全目标是依据国家利益所建立的,它们起到将抽象的国家利益具体化和为国家指明努力的方向的作用。与国家利益不同,国家安全目标的确定要考虑对国家安全造成的威胁。外来的威胁变化了,安全目标也会随之而变化,特别是短期的或中期的安全目标。但是,反映基本国家利益的一些长期国家安全目标,如:保持美国和盟国的安全;促进一个强大的和有竞争力的美国经济;在世界范围内保护并促进“民主”、“自由”和“人权”等等,却不会轻易改变。纵观战后美国战略的演变,会发现在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目标方面,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具有一种“惊人的历史延续性”。即使在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这一点也没有改变。这正是为什么布什在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后的今天仍然强调,美国的基本利益和目标“即使在一个新时代里也持久不变”的基本原因。(7) 美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目标的相对稳定是限制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在短期内发生著变的基本内在因素。

2. 外来威胁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使新战略难以“定向”

从某种意义上讲,国家安全的外来威胁中的不确定性大于确定性、复杂性大于简明性是目下美国所面临的安全形势的根本特征。苏联的威胁曾是巨大而现实的,也是明白无误的;现在,美国“有形的”对手消失了,大量“无形的”威胁却产生了。既然对安全的威胁将来自何方心中无数,战略调整当然也就无从入手了。

对美国安全的威胁而言,最大不确定性来自前苏联。从军事上讲,前苏联的主要继承者——俄国仍然保持着一支绝大的军事力量。它的常规军事力量尽管在规模上有所缩小,已无力对欧洲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入侵,但仍有足够的力量发动一场高强度的局部战争;在战略核力量方面,它仍旧同美国保持着战略平衡,仍旧是世界上能在一场核袭击中毁灭美国的唯一国家。此外,俄国的战略防御力量仍领先于美国。而更为关键的问题是,俄国仍继续在质量上改进、发展其战略核武器。除此之外,由于苏联的解体,以往一个核国家现在变成了数个,这无疑将增加核武器扩散的危险;独联体各国因领土、种族而引发的争执、冲突,甚至战乱不断;由政治、经济危机等带来的难民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无法在短期内解决,会在长期内成为困扰西方和美国的复杂因素。

第二个不确定性,来自美国同盟国的关系。美国同盟国之间历来是既合作又矛盾。合作是基于对付苏联的军事威胁;矛盾则主要来自他们之间经济利益的冲突。对西欧和日本,同美国结盟是安全利益的需要。对于美国,结盟并非完全出于对付苏联的考虑,也存在借助苏联威胁这一“钟馗”达到控制盟国并从中捞取政治、经济实惠的利己主义动机。

随着东西方政治、军事对抗格局的结束和使世界向多极化发展步伐加快,经济安全越来越受到重视。各大国间的竞争已转向经济、技术方面。西方由共同的安全利益而形成的向心力明显减弱,而源于经济利益冲突的离心倾向则日趋增强。目前,由于世界安全局势仍动荡不定,国际安全的“新秩序”尚未建立,西欧、日本的安全仍有赖于美国的军事存在;经济上,虽然西方盟国之间有矛盾但也存在共同的利益。因此在近期内,美国同西方盟国间的矛盾尽管会加深但还不至于发展到使他们“分道扬镳”的地步。但是,长远看,随着世界安全形势的逐步稳定,由世界经济向集团化的发展、欧洲一体化的实现、特别是德国作为强国的重新崛起和日本经济超级大国地位的进一步稳固而造成的美国同其他盟国间的利益冲突,无疑会越来越突出和难以调和。长期以来美国同西方盟国间的“低强度”经济贸易冲突会不会因此而逐步升级到“中强度”的“局部战争”甚至“高强度”的经济贸易“大战”,是谁也无法作出肯定答复的。

第三个不确定因素,来自地区性冲突与安全问题。地区性的冲突并非起于今日,却不同于冷战时期。那时的地区性问题尽管也有内在根源,但总体上讲,大多与美苏在各地的角逐、对抗、争霸有关,甚至直接源于他们的抗争。因此,地区性冲突基本上具有可预见性和在阵线上是泾渭分明的特点。

冷战的结束使长期被超级大国争霸所掩盖的内在矛盾,如种族对立、领土争端、宗教矛

盾以及地区性霸权主义等等,变得突出了。这些矛盾来源的多样化和复杂化使地区性问题无章可循,阵线模糊不清,因而充满冷战时期无法相比的不确定因素。加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进一步扩散,使这个问题具有更大的危险性。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最初为美国始料未及,又由此酿成一场高强度的局部战争就是一个例证。

3. 手段与目的的脱节也将长期制约美国战略的调整

战后以来,建立在“全球主义”之上的战略目标同手段之间的不足历来是制约美国战略有效实施的重大因素。历届美国政府都曾不遗余力地为解决这个“手段”与“目的”间的矛盾寻找战略上的出路。布什政府意欲修改现行战略,为未来世界规划“新秩序”的蓝图,正是这一努力的历史继续。

然而,布什面临的却是一个远比他的前任严酷的现实:政治上,建立在对抗苏联基础上的国内长期两党一致性已不复存在,盟国俯首称臣,唯美国马首是瞻的日子也将一去不返;经济上,美国已失去唯一超级大国的优势地位,在国际领域的影响力日益缩小。更关键的问题是,美国经济相对衰落似乎是大势所趋,难以扭转;军事上,美国仍然是“世界冠军”。在面临外来军事威胁、协调与盟国的关系时仍可以赋予美国较大的灵活性和回旋余地。但问题是,新时期美国面临的主要威胁是经济性质的,不是军事性质的。美国军事力量虽强,但用以解决最为紧迫的经济振兴、增强贸易竞争能力这类问题则是“英雄无用武之地”。

其实,美国从来就不曾拥有可供其随心所欲地用于“手段”建设的足够资源,即便在二战后初期处于历史上的极盛时期也是如此。道理早已如此,只是“于今为甚”。

四、结论

综上所述,可有以下几点结论:

1. 近年来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改变了传统的战略环境,使美国冷战时期建立在“遏制”政策基础上的国家安全战略面临新的重大挑战,美国对战略进行重大调整势在必行。

2. 目前布什政府对战略的最重要调整,首先是初步改变了国家利益的优先次序,由强调安全利益转变为注重经济利益和国际环境利益。与此相适应,促进美国经济和在世界范围内推行美国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念和政治制度将成为未来美国国家安全目标的重点。其次,调整后的美国外交政策将改变以苏为中心制定政策的作法,把调整、巩固和加强同西方盟国和友好国家的关系置于对外政策的优先位置。最后,在军事战略的调整上,放弃了以苏联为主要假想敌和以全面战争规划军事力量的观点,把军事战略的重点转到地区性威胁。

3. 目前,国际形势处在复杂、多变的历史转折时期,国际安全局势充满许多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为新安全战略定位的“指南针”在近期内难以定向。此外,存在一些对美国政策调整的制约因素,这些因素不可能改变必然进行调整的大趋势,却可以对调整的速度、幅度等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因此,美国的战略调整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

4. 美国目前的国家安全战略同 80 年代中期以前的战略相比,已有了若干重大的变化。但是,布什政府对国家安全战略所作的调整并非都是新创。有些是以前就有所酝酿,但由于当时的国内国际条件的限制而未实现的;有些是在前几年战略调整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也有一些是针对剧烈变化的国际形势提出的新战略主张。新的政策中,有经过深思熟虑后提出的颇具前瞻性的主张,但也不乏急功近利的“即兴之作”。就总体而言,新战略赖以建立的客观基础尚未完全形成。目前美国对战略的调整也多属政策重点的变化,尚未从根本上改变以往战略的基本框架,美国安全战略的延续性并没有中断。说美国安全战略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还为时过早。

注释:

- (1) George Bush: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The White House, August 1991, p.3.
- (2) *Ibid.*, p.4.
- (3) Charles W. Kegley, Jr, Eugene R. Wittkop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p.36.
- (4) Bush, p.6.
- (5) Dick Cheney: US New Defense Strategy, National Defense, February 1991, p.12.
- (6) Dick Cheney: Annual Report to the Congress, FY 1992, p.20.
- (7) Bush,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p.4.

是提供援助,还是袖手旁观

——论美国援助南斯拉夫的开端

时殷弘

作者单位: 南京大学历史系

1949年初,美国政府改变前半年的坐视政策,以放宽出口管制开始了持续数十年的向南斯拉夫提供援助的过程。这是和平时期美国第一次给予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支持,必然涉及一系列它前此未遭遇的决策难题,包括在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中如何处理基本战略利益、间接战略利益和意识形态利益之间的矛盾及其轻重缓急次序,如何确定经济援助和政治条件的关系,以及如何有效地追求意识形态方面的目标,即改变受援国的基本社会、政治制度。美国在这些方面开始取得的新鲜经验,对它有着广泛和长远的指导作用。因此,研究这一课题具有显而易见的现实意义。

从学术上说,1948年苏南分裂到1954年苏南关系走向缓和期间西方和南斯拉夫的关系,包括本文论述的内容,尚属国际史学界几乎完全未予探究的领域。其原因既在于有关档案资料(主要指美国的档案资料)直至近年来才陆续公布,也在于1989年东欧剧变以前,缺乏促使学者们充分重视这一领域的动因和得以全面考察的历史视角。目前依据这些资料进行探讨,对丰富战后国际关系的研究无疑是有益的。

一、对苏南分裂的最初反应

在开除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情报局决议问世以前,已有一些公开的先兆显示苏南关系行将破裂。1948年1月29日,《真理报》编辑部声明,不同意季米特洛夫关于建立巴尔干联邦或关税同盟的观点,因为这种结合是“靠不住的、硬性制造出来的”。(1)任何政治观察家都很容易明白,这则声明实际上主要针对铁托。苏南矛盾自此公开化。2月中旬,西方一些大报报道,罗马尼亚已撤除了所有铁托画像,“他似乎已失去了莫斯科的信任”。(2)随后,苏联政府宣布,苏南贸易协定续订新约事延迟一年举行谈判。3月中旬开始,苏联从南

斯拉夫迅速撤走所有军事顾问和文职专家。5 月间,南共中央宣布中央委员斯雷坦·茹约维奇和安德里耶·赫布朗因叛国行为被开除出党,南政府则决定以叛国罪对他们提出起诉。(3)然而,对这一系列公开的先兆,美国政府反应迟钝,以致令南政府甚感意外。(4)事实上,正是在苏南关系发生剧烈变动的这段时间里,它偕同英法两国政府发表了严重损害南斯拉夫利益的宣言,要求将的里雅斯特自由区归并意大利。西方舆论大都浑然无知,反而掀起了新的反南宣传浪潮。(5)

情报局决议问世前不久,美国驻南使馆代办罗伯特·里姆斯首先注意到苏南分裂的征兆,并且准确地指出了它们的深远含义。6 月 18 日,他就苏南两国关于多瑙河航行制度国际会议会址进行的争执【注释】有关国家原先主张 1948 年 7 月 30 日在贝尔格莱德举行制定多瑙河航行制度新公约的会议。6 月 12 日,苏联政府建议改在另一个多瑙河沿岸国家举行,但南斯拉夫政府随后表示贝尔格莱德能够、也应当成为该会议的会址。【注尾】向国务院指出:这是“任何卫星国对克里姆林宫共产主义霸主所作的第一个直接的、不可更改的挑战”。他还列举了苏南关系紧张的其他一些例证,包括苏联领导人未像往常那样向铁托发去生日贺电,以及情报局机关刊物抨击某些共产党人“在赞扬和自吹自擂的迷雾中”压制批评和拒不认错。他相信,苏南之间已存在“确凿的裂缝”,其基本原因不是理论分歧而是国家利益冲突,而其意义在于“历史上苏联第一次面对一个在其国境之外、冒险采取独立路线甚或相反路线的业已巩固的共产党政权。”(6)

6 月 28 日,情报局通过决议开除南共。这一对西方来说有如“夏日惊雷”(7)的事件,在美国政府内引起了强烈反响。国务院的苏联问题专家乔治·凯南、查尔斯·波伦和卢埃林·汤普逊等,立即认定这是二战结束后国际共运内部最重要的事态,“可与托洛茨基的落难等量齐观”。(8)6 月 30 日,凯南为首的国务院政策设计室草拟了一项文件,题为《我国政府对南斯拉夫事态的态度》,于翌日获国务卿马歇尔批准。9 月 2 日,它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 18 号文件得到正式采纳。(9)这是美国在苏南分裂后的第一个对南政策纲领。

国家安委会 18 号文件分析了苏南分裂对于西方的意义。它认为:

“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对克里姆林宫的藐视给我国政府造成了一个全新的对外政策问题。现在,历史上第一次在国际社会内可能有了一个这样的共产党国家:它建立在苏联组织原则的基础上,并且在极大程度上依据苏联的意识形态,但独立于莫斯科……

“克里姆林官可以被它自己的仆从之一成功地违抗——这一示范将一个具有根本的深远意义的新因素引入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由于这个行动,笼罩在克里姆林官权力周围的神秘的全威全能、永无谬误的气氛已被击破。脱离莫斯科的可能性,迄今为止对外国共产党领导人是不可想象的,从现在起将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存在于他们的每个人的心中。”

但是,这个文件提醒说,南斯拉夫仍然是个共产党国家,对外反对西方,对内实行“极权主义独裁”,并且仍希望同苏联和好。因此,如果现在认为可以将其视为美国的朋友,那就是犯了“轻浮的、有损尊严的错误”。

这个文件确定,美国应当审慎行事,对南斯拉夫采取不冷不热的态度。它特别强调不要“讨好铁托”。除了上面的原因外,还因为这将被苏联利用来在国际共运和南共党内煽动对铁托的反感,以致损害其地位,促使南斯拉夫重返苏联阵营;而且,这会在美国国内引起强烈的批评。关于美国目前具体的行动方针,这个文件仅规定美国外交官在私下谈话中审慎地表示:(1)美国政府欢迎南斯拉夫真正地独立自主;(2)美国对南斯拉夫的态度主要取决于南斯拉夫对西方国家的行为,美南经济关系的正常发展有待于南斯拉夫在其国际关系中采取“忠实可靠的、合作的态度”; (3)南斯拉夫现行国内制度不变,美南关系就不可能达到亲密的地步,但这在南维持独立的情况下不妨碍两国发展经济联系。

国家安委会 18 号文件显示,美国政府对苏南分裂的最初反应是相当保守的。(10)它没有明确规定支持南斯拉夫的抗苏能力和改变南斯拉夫内外政策这两个目标的轻重缓急

次序。更确切地说,它过多地拘泥于后一个目标。因此,它实际上规定,在经济上支持南斯拉夫必须附带政治上的先决条件。在这个文件中,苏南分裂前南斯拉夫和西方敌对的影响相当明显。而且,它特别反映了马歇尔思想和意愿,这在随后关于是否援南的决策过程中表现得很清楚。

二、是给予援助,还是袖手旁观?

情报局开除南共后,美国驻南使馆立即向华盛顿方面提出援南问题。代理主管使馆业务的里姆斯接连致电国务院,说目前最紧迫的问题是南斯拉夫可能请求美国援助。他认为,铁托没有西方的帮助无法抵御苏联可能的入侵,西方若做出准备支持铁托的姿态,便能有力地影响苏联的行动路线。(11) 使馆陆海军武官也致电国务院,建议通过向南斯拉夫提供充分的支持来“尽可能大胆地利用”苏南分裂。(12)

然而,国家安委会18号文件表明,华盛顿方面对援南问题的态度是保守的。除在前一节末尾列举的那些因素外,苏南分裂尚不彻底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南斯拉夫和苏联在东西方关系问题上依旧联合一致,反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这不仅表现为铁托在情报局决议问世后的第一个政策讲话中强烈抨击“西方帝国主义”,也表现为南政府在7月底至8月中旬关于多瑙河航行制度的国际会议上坚决支持苏联,使会议得以通过西方国家拒绝承认的多瑙河新公约,尽管这个公约的一些重要内容(特别是苏联和多瑙河沿岸各国组成的合股公司主持管理)显著地损害南斯拉夫的利益。(13) 南斯拉夫当时所以如此,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真诚地希望苏联能改变错误做法,使苏南关系得以修复。南共领导人长期以来崇敬和热爱苏联,与苏分裂是迫不得已和十分痛苦的。这种感情以及他们当时的许多政治信念,必然使他们尽可能利用各种机会来表示团结诚意。在向7月中旬举行的南共第五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铁托一方面谴责情报局的无理攻击,另一方面强调南斯拉夫的对外政策同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完全一致。(14) 这次代表大会在“天才的斯大林为首的伟大的苏联万岁”的口号声中结束,会议主要决议之一是责成中央委员会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尽力消除与各兄弟党的误会。(15) 另外,南共领导人还顾虑南斯拉夫许多共产党员和群众缺乏同苏联斗争的心理和思想准备。铁托在1952年回顾说,当时“必须充分注意对苏联的各种幻想,因为这些幻想几乎在我国全体人民中还存在着,或者残存着。当时,对来自苏联的或以苏联名义所制造的各种谎言和诽谤,我们还不敢随意地发泄义愤,只能以严辞答辨。”(16)

不过,南共领导人不会不明白,从苏联当时对南行动的冷酷无情来看,修复苏南关系的可能性不大。因此,要维护南斯拉夫的独立自主,就需要在党员、群众逐渐具备心理承受能力的同时,争取西方援助。战后初期接受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援助(主要由美国政府捐赠)的经验显示,获得西方援助在经济上是很有利的,而在政治上只要有所警觉就不会使南斯拉夫的主权和国内制度受到损害。(17) 7月6日,通过南斯拉夫新闻工作者协会书记,南政府作了谋求美国经济支持的首次非正式试探。这位官员被确信“经南最高当局允准”,向里姆斯探询南斯拉夫将来可指望美国采取什么态度?他示意,南斯拉夫并非全无参加马歇尔计划之意。由于缺乏国务院指示,里姆斯未曾表态。(18)

正在奥地利的美国陆军部副部长威廉·德雷珀和驻欧特别代表艾弗里尔·哈里曼等人闻讯后深感兴趣。德雷珀立即向马歇尔建议:对南斯拉夫的试探作出积极反应,以便鼓励南转向西方和促使苏南关系彻底破裂。他提出如下具体办法:首先由驻南大使派人同南方非正式接触,在确证南希望同西方国家改善关系后,同他本人和哈里曼访问贝尔格莱德,为发展美南贸易关系和提供经济援助作必要的准备。与此同时,哈里曼亦致电马歇尔,表达了类似的意见,并告诫说若对南斯拉夫的试探采取冷淡态度,可能会损害其抗苏的意志。(19)

马歇尔采取的正是冷淡态度。他以目前形势过于“飘泊不定”为由,拒绝接受德雷珀和

哈里曼的建议,还将政策设计室6月30日文件(即后来的国家安委会18号文件)通知陆军部,以便使之明白国务院的政策。两天后,他在内阁会议上汇报了此事,杜鲁门当即同意他的立场。(20)不仅如此,马歇尔还追回了国务院主管部门以他的名义给驻南使馆的一项指示,其中允许使馆向南方表示可考虑扩大美南之间的非战略物资贸易。他规定:不得主动答复南斯拉夫的前述探询,而对南方的任何进一步试探,必须严格按国家安委会18号文件处理。(21)

哈里曼等人并不气馁。7月中旬,哈里曼向德雷珀介绍了他即将提出的新建议:由他以秘密方式主动向铁托表示可就任何问题进行讨论,并且准备供应一艘油轮军用汽油,作为第一项实际援助;如果铁托希望订立全面的美南商约或取得美国贷款,他将表示美国在南斯拉夫作出修改对外政策的实际行动后作出积极反应。德雷珀自告奋勇,说可由他绕过马歇尔直接找总统商议此事。(22)驻苏大使贝德尔·史密斯也对马歇尔的方针不满。他告诉这位国务卿:国家安委会18号文件过于审慎,尤其不适合苏联封锁柏林的目前形势。(23)与此同时,南斯拉夫作出了谋求美国经济支持的进一步尝试。7月25日,铁托对访南的前加利福尼亚州长奥尔森说,南斯拉夫希望同美国签订贸易协定,但未得到美国的积极反应。他还说,任何协定都决不能附带政治条件。奥尔森保证回国后将此项意愿告诉杜鲁门。(24)

在南斯拉夫的一再主动和政府内的异见等诸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下,马歇尔的立场发生了微小的变化。他指示驻南使馆通知南外交部:美国政府注意到铁托同奥尔森的谈话,愿意考虑南政府任何进一步的评论或建议。这一表示实际上不那么明显地越出了国家安委会18号文件。(25)具有类似意义的是,大约在7月中旬,美、英两国悄然同意了南斯拉夫的一项间接请求——购买5万至6万吨原油。(26)

尽管如此,美国政府总的态度仍然是袖手旁观。大约在8月下旬,鉴于苏联撤出钻探专家和设备给南斯拉夫的石油工业造成了严重困难,南驻美使馆向美国公司联系购买尚属禁运品的战略物资——钻井设备。美国国务院坚决不同意发放出口许可证。马歇尔竟向有关驻外使馆解释道,尽管苏南之间已经分裂,出售给南斯拉夫的这种设备仍有可能被转让给苏联。在1948年最后四个月里,南斯拉夫虽然再三请求购买,但终未如愿。(27)

马歇尔的保守政策引起了驻南使馆的强烈不满。代办里姆斯就拒绝出售钻井设备一事致电国务院,直率地指出因为南斯拉夫目前的对外政策而不提供助其抗苏的物资是很不适当的。他认为,美国的政治得益首先在于“国际共产主义的分裂继续存在”,而不在于美国政府过早地期望的南斯拉夫的政治让步。他提出了一个重要建议:悄悄地逐渐放宽对南出口管制,以便在不给美南两国政府带来国内政治麻烦的情况下加强南斯拉夫的抗苏能力。(28)不过,看来只有在马歇尔离任后,此种建议才能被采纳。

三、新形势和新政策

1948年末到1949年初,南斯拉夫的对外政策、苏南关系和美国政府内部,出现了若干促使美国改变袖手旁观政策的新形势。随着柏林危机的全面展开和加剧,美国政府强烈地关注欧洲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而南斯拉夫在这种情势下会采取什么立场,自然是有关部门认真考虑的问题。驻苏使馆代办科勒致电国务院,说如果战争爆发,南斯拉夫不仅很可能迟早站在苏联一边参战,而且会表现得比其他东欧国家更积极。驻南使馆也认为,南斯拉夫有可能加入苏联方面作战。但它同时指出,随着苏南分裂的扩大,这种可能性日益减小,因为铁托一定明白,不管何方获胜,他参战只会导致自己“完蛋”。(29)国务院的看法介于两者之间,认为铁托有可能站在苏联方面参战,但同时不让苏军有过境权。(30)无论如何,这些看法都是以当时的一个事实为前提的:在东西方对抗中南斯拉夫仍同苏联保

持一致。然而,正当美国官员们费心估算之际,铁托发出了南斯拉夫在这个重大问题上立场有所变化的第一个信息。10月5日,他告诉访南的美国电影协会主席埃里克·约翰逊:如果苏联和西方之间确实爆发战争,南斯拉夫的立场将取决于谁是战争的发动者以及“当时的情势”。约翰逊在进一步追问后得到的明确印象是,南斯拉夫将尽可能维持中立。(31)迄此,美国政府把南斯拉夫改变对外政策当作发展经济关系的前提条件,现在从它的观点看,至少出现了这个条件可能得到满足的趋势。

南斯拉夫对外政策的上述初步变化是苏联反南行为日益加剧的结果。里姆斯在7月间曾大致正确地报告说,苏南分裂尚限于党际关系,国家关系中的对立仅出现于南阿之间,以及“不明确地”出现于南捷之间。(32)这种情况很快就过去了。苏联及其他东欧国家不仅越来越激烈地抨击和中伤南斯拉夫政府,断绝同南斯拉夫的各种文化联系,而且逐渐加大对南经济压力。1948年底,它在这方面的努力开始进入实行经济封锁的阶段。12月28日,在拒绝南斯拉夫政府关于大体维持两国贸易水平的建议后,苏联政府宣布将1949年的苏南贸易额减为1948年的1/8。(33)随后,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协调对南经济封锁,苏、波、捷、保、罗、匈六国于1949年1月25日宣布成立排斥南斯拉夫的“经济互助委员会”(经互会)。显然,如果南斯拉夫的对外经济联系不转向西方,不多久它的经济生活乃至生存就会处于危险之中。美国官员从中看到了得益的机会:发展对南贸易不仅有助于争取南斯拉夫成为亲西方国家,而且可以利用它丰富的有色金属矿藏以及木材和农产品促进西欧经济复兴。(34)从反面说,维持袖手旁观政策,只会帮助苏联的经济封锁达到目的。

与此同时,美国外交决策层的人事变动提供了促使对南政策改变的一个重要因素。1949年1月21日,迪安·艾奇逊继马歇尔任美国国务卿。如后所述,艾奇逊就职后,美国政府在处理对南关系方面迅速采取了一些新的指导原则,为持久地援助南斯拉夫并使援助等级步步提高奠定了基础。艾奇逊的一般对外政策思想和政治经历如何影响他对南斯拉夫问题的看法,他个人在对南政策的变化中起了哪些具体作用,是十分复杂或依靠已公布的史料不足以回答的问题。但是,一个与此有内在联系的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他就职前后,美国政府内关于中国共产党和苏联之间关系的主流看法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马歇尔主持国务院期间,把中国共产党完全视为苏联附庸的观点始终占压倒优势,而艾奇逊继任后,却立即确认中国共产党和苏联之间存在“倾轧的萌芽”。他和他的主要僚属们认为,“毛泽东不是真正的仆从”,中苏分裂从长远来说是可能的。(35)这一现象,至少有助于肯定他在对待国际共运方面远比马歇尔精细。

1948年12月底,南斯拉夫提出向美国出售大量有色金属,条件是美国政府同意向南出售属于战略物资的一座炼钢厂。这项建议在美国政府内引起了一场事实上的辩论,其规模虽小,却广泛、深入地涉及处理对南关系的基本指导原则,并且反映出主张修改对南政策的意见渐臻于成熟。当时,驻苏代办科勒提出,不管如何对待南斯拉夫的上述建议,美国在准备长期援南以前应当仔细考虑四个问题:“(1)我们是否能心安理得地支持铁托这样的政权?(2)尝试拯救他是否事实上符合我们的长远利益?(3)在苏联集团的经济压力外加上西方的经济压力,是否会导致铁托倒台?(4)如果是,那么我们是否能够或应当在此同时采取步骤,其用意是谋求他被一个较有代表性的、亲西方的政权所取代?”

(36)科勒的倾向是相当明显的。大致针对他的这些问题,驻南大使卡文迪许·坎农接连致电国务院:若以南斯拉夫政府的性质为由对其命运无动于衷,便是无视南斯拉夫问题的国际意义,无视它在损害苏联势力方面的价值;期望铁托垮台将导致“较有代表性的”、亲西方的反共势力上台不过是无知的妄想,因为这些势力,无论是国内的或流亡国外的,都缺乏领导、组织、纲领等等;而且,鉴于情报局无情的、紧密结合的力量,如果南政府由于反共势力的活动而被削弱,或者由于西方的压力而作出过早松弛其国内控制的政治让步,那么真

正的受益者只会是苏联。“在南斯拉夫,要么是铁托,要么是苏联仆从,没有第三种选择。”(37)

坎农的看法符合国务院新领导的思想倾向,并且为之澄清了有关问题。1949年1月下旬,国务院决定同意发放炼钢厂出口许可证,并重新审议对南贸易政策。这项工作的第一个具体成果是发放5座流动修理站和数千个拖拉机轮胎的对南出口许可证。(38)接着,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在副国务卿詹姆斯·韦布的主持下联合拟订了关于放宽对南出口管制的建议,其宗旨是帮助南斯拉夫抵御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的经济封锁,从而维持“作为情报局体系之癌瘤”的铁托政府。(39)

在这一建议的基础上,国家安全委员会于2月17日采纳了新的对南政策纲领——国家安委会18/2号文件《美国 and 南斯拉夫之间的经济关系》,于翌日获杜鲁门批准。这项文件在关于1949年美南关系的美国外交档案公布时尚未解密,但从已公布的其他资料中,可得知其主要内容。它认为,放宽对南出口管制不仅可以使南斯拉夫得到迫切需要的物资,从而维持其抗苏能力,而且还可以造成两个结果:加强西方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诸方面对南政府的吸引力,以致最终争取把它拉入西方阵营;使美国通过美南贸易的发展增加有色金属的进口和战略储备。在说明前一个结果时,这项文件引人注目地确认:若为改变南国内体制而过早施加压力只会增加铁托被苏联推倒的危险,但在提供经济支持的同时主要依靠西方的吸引和苏联的压迫自然发生作用,同时择时施加适当压力,则有可能促使南斯拉夫的国内体制发生西方希望的变化,更可能导致南改变对西方的政策。这样,大体而言,南斯拉夫的政治让步从援助的先决条件变成了期望援助所产生的附带结果。这是美国对南政策指导原则的一项重大变化。关于放宽出口管制的具体内容,定为除与航空有关的物资继续禁运外,其他所有各类战略物资将按照南斯拉夫申请购买的项目,由商务部在国务院的指导下并与国防部协商,逐项个别审理是否出售,非战略物资的对南出口则不加政治限制。(40)总之,美国原则上不再像对待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那样把南斯拉夫当作严厉的出口管制(特别是战略物资禁运)的对象。

国家安委会18/2号文件制定后,美国对南出口大幅度增长。1949年2月下半月起,三个月内美国政府共为1718.1万美元商品颁发出口许可证,比1948年全年增加了42%。在这些商品中,包括一些过去禁运的战略物资,例如10台石油钻机和1万吨车用汽油。1949年11月,在国家安委会18/2号文件规定禁运的唯一的一类战略物资——航空物资——方面,出口管制亦予局部放宽:民航飞机和设备、航空汽油以及航空润滑油成了经审批可以对南出口的物品。(41)

然而,美国态度的变化是有限的。国家安委会18/2号文件关于放宽出口管制的原则与其实践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别。美国政府不时干脆拒绝出售南斯拉夫请求购买的战略物资,即使它们往往只具有很间接的军事意义。在同意出售的场合,有时也需经过旷日持久的谈判和审批过程,并且打下各种折扣。甚至迟至1950年年底,美国驻南大使仍在抱怨对南出口管制仍过于严厉,即使“少量的军用品或具有潜在军事意义的物品”仍难以得到出口许可证。(42)直到1954年2月,美国政府才决定在出口管制方面给予南斯拉夫欧洲盟国待遇。

美国态度变化的有限性很大程度上起因于对南斯拉夫内外政策的强烈不满。1948年末到1949年上半年,南斯拉夫的外交态势虽然已有所变动,但总的来说依然是站在苏联一边反对西方。同时期内,它的国内政策不仅没有发生美国希望的变化,而且在经济方面过左倾向还有所加剧。(43)这些内外政策状况显然影响到美国政府提供经济帮助的意愿,尽管影响的程度已随国家安委会18/2号文件的问世而减小。

四、援助是否附带政治先决条件?

从导致美国放宽对南出口管制的决策过程可以看出,美南关系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对南援助是否附带政治性质的先决条件。它同国家主权和意识形态这两个最重要、最敏感的因素紧密相连,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西方和南斯拉夫之间关系发展的可能性及其模式。因此,有必要在先前各节的基础上,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的综合说明。

南斯拉夫的立场一开始就很明确。如前所述,铁托在 1948 年 7 月向访南的美国政治家奥尔森强调,发展美南贸易不能附带政治条件。两个多月后,他又对美国电影协会主席埃里克·约翰逊说,南斯拉夫虽然渴望从西方购买物资,但不能同意附加政治条件。(44) 1949 年 7 月,他在著名的普拉演说中重申了这种立场,说南斯拉夫同西方建立经济关系,但不作任何政治让步。(45) 铁托当然知道,南斯拉夫同西方大国大体上只在防止苏联控制南斯拉夫这一点上利益一致,而在对外事务的其他重要方面存在利益冲突,南斯拉夫的国内体制更是西方仇视的对象。如果为取得西方的经济支持而放弃抗苏以外的国家利益,代价未免过高,如果为此而取消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制度,那更是不可接受的。当然,同其他国家一样,南斯拉夫也必须确定各项对外政策目的的轻重缓急次序,从优先考虑抗苏出发修改政策。而且,南共领导逐渐认识到,本国现行体制的许多方面确有改革的必要。但是,内外政策变动及其方式、时间、幅度和范围应当由南斯拉夫自主决定,而不是由西方发号施令,否则这种变动难免导致南斯拉夫丧失过大、过多的国家利益,丧失革命的主要成果乃至独立本身,并且危及抗苏的根本依据——南斯拉夫人民对本国政府的信赖和拥护。与此同时,铁托显然估计在东西方冷战激烈进行的形势下,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不大可能会由于南斯拉夫的上述立场而坚持不提供维持南抗苏能力所需的支持,因而南斯拉夫在抵制西方政治压力和干预的同时取得其援助是完全可能的。如果择时作出次要的、局部的妥协,还能在保持自主权的情况下使援助成为尽可能充分的和优惠的。

在援助是否附带政治先决条件的问题上,美国政府内曾有分歧。一种观点是必须附带此种条件。国家安委会 18 号文件相当明显地体现了这种观点。驻英大使刘易斯·道格拉斯在 1948 年 7 月底给国务院的一封电报中说得更直率。他建议通知铁托:要建立同美国的长久贸易关系,就必须满足根本改变对外政策这一先决条件。(46) 一个月后,马歇尔在决定拒不出售钻井设备时说,不要把将来出售的大门关死,因为有可能利用南斯拉夫对此种设备的急需谋取“政治上足够大的让步”。(47) 所有这些都是要利用、甚至加剧南斯拉夫的困难,追求苏南分裂前确立的对南政策旧目标,而漠视了苏南分裂造成的新需要。与此相关、但远为极端的一种倾向,是设想利用南斯拉夫国内外的反共分子推翻处于困难中的南共,建立附属于西方的政权。(48)

美国政府内的另一种观点,是应当尽可能争取南斯拉夫作出政治让步,但这不应当是援南的先决条件。驻南使馆是这种观点的最积极的提倡者和最系统的阐述者。它的出发点,在于确认维持南斯拉夫对苏联压力的抵抗是美国在对南关系中的最大利益所在,如果改变南斯拉夫对外政策和国内体制的追求于之有碍,就应当暂缓,或者只付出较小的努力。这种观点的持有者对南斯拉夫坚持独立自主、抵制西方干预的决心有较清醒的认识,认为美国过于急切地谋求政治让步是徒劳的。(49) 他们希望主要依靠苏联压力的加剧,依靠与援助和其他交往相伴随的西方影响以及运用得当、适可而止的外交说服或压力,耐心地、持久地谋求改变南斯拉夫的对外政策和国内体制。(50) 可以说,这里已经有了未来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政策的萌芽。

在有一点上,上述两种观点的持有者是一致的,即所要争取的政治让步首先是南斯拉夫改变对西方的行为,其次才是改变国内体制。国家安委会 18 号文件已经如此安排了这两项目标的次序。1950 年初,驻南代办里姆斯在南斯拉夫同西方的关系已有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写道:“对我们来说很明显,南斯拉夫政府虽然坚定不移地决心维持共产主义,但它正

在清楚地显示同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形成比较正常、比较友好关系的意愿。对我们来说，克里姆林宫的共产主义和我们可合理地期望的南斯拉夫政策的本质区别就在于此。”（51）这一次序安排的原因，在于西方在南斯拉夫对外政策问题上的利益比较直接，比较紧迫，也在于这方面的利益当时总的来说比较容易获取。

然而，促使南斯拉夫国内体制发生质变仍是美国孜孜以求的终极目标。一项在政府内部使用的国务院政策声明对此作了集中的表述。其中写道：

“美国对南政策的根本的长期目标，是该国重新成为世界共同体的一个民主的和独立的成员……

“在最近的将来，达到我们在南斯拉夫的根本的长期目标的可能性，同达到维持铁托存活的目标的可能性相比，是不利的。尽管如此，我们仍必须记住，美国及其代表的生活方式在南斯拉夫人民中有许多赞赏者。所以我们应当继续显示，铁托许诺但不兑现的经济安全和富裕，事实上能够在不依靠压制个人自由和公民权利的情况下实现。因此，我们应当用我们自己的榜样，并且通过我们的报道工作，不断地提醒南斯拉夫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是值得向往的。”

应当补充说，美国追求其终极目标的手段事实上并非限于“显示榜样”和“报道工作”。

五、结束语

放宽出口管制是美国向南斯拉夫提供经济支持和援助的开端。随着苏联对南压力的升级和南经济、财政困难的加剧，美国于1949年9月起对南提供信贷和贷款，而后又于1950年11月起提供无偿经济援助。对南经援等级的这些提高，都是在美国政府内没有发生重大政策争论的情况下比较顺利地实现的，因为关键的决策难题已经在本文论述的转变过程中得到了解决。

美国从1949年初起的对南政策，从支持南斯拉夫的抗苏能力以及建立和加强南斯拉夫同西方的友好关系而言，是成功的。取得成功的一大前提，在于明智地安排三种利益的轻重缓急次序：（1）冷战中的基本地缘战略利益，即维持南斯拉夫抵御西方头号对手——苏联的能力；（2）间接战略利益，即“改善”南斯拉夫对西方的政策，主要是扭转南斯拉夫对其亲美邻国（希腊、奥地利、意大利等）的政策及其在东西方对抗中的反西方态势；（3）意识形态利益，即改变乃至取消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制度。维持南斯拉夫的抗苏能力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在对其他两项利益的追求妨碍这项利益时，美国一般是把前者暂时搁置起来，或者只为之作较小的努力。三者之中，意识形态利益被当作最不急于实现的和最长远的。概括地说，美国对南政策的一个基本问题（事实上也是它对于任何与之和平交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的一个基本问题），在于如何处理当前目标与长远目标的关系，而其处理方式又决定了如何对待援助与政治条件（或广而言之给予利益与获取政治让步）的关系。另外，美国在追求意识形态利益方面所以比较耐心和审慎，还因为它至少模糊地认识到，对实现其长远目标而言，重要的往往不是某些具体问题上的外交或经济压力，而是通过与南斯拉夫广泛交往获得的施加经济、文化影响的长远机会。美国政策的这些特征加大了南斯拉夫政府抵制美国干预的余地，同时又使它维护本国社会主义性质的任务变得更加复杂和艰巨。

注释：

（1）弗拉吉米尔·杰吉耶尔：《铁托传》（中译本），三联书店1963年版，下册，第110—111页。

（2）杰吉耶尔：《铁托传》，下册，第121页。

- (3) 乔治·霍夫曼和弗雷德·尼尔:《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上卷,第157页;杰吉耶尔:《铁托传》,下册,第150页。
- (4) 马歇尔致某些驻外机构,1948年7月6日,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8年第4卷,华盛顿1974年版,第1084页。
- (5) 杰吉耶尔:《铁托传》,下册,第127,132页。
- (6) 里姆斯致马歇尔,1948年6月18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8年第4卷,第1073—1075页。
- (7) “东方集团的缺口”,伦敦《经济学家》,1948年7月3日,第2页。
- (8) 助理国务卿帮办韦斯纳致驻欧特别代表哈里曼,1948年7月22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8年第4卷,第1020页。
- (9) 政策设计室草拟之文件,1948年6月30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8年第4卷,第1079—1081页。
- (10) 英国外交部更是如此。它决定用“怀疑的眼光”看待南斯拉夫任何可能的援助请求,不改变英国对南政策。见国务院南欧科官员梅里尔所作电话谈话备忘录,1948年7月3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8年第4卷,第1084页。
- (11) 里姆斯致马歇尔,1948年6月29日和30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8年第4卷,第1076,1078页。
- (12) 帕特里奇和斯威策致马歇尔,1948年6月30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8年第4卷,第1076—1077页。
- (13) 驻南大使坎农致马歇尔,1948年8月12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8年第4卷,第1100—1101页;约翰·坎贝尔:“多瑙河外交”,《外交》季刊,第27卷,第2期(1949年1月),第322—324页。
- (14) 《铁托选集(1926—1951)》,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29—430页。
- (15) 丹尼森·拉西诺:《南斯拉夫的实验》(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42页。
- (16) 杰吉耶尔:《铁托传》,下册,第174页。
- (17) 参见杰吉耶尔:《铁托传》,下册,第42页;霍夫曼和尼尔:《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上卷,第106—107页。
- (18) 马歇尔致某些驻外机构,1948年7月6日;马歇尔致哈里曼,1948年7月8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8年第4卷,第1084—1085,1092页。
- (19) 德雷珀致陆军部长罗亚尔,1948年7月6日;哈里曼致马歇尔,1948年7月7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8年第4卷,第1085—1086,1088页。德雷珀和哈里曼的建议提出之前,得到了负责占领区事务助理国务卿帮办弗兰克·韦斯纳、陆军副参谋长阿尔伯特·魏德迈和驻奥美军司令杰弗里·凯斯等的赞同。
- (20) 马歇尔致罗亚尔备忘录,1948年7月7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8年第4卷,第1087页。
- (21) 里姆斯致马歇尔,1948年7月7日;马歇尔致哈里曼,1948年7月9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8年第4卷,第1091,1092—1093页。
- (22) 马歇尔致驻苏使馆,1948年7月21日;韦斯纳致哈里曼,1948年7月22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8年第4卷,第1094,1095页。
- (23) 史密斯致马歇尔,1948年7月23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8年第4卷,第1097页。
- (24) 里姆斯致马歇尔,1948年7月26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8年第4卷,

第1097—1098页。

(25) 马歇尔致驻南使馆, 1948年7月28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1948年第4卷, 第1099页。

(26) 韦斯纳致哈里曼, 1948年7月22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1948年第4卷, 第1095页。

(27) 马歇尔致某些驻外使团, 1948年9月3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1948年第4卷, 第1105—1106页。

(28) 里姆斯致马歇尔, 1948年9月14日和15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1948年第4卷, 第1106, 1109—1110页。

(29) 科勒致马歇尔, 1948年9月26日; 里姆斯致马歇尔, 1948年9月27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1948年第4卷, 第1110, 1111页。

(30) 代理国务卿洛维特致驻南使馆, 1948年10月1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1948年第4卷, 第1112页。

(31) 里姆斯致洛维特, 1948年10月5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1948年第4卷, 第1113页。

(32) 里姆斯致马歇尔, 1948年7月7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1948年第4卷, 第1090—1091页。

(33) 《1949至1950年国际事务文件》, 皇家国际事务学会主持发行, 伦敦1953年版, 第442页。

(34) 驻南大使坎农致马歇尔, 1949年1月10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1949年第5卷, 华盛顿1976年版, 第854—855页。

(35) 时殷弘:《杜鲁门政府对新中国的政策: 从敌视到战争的历史回顾》(博士学位论文, 1988年4月), 第一、二章。

(36) 科勒致马歇尔, 1949年1月13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1949年第5卷, 第856页。

(37) 坎农致艾奇逊, 1949年1月31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1949年第5卷, 第858—860页。

(38) 坎农致马歇尔, 1949年1月10日, 注释4,《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1949年第5卷, 第855页。

(39) 副国务卿会议记录, 1949年2月14日; 副国务卿会议草拟之文件, 1949年2月14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1949年第5卷, 第863—866, 866—868页。

(40) 同注(39); 艾奇逊致驻南使馆, 1949年2月25日和4月1日; 国务院欧洲司司长希克森致商务部助理部长布莱斯德尔, 1949年4月20日; 国防部长约翰逊致艾奇逊, 1949年7月28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1949年第5卷, 第873—874, 879—880, 884, 912页。

(41) “当前的经济事态”, 1949年6月20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1949年第5卷, 第902页; 理查德·斯特宾斯:《世界事务中的美国(1949年)》, 纽约1950年版, 第261, 542页。

(42) 驻南大使艾伦致艾奇逊, 1950年12月29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1950年第4卷, 华盛顿1980年版, 第1515页。

(43) 限于篇幅, 对这些问题不作详述和引证。

(44) 里姆斯致洛维特, 1948年10月5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1948年第4卷, 第1113页。

〔45〕斯特宾斯：《世界事务中的美国（1949年）》，第253—254页。

〔46〕道格拉斯致马歇尔，1948年7月27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8年第4卷，第1099页。

〔47〕马歇尔致某些驻外使团，1948年9月3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8年第4卷，第1105页。

〔48〕英国外交档案显示，这正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对苏南分裂的最初反应。见伊丽莎白·巴克：《夹在超级大国之间的英国人（1945—1950）》，伦敦1983年版，第163页。

〔49〕里姆斯致马歇尔，1948年9月14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8年第4卷，第1106页；坎农致马歇尔，1949年1月10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9年第5卷，第855页。

〔50〕除前述国安委会18/2号文件外，又见：坎农致艾奇逊，1949年1月31日；欧洲司副司长汤普逊所作谈话备忘录，1949年2月17日；艾奇逊致驻南使馆，1949年2月25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9年第5卷，第861，870—871，874页。

〔51〕里姆斯致艾奇逊，1950年1月7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0年第4卷，第1349—1350页。

〔52〕国务院政策声明，1949年9月1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9年第5卷，第941页。

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期间 美国的台湾政策

郑永平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50年代中后期台湾海峡曾几度出现紧张局势，成为远东地区的一个热点，尤其是1958年夏秋之交由金门炮战而引发的危机几乎走到中美两国为台湾问题兵戎相见的地步。本文主要着眼于回顾这次危机期间美国的台湾政策的演变，分析美国当时对台政策的内容和目标，探究美国的台湾政策的历史发展轨迹。

一、1958年炮击金门前夕美国的政策考虑

自从第一次台海危机结束后台湾海峡地区相对地平静了几年，但产生紧张局势的根源并未消除。

台湾当局把1/3的兵力部署在金、马地区，并不断对大陆进行袭扰。中国原来希望通过中美大使级谈判能在台湾问题上有所突破，但美国始终不肯让步，并且单方面降低谈判级别，促使中国重新考虑对美工作的政策和方式。而炮击金门，直接遭受打击的是台湾当局，

美国不便找到干涉的借口。这样既能惩罚国民党军又能对美示威,而且不致引起国际性冲突。在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的心目中“解放台、澎、金、马”始终是既定目标,这方面的准备工作从未间断过。1957年12月18日毛泽东指示空军于1958年入闽。1958年4月福州军区制订完成了封锁金门的作战方案。1958年7月18日,毛泽东召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和海空军负责人开会,明确提出以地面炮火为主对金门实施两至三个月的封锁。随后中央军委会议预定从7月25日开始炮击,后经毛泽东下令推迟了炮击时间,准备“等彼方无理进攻,再行反攻”。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福建前线部队加紧部署,与台湾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制空权的战斗。

当时,美国正忙于对付中东事件,但台海地区日益紧张的局势不能不引起它的注意。8月5日驻台美军司令部为了对抗进入福建各机场的米格-17战斗机,特意从菲律宾基地调来一批F-100D战斗机。8月8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指责中国在沿海地区集结空军是蓄意加剧紧张局势,声称美国对此正加以“密切注视”。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8月6日接到美国情报部门提请他注意台湾海峡局势的报告。美国对于中国可能采取的行动和意图做了种种估计。鉴于赫鲁晓夫7月底8月初刚对中国进行了访问,并在8月5日宣布他拒绝出席东西方最高级首脑会谈,美国认为中国此时重又在台湾海峡地区制造紧张局势,很可能是受苏联的唆使,想把全世界的注意力从黎巴嫩引向远东,以便使世人以为苏联仍在采取攻势,也可能是想利用台湾问题再次分化西方联盟。美国估计中国可能采取的行动有:

- (1) 对沿海岛屿发动两栖进攻。
- (2) 封锁沿海岛屿,断其粮源。
- (3) 对台湾发动两栖进攻。
- (4) 既对沿海岛屿也对台湾发动两栖进攻。

美国政府认为这几种可能发生的情况无论哪种其后果都是严重的。如果中国对沿海岛屿发动两栖进攻,在没有美国干预的情况下,它可以凭借强大的炮火和空中力量的支持,不顾重大伤亡而在一天或数天内攻占金门;如果中共封锁沿海岛屿,而岛上的守军不能冲破封锁,美国又很难找到新的办法来鼓舞驻岛守军的士气的话,实际上美国也的确很难找到这种新办法,因为美国不可能在台湾海峡地区长期维持庞大的武装力量,那么,国民党军的士气和防守能力就会下降并且可能最终崩溃。如果金门被攻占或金门守军不战而降,那将会沉重打击台湾当局的威信和削弱台湾的军事能力,使它无力对付内部的颠覆活动和进行军事行动,结果可能导致出现一个最终将与大陆合并并取消美国驻台基地的政府。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岛屿锁链”便被从中截去一环,美国在西太平洋的遏制防线将受到严重的危害,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基地,包括冲绳在内,都可能变得难以维持或无法使用,日本、南朝鲜、菲律宾、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亚、柬埔寨、老挝和缅甸可能会完全处于共产党的影响之下。尤其严重的是,具有巨大工业潜力的日本可能被纳入中共和苏联的轨道。尽管这些情形不会马上出现,但是如果共产党的第一击得手,那么不消几年土崩瓦解之势就会接踵而来。(1)对美国而言,这种局面的后果甚至比当年“丢掉中国”更为不幸,影响也更为深远,而且,西太平洋和东南亚的这些事态发展的冲击力还将产生严重的世界性影响。

艾森豪威尔本人对这种多米诺骨牌效应深信不疑,因而他认为在目前情形下金门马祖的安全进一步关系到台湾的安全。美国决心用军事力量甚至核武器来干预可能即将发生的沿海岛屿危机。由于解放军的飞机可以从各个非常分散的地点起飞,然后集中火力轰炸沿海岛屿或台湾、澎湖,因而用常规武器来消除一个又一个分散在各地的机场是十分不现实的,至少是极其困难的,所以美国考虑使用核武器来袭击这些机场。尽管考虑到这样做不可避免地会在一定时间内引起全世界对美国的反感,但是美国权衡利弊得失,仍然认为在不得已而使用核武器的时候,如果使用的当量比较小,事情结束得比较快,那么由此而引起的后果要比由

于无所作为而招来的政治上的灾难更少些破坏性。为了慎重起见,艾森豪威尔把是否动用核武器的决定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不肯下放给驻远东美军的指挥官。他还指示美国最初的干预行动将限制在仅对船只和机场进行空袭而不对大陆内地发起进攻。

以上情况表明,台海地区将出现紧张局势的迹象已引起美国最高当局的高度重视,并且对于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也作了一定的预测推断,预先制定了一些应付的措施。但是对于中国的真实意图还不能完全肯定,美国的应对措施只能根据中国采取的行动的强度、范围和其他实际情况而定。因而在是否要就美国的意图发表一个直接的、强烈的声明这个问题上美国军方和国务院产生了意见分歧。国务院非常赞成发表声明,而参谋长联席会议却主张暂时先“让共产党猜不透”,理由就在于美国很难事先明确自己将会怎样进行干预。美国既不能承诺用武装部队去保卫被国民党称为沿海岛屿的每一块礁石,又不能肯定地指明美国将会保卫哪几个岛,如果这样做就有可能给对方传递去错误的信息,鼓励他们去占领其余的未被点名的岛屿。再者,美国不但要使对手猜不透,而且还必须使蒋介石也猜不透美国在什么情形下会支持他,只有这样,才能抑制他对大陆的主动进攻。美国政府内部讨论的结果是先以公开发表杜勒斯复众议院外委会主席摩根函的方式表达美国的立场。8月23日,摩根公布了当天杜勒斯给他的回信。杜勒斯在信中提到近几年来金、马与台湾之间的联系已变得更加紧密,因而“任何人如果把中国共产党人企图以进攻和设法占领这一些岛屿来改变局势的行动当作或认为是‘有限的行动’,将是非常危险的。”〔2〕

在美国政府内部酝酿其政策的同时,毛泽东在北戴河下了最后的决心。8月20日,他决定先以炮火封锁金门,再视情况而定是否登岛作战,走一步看一步。

二、危机初期美国的政策

1958年8月23日下午5时30分,福建前线炮兵部队同时向金门密集射击,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正式爆发。

从8月23日到9月11日,美国的态度比较强硬,协助台湾守卫金门的具体措施接连出台。

8月23日,杜勒斯在去安大略湖度假行前接到中央情报局关于中国炮击金门的报告,他立即起草了致代理国务卿赫特和助理国务卿罗伯逊的备忘录,他提出:

1. 如果中国的炮击造成局势危险,可能需要第三国进行干预。
2. 台湾对大陆的反攻活动有利于维持国民党军的士气,但对大局恐怕很难有实际的影响,因为要改变中国或东欧,主要在于内因而非外因。
3. 美国应该要求中共不以武力改变台海局势,但是无法要求中共对台湾利用沿海岛屿从事反攻活动的行为淡然处之。
4. 如有可能,应把台海局势交给安理会讨论。〔3〕

8月25日,白宫秘书对新闻界传出消息说,艾森豪威尔总统正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特文宁上将举行两周一次的例行会晤,美国政府自然正在密切注视远东的局势。〔4〕这一天艾森豪威尔主持会议讨论了金门局势,做出几项具体决策:

1. 向台湾提供导弹和登陆艇。
2. 美国空军部队接管台湾本岛的空防。
3. 准备为金门运补行动提供海上护航。
4. 由驻关岛的战略空军B47飞行中队做好对中国大陆目标实施核打击的准备。

参谋长联席会议改变了原来的立场,要求发表公开声明,阐明美国的方针,遭到艾森豪威尔的拒绝。〔5〕

8月25日,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宣称,鉴于台湾海峡区域内的炮击

活动已有所增加,远东方面的美国第七舰队及其他美国海军部队已奉命采取正常的戒备性防御措施。(6)当时第七舰队拥有进攻型航空母舰3艘、防潜艇航空母舰1艘、重巡洋舰2艘、驱逐舰36艘、潜艇4艘、辅助舰艇20艘。8月26日,第七舰队司令毕克莱乘旗舰“海伦纳”号重巡洋舰到达高雄,宣布美台将于9月初在台湾南部枋寮地区举行联合演习。(7)8月27日,美国空军第13航空队司令摩曼从菲律宾飞抵台湾与陈嘉尚和王叔铭商谈台湾空防问题,随后美台举行了联合防空演习。8月28日,美国又从地中海舰队抽调“埃塞克斯”号航空母舰和4艘驱逐舰前来远东,增援第七舰队。所有这些行动艾森豪威尔都命令国防部有意识地向报界透露一些消息,以便引起中国的注意,目的在于向中国施加压力。

8月27日,艾森豪威尔在记者招待会上谈到台湾海峡局势时说,他完全同意杜勒斯8月23日致摩根信中所表达的立场,这一立场就是美国目前的立场。他承认由于台湾把1/3的部队部署在金门等沿海岛屿上使得这些岛屿对于台湾、澎湖防务的重要性已经比以前有所增加,他接着提到1955年通过的“台海决议案”曾授权他可以动用美国武装部队保卫对于台、澎有重大意义的有关阵地和领土,但他又拒绝明确说明美国是否会与中国在金门直接交锋。关于使用核武器问题,艾森豪威尔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只有当美国本土先遭受攻击或当美国部队首先遭受攻击时,负责防御的战地指挥官才有权使用一切武器;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战地指挥官事先不得到他本人的授权,他也不认为他们有权使用核武器。(8)

黄少谷、俞大维都对艾森豪威尔的声明表示欣慰,认为来的“极是时候”,但台湾最高层并不这么容易满足。正在美国访问的宋美龄在全美律师协会年会上发表演讲,敦促美国发表明朗的声明。她强调沿海岛屿对台湾防务极为重要,对沿海岛屿的攻击就是对美台共同防务条约的攻击。(9)蒋介石8月27日、9月4日两次致函艾森豪威尔,要求:

1. 美国、台湾联合显示武力以遏制中国的进攻。
2. 美国同意台湾轰炸金门对岸的炮兵阵地和海空基地。
3. 艾森豪威尔发表声明,明确表明对金门的攻击就是对台湾的攻击,美国将用武力来反击这种攻击行为。
4. 美国第七舰队对金门运补提供护航。
5. 艾森豪威尔授权驻台美军司令有权可以不必事先请示白宫而采取必要的措施。〔10〕

此时,在遭受一连几天的炮火猛袭之后,金门物资已日见匮乏。台湾当局向金门派出的运输补给的船队又连遭打击,经常是船队刚刚抵达料罗湾码头即招来炮火猛袭,不得不迅速退走。自8月27日起,台湾当局改变了运补方式,采取缩短航程,减小目标,改变卸载时间和方式等办法向金门运补。针对这种情况,彭德怀电令加强对金门的封锁。在海、空力量的严密封锁下,金门运补行动一再中断,当地守军处境更为困难。

面对持续紧张的台海局势,美国决定进一步干预。8月28日国务院发表声明重申:任何人如果把中共企图以进攻和攻占这些岛屿来改变局势的行动当作或认为是“有限的行动”,那将冒极大的危险。8月29日,艾森豪威尔召见代理国务卿赫特等人,讨论台海局势,他最初不愿让第七舰队为金门运补提供护航,但是海军上将伯克报告说,国民党的海军力量不够强大,经验也不足,没有美国的帮助难以保证对金门的供应,于是艾森豪威尔同意提供护航,但严格命令美国舰只必须停在离卸货的海滩3海里以外的公海上。他希望这样做既能为金门运补船队的绝大部分旅程提供保护,又避免了美国舰只在中国领海内与中国发生冲突。

(11)美国在9月30日把这一决定通知了台湾方面。

9月2日,杜勒斯从休假地返回华盛顿。次日,美国政府决策层就台海局势进行磋商,确定下一步对策。杜勒斯全力支持使用战术核武器袭击中国的机场,

(12)而艾森豪威尔对此却颇为犹豫,他担心如果美国对中国机场进行核打击,很可能招致苏联对台湾进行核报复,从而使局部冲突蔓延扩大,影响美国的全球战略。在他的心目中

始终猜疑中国最近的军事行动是得到苏联同意的。(13) 在这种情况下, 他不打算动用核武器,(14) 但又必须制止中国的行动, 于是, 经他授权, 杜勒斯 9 月 4 日在新港发表声明, 全面阐述美国对台海危机的观点。这份声明重复和强化了美国对台湾和沿海岛屿的政策。它声称: 美国负有条约义务来保卫台湾, 国会的联合决议则授予总统有使用美军来确保和保护像金门、马祖这样的有关阵地的权力。虽然美国总统还没有根据该决议判定使用美国武装部队是保卫台湾所必需或适当的, 但是如果他断定有此必要时, 他会毫不犹豫地使用这种权力。美国已经认识到确保和保护金门、马祖同保卫台湾日益有关, 美国已经作出军事部署, 以便一旦总统作出决定时接着采取既及时又有效的行动。(15) 杜勒斯在这份声明中除了对中国发出威胁外, 也暗示愿意继续与中国就台湾问题进行谈判。(16)

正当美国积极准备进一步干预台海局势的时候, 毛泽东于 9 月 3 日晚决定, 福建前线自 9 月 4 日起停止炮击三天, 以观各方动态。中共中央政治局于 9 月初召开会议, 讨论中美关系。王炳南奉命专程回国向政治局汇报中美大使级谈判的情况。9 月 4 日, 中国宣布将领海范围扩大到 12 海里, 进一步强调金门、马祖是中国领土。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拒绝中国提出的 12 海里原则, 宣称美国只承认 3 海里的范围。9 月 6 日, 参谋长联席会议再一次向艾森豪威尔要求授权美国空军在万一中国对沿海岛屿发动大规模登陆进攻时支援国民党空军。但艾森豪威尔仍然坚持只有他本人才能决定是否使用美军。9 月 7 日, 第七舰队 2 艘巡洋舰、5 艘驱逐舰在编队左右两侧护航, 掩护由国民党军 2 艘运输舰、5 艘作战舰组成的运补船队从台湾驶往金门, 美舰与国民党军舰只相距仅 2 海里。酝酿已久的美国为金门运补护航的行动终于开始了。

自从美台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正式生效以来, 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就一直伺机试探该条约以及美国国会“台海决议案”的实际限度, 但对于真的出现在眼前的美台海军联合编队, 毛泽东慎而又慎, 他命令前线指挥员: 对美台海军联合编队的位置、编队队形、航行情况要每一小时向北京报告一次; 只准打国民党军舰只, 不准打美舰; 如遇美舰主动开火, 不准还击; 要等美台联合编队抵达金门料罗湾港口、并等北京发出命令后福建前线各炮群才能开火。福建前线各部队严格执行了毛泽东的这一命令。9 月 7 日 12 时, 美台海军联合编队抵达料罗湾, 美国军舰虽进入金门 12 海里水域但在距金门海滩 3 海里以外即停止前进。战斗打响后美国军舰更是一弹不发, 而且置国民党军舰于不顾, 迅即撤离金门水域, 退往台湾。(17) 此后, 在 9 月 8 日、9 月 11 日中国对金门运补行动实施的大规模打击中, 美国军舰都在中国炮击开始后立即撤离战区海域。在整个运补与反运补过程中, 美国军舰都未与中国直接发生冲突。

美国一方面坚持为金门运补提供护航, 另一方面也对周恩来 9 月 6 日提出的恢复中美大使级谈判的建议作出了响应。9 月 11 日, 艾森豪威尔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他反复重申美国对台湾负有条约和原则义务并有权根据“台海决议案”采取行动, 美国不会退却。但同时他又对“台海决议案”进行解释, 指出该议案要求他不作无条件的预先承诺, 而是根据实际发生的情况做出判断。他还表示谈判的道路是“畅通的和准备好了的”。第二次台海危机似乎出现了缓解的可能。

三、危机中期美国的政策

但是, 正如这场危机的爆发不取决于美国一样, 这场危机的缓解也不取决于美国单方面。

9 月 13 日, 毛泽东肯定了福建前线炮兵部队开展的群众性的零炮射击活动, 并电令参战炮兵部队全面开展这一活动, 要求每天 24 小时打二三百发, 特别是在夜间, 特别是对料罗湾 3 海里以内打零炮, 使金门守军昼夜不得安宁, 增强全面封锁的效果。中央军委还决定在切实不误击美舰的前提下加强对海、空目标的打击, 并陆续抽调新的炮兵部队入闽参

战, 充实打击兵力。9 月 20 日以后, 美国采取将其舰只与国民党军运补船队混合编队的新方式, 再度为金门运补护航, 并出动舰载机在距金门 20—40 公里的空域活动, 掩护国民党军运输机向金门空投物资。面对新的情况, 中共中央军委虽然制定了“以炮击为主, 海军空军在确实不误击美舰美机和有把握胜利的原则下相机作战”的方针, 但对国民党军运补船队和运输机的打击并未中止, 金门地区的紧张局势并没有缓和。

中美在华沙重新开始的大使级谈判在台湾问题上也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毛泽东在中美恢复大使级谈判之前, 曾对谈判寄予一定的希望, 他指示王炳南多用劝说的办法, 避免使用过分刺激的语言。(18) 在重新开始的中美大使级谈判中, 美方代表雅各布·比姆一开始就要求中国在台海地区立即停火, 说美国不能容忍和坐视与它有共同防御条约的盟友的领土被武力夺取。王炳南一方面指出炮击金门是中国的内政, 不容许美国干涉; 另一方面建议中美双方共同声明, 保证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美之间在台湾和远东其他地区的争端而不诉诸威胁或者武力。具体协议是: 中国政府声明, 台、澎、金、马是中国领土, 中国有权在一切适当的时候采取一切适当的方法解放这些领土, 这是中国的内政, 不容外国干涉; 美国保证从台、澎和台湾海峡撤出其一切武装力量; 中国声明, 直接威胁厦门、福州的金门、马祖必须收复, 如果国民党军愿意主动撤走, 中国将不予追击; 中国政府声明, 在收复金、马之后, 将争取用和平方法解放台、澎, 并且在一定时期内避免使用武力实现台、澎的解决; 中美两国共同保证在台湾海峡公海和公海上空的航行和飞行的自由和安全。对于中国的这一和解性提案, 美方并未作出积极响应。美国提出要中国承担义务, 不但不用武力解决台湾、澎湖, 而且也不用武力解决金门、马祖。美国要求中方“除非进行单独和集体的自卫, 放弃对金门群岛和马祖群岛使用武力与武力威胁”; 作为回应, 美国“将设法使金门群岛和马祖群岛不被用于对大陆或其他沿海岛屿进行攻击或其他挑衅行动”。这在中国领导人看来, 无异于在中国大陆与金门、马祖之间划一条分界线, 等于割裂中国领土, 因而完全地、绝对地拒绝了这一方案。(19)

与此同时, 美台之间的矛盾也在发展。危机爆发伊始, 台湾当局尽管认为美国的表态还不够鲜明, 但总的来说对于美国的立场还是比较满意的。可是, 随着危机的持续和加深, 台湾方面对美国的不满也在不断滋长。美台之间的矛盾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 台湾当局认为美国卷入的程度太低, 且实在有限。美国空军始终没有开展对大陆机场的攻击, 而且除了为金门运补提供掩护外决不越过台湾海峡中线, 这与台湾方面的要求相差甚远。美国第七舰队虽然为金门运补提供护航, 但始终不肯进入距金门海滩 3 海里以内的水域。尤其使台湾当局特别是金门战地军方人士感到失望和恼怒的是, 当大陆对运补船队进行袭击时, 美国军舰非但不予以火力压制反而立即驶离战区。

第二, 台湾当局对于美国有可能与中国达成有损于台湾利益的妥协感到十分忧虑。周恩来 9 月 6 日发表声明以后, 杜勒斯 9 月 9 日在记者招待会上明确表示, 愿意“随时”恢复同中国的大使级会谈。消息传出, 顿时引起台湾当局的严重关注, 唯恐双方在牺牲台湾当局利益的基础上达成协议。9 月 12 日, 黄少谷评论道, 目前美国与中共举行谈判“极不明智”, 他同时强调说台湾注意到了艾森豪威尔 9 月 11 日电视讲话中关于任何谈判都不得损害台湾利益的提法, 借此在谈判开始前向美国暗暗地施加压力。9 月 19 日, 台湾当局再次明确表示: 对于中美大使级谈判中任何涉及金门、马祖中立化或非军事化的任何决定, 台湾均视为有损其合法权益, 台不准备做任何退让。(20)

第三, 在驻金门的台湾军队的去留问题上, 美台之间的分歧也越来越大。在艾森豪威尔 9 月 11 日电视讲话前后, 美国国内舆论要求政府放弃干预台海危机的政策。国会中有不少民主党议员争辩说保卫金门并不是为保卫台湾所必需的。有的参议员甚至说美国正在被蒋介石从后门拖进一场战争。参议院外委会主席格林致函艾森豪威尔, 反对美国介入沿海岛屿。他认为, 即使对台湾来说, 沿海岛屿也并不重要, 如果美国为了沿海岛屿而与中国发生战争,

那么美国政府在精神和物质上都得不到盟国的支持,也得不到美国人民的支持。格林的这番话并不是危言耸听,据《纽约时报》透露,在白宫和国务院收到的5000封公众来信中有80%反对美国防守金门、马祖。(21)国际舆论的主流也是反对美国介入中国沿海岛屿事务。英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英国没有任何义务为保卫金门、马祖或者台湾而采取军事行动;加拿大外长、澳大利亚总理、泰国总理、菲律宾总统也都表示不愿卷入台海冲突中去;日本更是从一开始就担心美国使用在日本的军事基地对金门、马祖进行干预会引来中国和苏联的报复。赫鲁晓夫也致函艾森豪威尔,警告美国不许对中国进行核打击,否则会引起苏联的报复。在艾森豪威尔严格限制使用战术核武器和美国空军、严格命令美国海军不得进入3海里领海、不得擅自决定向中国军队开火的情况下,原先积极主张干预台海危机的参谋长联席会议此时也改变了态度,主张台湾军队撤出金门、马祖。

台湾最高层对此深感忧虑,蒋介石频频发表反对“停火”的谈话,实际用意在不撤出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9月16日,蒋介石称对金门的进攻不仅仅是一种示威性的行动而且是进攻台湾的前奏。因此,“到了最后生死存亡关头,除了采取行使自卫权之紧急行动,即有效的报复行动,无法继续撑持时,美国为了人道,为了正义,以及为了对遏阻侵略,保障世界和平安全所负的责任,我不相信它会妨碍我们采取这一紧急性的自卫报复行动。”他还一再督导,要不惜一切代价加强对金门的海上运补,并增大空运量,从每天出动运输机30架次增大到每天出动运输机120架次,采取换人不换机的办法,昼夜不停地向金门运输和空投。9月28日蒋介石又在对记者的谈话中反复表示反对正在华沙举行的中美大使级谈判,认为谈判不可能取得为各方都接受的结果。并说:“金门战争在何种情势下,才是我们的生死关头,当以各种条件来判断,今天不能预为确定。如果到了这个时机,需要我们采取紧急行动,我相信盟邦必能继续以条约的精神,支持我们遏阻共匪侵略之目的,必不致中途后退,而我们在紧急状态中,亦不容为了考虑盟邦态度如何,而瞻顾徘徊。”

美台矛盾愈演愈烈,终于公开暴露出来。9月30日,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提出,美国以前就认为把为数众多的部队部署在金门、马祖是相当愚蠢的。在进攻面前退却是不明智的,因为这会对台湾和其他地区的人心造成不利影响,但是“如果有了停火,我们的判断,甚至是军事上的判断,就是,使这些部队继续驻扎在那里不是明智的,也不是谨慎的。”(22)这番讲话对台湾当局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冲击。国民党中常会马上开会讨论杜勒斯的讲话。蒋介石在高雄亲自对美联社记者发表谈话,反对削减驻金门、马祖的部队,也反对改变沿海岛屿的地位。他在评论杜勒斯的讲话时轻蔑地说,“假定杜勒斯先生说过据说是他所说的话,这也只是单方面的声明,因此我的政府没有任何义务来遵守它”。

9月底10月初,中国领导人开始考虑改变对沿海岛屿的政策。经过前一段时间的试探,中国已经意识到美国并不愿意为了金门、马祖而与中国打仗;美国想使蒋介石从金、马撤军。这样一来,中国领导人反倒认为把蒋军留在金、马比较有利。这个意见在9月30日已初步形成,(23)10月初又经中共中央正式讨论认可。毛泽东10月5日8时命令福建前线部队:“不管有无美机、美舰护航,10月6、7两日我军一炮不发,敌方向我炮击也一炮不还。偃旗息鼓,观察两天,再作道理。”10月6日凌晨,毛泽东起草的《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宣布暂以七天为期,停止炮击。从此,第二次台海危机开始缓和下来。

四、危机后期美国的政策

中国决定停火的当天,美国国务院便发表声明暗示将停止为金门运补船队护航,而台湾方面则表示宁愿冒继续遭受炮火封锁的危险,也不愿让美国退出护航。而后,美国不顾台湾当局的请求,宣布暂停为金门运补护航。这是美国谋求从金、马脱身的第一步。

10月7日,艾森豪威尔与杜勒斯商议,认为中国暂停炮击提供了一个机会,现在可以

由一个蒋介石自己的人,比如叶公超,巧妙地向蒋介石提出撤出沿海岛屿的问题。以下几点似乎可以成为劝说蒋介石的理由:(1)撤出沿海岛屿可以使国民党军队更加机动灵活;(2)可以消除在靠近大陆海岸的地方作战的危险;(3)有利于台湾当局和美国政府在世界舆论面前塑造良好的形象,从而促进蒋介石在可能情况下返回大陆的机会。(24) 10月14日,即中国发布再次停止炮击两周的命令的第二天,杜勒斯与叶公超便在华盛顿“相谈在台海地区的问题的解决办法”。

美国又派出国防部长麦克耳罗伊前往台北与蒋介石商讨“军事部署问题”。与此相配合,杜勒斯在华盛顿旧话重提,再次议论从金门撤军。当记者问及他是否曾经要求过或曾经打算要求蒋介石减少在金门的驻军时,他否认美国有这样的计划,但接着又说目前麦克耳罗伊正在台湾就如何能最有效地部署国民党军队同台湾当局进行会谈。问题的关键在于让现有数量的军队驻在金门还是驻在台湾。他认为军队驻在台湾将有更大的灵活性,行动范围也可以更加广泛,而且在一旦需要的时候还可以回到金门去。他承认这个问题极其微妙:“我们必须非常谨慎地处理这个问题,一方面要避免有理由被认为是挑起战争或者制造差不多必然会引起强烈反应和刺激的任何事情,另一方面要避免表现软弱,以免在整个远东地区引起对于我们的目的的忧虑。”(25)

美国为了从金、马脱身而进行的这一个回合的努力并未奏效。麦克耳罗伊行前曾表示,他对自己此行的成效很不乐观,因为第一他自己深知蒋介石并不信任他,第二他也不知国务院究竟能容忍蒋介石在沿海岛屿问题上走多远。他很担心自己成为又一个马歇尔(26)。果然,麦克耳罗伊的台北之行未能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

为了协调双边关系,杜勒斯于10月21日飞到台北与蒋介石等会谈。杜勒斯与蒋介石,罗伯特等人,与黄少谷、叶公超等在短短的三天中举行了多轮会谈,美国再三要求国民党减少驻金门等沿海岛屿的兵力并承诺不以武力反攻大陆。

在10月21日的会谈中,杜勒斯向蒋介石建议,国民党应该树立一种爱好和平的形象,为此应该明确表示反攻大陆基于民心而不是武力。10月22日,杜勒斯正式向蒋介石提出:(1)台湾应表现出愿意停火的意愿;(2)台湾应接受除把沿海岛屿交给共产党之外的一切解决办法;(3)台湾不凭借沿海岛屿来封锁厦门、福州,不使沿海岛屿成为进攻大陆的踏板;(4)台湾应避免飞机飞临大陆上空;(5)台湾应强调不诉诸军事手段解决返回大陆问题。蒋介石则提出由于大陆尚未“光复”,因而他必须坚守重大原则,不能让步;由于中共炮击会影响守岛官兵的士气,因而需要美国提供更多的大炮。

10月23日,杜勒斯又一次会见蒋介石。蒋提出金门与台湾在防务上有紧密的联系,如果金门失守,那么台湾的政权有可能在五个月内被共产党的代理人颠覆。杜勒斯不承认这种因果关系,他认为从沿海岛屿撤出一万多名士兵,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都有好处。蒋介石则表示这在永久停火之前绝无可能。

最后,经过妥协,美国同意在美台联合公报中加上“双方认为在当前情况下,金门、马祖与台湾、澎湖在防守上有密切的联系”,同时删去“中华民国不发动战争在大陆重建主权及中华民国不为攻击大陆的武装基地,它的基地早已在大陆及中国人民的内心”。(27)台湾方面则同意在联合公报上写明:“中华民国政府认为恢复大陆人民之自由乃其神圣使命,并相信此一使命之基础,建立在中国人民之人心,而达成此一使命之重要途径,为实行孙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而非凭借武力。”

美国对这一联合公报十分满意。众议院外委会远东小组委员会主席萨布劳基说,他对联合公报的第6点极感兴趣,认为该点似乎表明台湾当局将依靠和平手段而不是武力来达到重返大陆的目的。在他看来,这等于向美国再次保证,台湾将不采取可能使美国卷入战争的军事行动。(28)杜勒斯对于他这次台北之行的收获流露出难以抑制的喜悦。艾森豪威尔也认为蒋介石放弃武力进攻符合美国的利益。

在军事部署问题上,美国以增加对金门驻军的武器援助为交换条件,换取了蒋介石同意从金门撤出部分兵力。11月17日,根据美台高级会谈时商定的原则,美台军方达成正式协议:(1)继续改善台湾军队状况,并出于地理和后勤方面的考虑,调整驻沿海岛屿的部队。(2)在金门列岛至少增加12门240毫米榴弹炮,12门150毫米火炮;在马祖列岛增加4门240毫米榴弹炮,一个155毫米火炮营;加强驻金门的坦克部队。(3)金门兵力减少一个步兵师及预备役师,总数不少于15000人,新的部署于1959年6月30日完成。(29)

五、结论

经过这次危机,中美双方的台湾政策都已基本上定型,并且为对方所逐步了解。美国的台湾政策的基本目标是:保证台湾和澎湖的安全;继续支持国民党政权,保持其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中作为中国的合法代表的地位,在政治上造成对大陆的压力,希望造成大陆的内乱,最终以自由中国代替共产主义中国;发展国民党军队的军事潜力,使之能够分担保卫台澎的一部分责任和守卫沿海岛屿的全部责任;按照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规定,在台海地区运用美国军队为美国的国家安全政策服务;帮助发展台湾经济;促进台湾与其他非共产党国家发展关系;争取海外华人(尤其是在东南亚的华人)在政治上认同台湾当局,以抵销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为了达到上述目标,美国在第二次台海危机期间奉行的方针是:遵循《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在台湾和澎湖水域集结大量海空部队,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向中国发出武力威胁,保障台湾和澎湖不受武装攻击。通过联合国和其他谈判机制寻求维持沿海岛屿的现状。在是否动用美国军队援助台湾当局守卫沿海岛屿问题上保持政策的灵活性,将最终决定权集中于总统手中。继续支持国民党表达的反攻大陆的愿望,但不支持其采取实际的冒险性行动,避免对此做出任何承担义务的保证或暗示。

由此可以看出美国的对台政策各个环节之间的联系。美国认为,鉴于台湾的战略位置的重要性,为了确保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战略利益,就必须确保台、澎本身不受武装进攻。为了有效地保住台、澎,就不能不借助国民党军队,为此就必须维护其士气,支持国民党政权。但这又面临着被国民党政权拉入与中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危险中,这种前景是与美国的战略利益背道而驰的。因此,美国对台湾当局只有既支持又限制才能趋利避害。同时,美国还要谨慎地处理好与中国的关系。中国一再发出要解放台湾的呼声,但在实际的军事行动上又都只限于沿海岛屿,这就使美国经常陷入两难境地,既要进行武力威慑以阻止中国在台海地区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又要在沿海岛屿问题上约束自己和台湾当局,不致引起中国和其他有关各方的误解。既要保住台、澎,又要避免与中国直接交战,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唯一可行的就是迫使海峡两岸都不以武力改变政治和领土现状,美国在第二次台海危机期间刻意追求的莫过于此。几十年来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始终不肯放弃的也就在于此。

注释:

(1)(2)(11) 艾森豪威尔回忆录:《缔造和平》(一),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330页;第332页;第333页。

(3)(27)(29) 林正义:《1958年台海危机期美国对华政策》,台湾商务印书馆,第72页;第135—137页;第141—142页。

(4) 台湾《中央日报》1958年8月26日第1版。

(5) 同(3),第74—76页。

(6)(7)(8)(9)

台湾《中央日报》1958年8月26日第1版；1958年8月27日第1版；1958年8月28日第1版；1958年8月29日第1版。

(10) 同(3)，第69—70页。

(12) (美) 斯蒂芬·安布罗斯：《艾森豪威尔传》(下卷)，徐问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05页。

(13) 同(1)，第328页。

(14) 同(12)，第506页。

(15) 《中美关系》，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05—306页。

(16) 同上，第305，306—307页。

(17) 《叶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650页。

(18) 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72—73页。

(19) 《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07—108页。

(20) (28) 陈志奇：《美国对华政策三十年》，台湾中华日报社1981年版，第102页；第176页。

(21) Facts On File 1958, p. 313.

(22) (25)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2辑下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第2816页；第2859—2860页。

(23) 《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265页。

(24) 艾森豪威尔档案，第8箱，1958年10月7日致国务卿的备忘录。

(26) 艾森豪威尔档案，第6箱，麦克耳罗伊致杜勒斯的备忘录。

美国总统幕僚与阁员的权力消长

袁瑞军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

近半个世纪以来，伴随着美国总统权力的迅速增长，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出现了一种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一些过去仅仅从事白宫内部事务管理的总统私人助手班子，很快发展成为在美国最高层发号施令的一种法制性机构。”〔1〕70年代初，水门事件被揭露，由于事件的策划者均系尼克松总统的高级助手，因此，一时间长期隐居幕后的总统幕僚班子成了公众关注和指责的焦点。本文拟从总统幕僚与阁员之间权力关系变化的角度，追寻总统幕僚上升发展的轨迹，从而进一步加深对美国政治权力演变过程中的一些新变化和新特点的认识。

—

本文所讨论的总统幕僚班子与内阁在美国宪法中都找不到依据。在美国政界，总统幕僚班子也习惯地被称作“白宫班子”(White House Staff)，在美国政府机构中，其正式名称为总统办事机构(The Executive Office of President)。它是一个由总统直接任命、不须任何机构批准、协助总统履行其职责的一系列高级顾问机构的集合体。1939年9月8日，

罗斯福总统依据议会通过的《政府改组法》(*Reorganization Act*)颁布8248号总统令,正式确立了总统办事机构的组成与功能。以后,历届总统利用行政命令、改组计划、立法创议等方式不断扩展其规模,现在,其成员单位主要分为白宫办公厅(White House Office)和一些委员会、办公室两部分。前者包括白宫办公厅主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新闻秘书及其他一切冠以总统助理、特别助理、总统顾问和特别顾问头衔的总统私人助手;后者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经济顾问委员会、行政管理及预算局、国内事务委员会等顾问机构。这些机构由于是总统自行任命,不同总统任上其组成有所不同。

“内阁”一词,在美国最早见于1793年,直到1907年它才正式出现在法律文件中。它是自华盛顿总统以来长期形成的惯例,是指由总统任命、经过参议院批准的各行政部門首脑及一些内阁级高级官员组成的非正式机构,“其作用依总统个人意愿决定。”(2)参加内阁的各位成员称为阁员。美国自建国最初的4个部发展至今18个部,其规模及作用都经历了不断变化的过程。

由上可见,总统幕僚班子与内阁具有相似的特点,二者均由总统任命,直接受总统领导,双方都无宪法依据,其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总统的意愿。在美国建国以来的200多年历史中,总统幕僚班子与阁员各自的地位及作用始终是不平衡的,经历了一个此消彼长、互相冲突的发展过程。其变化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建国初期华盛顿总统至1933年罗斯福总统上台之前,是阁员中心主义支配时代,但已出现某些现代幕僚制的萌芽。

在这长达150多年的时间里,幕僚仅仅停留于总统私人雇员地位,只是在白宫内部充任总统秘书、书记员、勤杂工等,其功能根本不具现代总统幕僚的特征。这一时期,讨论决定和贯彻执行总统政策的是内阁。华盛顿总统把他的四个部长“看作他的心腹顾问,逐步把他们组成一个行政顾问班子”。(3)但那时的内阁会议主要还是在讨论重大问题及总统外出时才举行,而到约翰·亚当斯执政时,“内阁会议几乎制度化了。”(4)以后历任总统基本上都沿袭了这一习惯。阁员崇高的地位和重要的作用是低微的总统助手望尘莫及的,双方更无冲突可言。

此期,尽管总统助手普遍处于无足轻重的状态,但现代幕僚制已有了萌芽。这表现在,一方面,一些总统喜欢选择一些私人朋友组成非正式的幕后顾问团体,即所谓的“特殊内阁”,为其献计献策。如安德鲁·杰克逊的“厨房内阁”、西奥多·罗斯福的“网球内阁”等等;另一方面,一些总统重用个别助手,使其功能具备现代意义的总统幕僚的特征。如安德鲁·杰克逊总统重用的两位记者,“被当作整个政府活动的源泉,是总统的思想机器、写作机器和撒谎机器。”(5)这些显赫助手的存在为现代幕僚的产生树立了榜样。

(二)1933年罗斯福上台到1959年艾森豪威尔总统任期结束,是幕僚制确立与发展时期,但阁员仍居主导地位。

罗斯福上台后,不断采取各种措施扩张自己的权力。1937年,他任命了以路易斯·布朗洛(Louis Brownlow)为首的总统行政管理委员会,考察联邦行政工作的全部情况,并提出改革建议。委员会后来向罗斯福总统提交了《布朗洛报告》,认为,“由于总统疲于应付组织不善的政府机构所产生的细微琐事,因此他不可能也无法完成宪法规定的、他作为行政首脑的责任。”结论是,“总统需要帮助。他周围的助手是不足的,应该给总统配备一些直接处理与政府各管理机构有关事务的行政助理。”(6)此结论令总统非常满意。1938年1月,罗斯福把布朗洛报告提交议会并附了自己的赞赏意见。国会在此报告基础上,1939年4月30日通过《政府改组法》,规定:经议会批准,总统可以改组、新建和取消行政机构,同时授权总统任命六位总统行政助理。这一法令奠定了总统建立幕僚班子的最初的法律基础。罗斯福依此法令,接连向国会提交了四个大规模的改组计划,把财政部所属的预算局划归总统直接管辖。罗斯福新任命的这六名总统助理和新建的总统办事机构是现代总统幕僚制

正式确立的标志。有人认为,“罗斯福时代的最主要政治特征就在于他建立了总统助理制度。”〔7〕

这一时期,幕僚制及幕僚关系的主要特点是:其一,幕僚具有了法定的职位,从此取得了参政议政、与阁员争夺权力的法律基础,结束了长久的总统私人雇佣员的地位;其二,幕僚人数有了显著增加,其权限开始超越白宫的界限,开始完成总统交付的一切重要工作;其三,由杜鲁门创立、艾森豪威尔发展的首席顾问职开创了等级幕僚制的先例。杜鲁门总统授予其助手克利夫德以领导和指挥其他总统助理的权力,这一做法为艾森豪威尔大大推进了一步。他的首席顾问谢尔曼·亚当斯不仅高于其他总统助理,而且凌驾于内政方面各行政部长之上,“他甚至比总统本人更熟悉总统的工作。”〔8〕其四,在此期间,阁员中心主义开始动摇,幕僚开始与阁员争夺权力,但尚不构成严重威胁。罗斯福实际上是奉行内阁与幕僚并重的双轨制,杜鲁门、艾森豪威尔基本上是奉行阁员中心主义,因此,新诞生的总统助理地位还不稳固,除个别总统亲信、高级幕僚显示出巨大能量外,大多数总统助理仍是默默无闻,权力有限,他们与阁员各自完成总统分派的职责,接触有限,冲突较少发生。

(三) 1960年肯尼迪总统上任到1974年尼克松被迫辞职,是幕僚制迅速上升和阁员地位严重衰落时期。

肯尼迪和尼克松继承了罗斯福的传统,在其任上极力扩张总统的权限,幕僚班子的地位和权力也随之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位。这一阶段新的变化有:(1)幕僚班子的机构和人数急剧膨胀。尼克松时代,总统办事机构和雇员数比罗斯福时期增长了十倍。其幕僚班子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创下了历史记录;(2)幕僚权势迅速增加,阁员地位明显衰落。幕僚的权限实现了两方面的扩展:一方面,从白宫外部少量事务扩展到国家内政、外交一切领域。尼克松任命的国内事务委员会主任埃利希曼实际上把国内事务方面各行政部门置于自己的领导之下,这些部的部长都必须向他汇报工作;另一方面,从为总统决策提供咨询扩展到决定与执行政策的全面参与。幕僚从昔日默默无闻的隐士一变而为国人瞩目的显要人物,基辛格自称“忙于两种工作,既要协助总统决策,又要协助决策的执行”。〔9〕他在实现饮誉世界的外交成就时,唯一的头衔只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随幕僚权力和地位迅速上升,阁员地位明显下降,多数阁员被排斥于总统重大决策之外;(3)总统与幕僚关系形成了稳定的两种类型。一种是肯尼迪奉行的、以总统为中心的车辐式幕僚制,即总统把幕僚班子看成一个车轮的一系列辐,自己处于车轴中心,这样总统本人是其幕僚班子的负责人,一切决定经他做出,围绕其周围的助手们“享有同等地位、同等的薪俸和同等的进入总统办公室的权利。”〔10〕这种类型有利于各种意见从不同方向直接反映到总统这里来,保持总统对其全部政策的最终决定权。另一种类型是,杜鲁门创立被尼克松发展到顶峰的等级幕僚制。即总统与幕僚班子组成了三级金字塔式权力格局,总统居塔尖,在总统与所有助手之间设有高级助手(超级幕僚)这一层次,高级助手可能是一人(如杜鲁门、艾森豪威尔、约翰逊及后来的卡特时代),也可能是二、三个人(如尼克松和里根时代)。他们往往是白宫办公厅主任或其他与总统关系最为密切的人。其存在有利于减轻总统行政负担,专心处理重要问题。两种类型实际上无优劣之分,每位总统都选择了适合自己特点的类型,同样达到扩张权力的目的。

(四) 福特上台至今,是幕僚制表面收敛,发展趋于平缓,阁员地位有所回升时期。

面对一个对水门事件记忆犹新的国家,福特以来的四位总统慑于公众对总统幕僚专权行为的批评和攻击,在利用和依靠幕僚班子方面做了一些调整。首先,每位总统都以恢复阁员中心主义为名,行加强幕僚权力之实。每位总统都是高唱恢复“内阁政府”高调入主白宫,上台伊始均有意做出弱化幕僚班子的姿态。福特和卡特都一度取消了白宫办公厅主任一职,卡特成了艾森豪威尔以来召开内阁会议最多的总统,里根许诺要“推进部长为中心的政治”,但实际上他们最终倚重的仍是白宫班子,幕僚权力未受到实质性削弱,事实证明,“内阁政府不过是一种幻想”。其次,此期幕僚关系十分紧张,双方冲突更频繁,矛盾更尖锐。由于

总统言行不一,使幕阁冲突的机会加大,同时,幕僚名声一落千丈,侵权中面临阁员的反击更为强烈,因此,双方权力斗争成了新闻界报道的热门话题,卡特和里根都主要是通过撤换阁员方式解决双方冲突。最后,鉴于幕阁关系的紧张及幕僚的发展困难,总统注重采取措施调整双方关系,决策体制趋于灵活化、多样化,阁员地位有了较为明显的上升。如里根将原来由全体阁员参加的内容会议制度改为按政策领域划分的、由部分相关阁员及幕僚共同参加的内阁委员会制度,同时,还更为经常地利用非正式的早餐会、午餐会等形式,邀请有关的阁员和幕僚共同讨论一些重大问题。这种吸收幕阁双方共同参与决策的方法为布什所承继,它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幕阁的权力争夺,有助于寻求一种彼此协作、共同发展的途径,阁员也由此加强了自己的决策功能。布什任期上国务卿贝克的作用突出表现了这一点。

综上所述,总统幕僚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萌芽时期和一个短暂的确立和飞速发展时期,在挫折之后进入了平稳发展阶段,在它发展历史中始终贯穿着与阁员权力对比关系的变化,双方地位和权力的消长,使美国行政决策体制从阁员中心主义逐渐过渡到少数幕僚占居优势,但伴随幕阁严重冲突的不稳定类型。

二

从上述总统幕僚班子与阁员关系发展的历史及现状,我们可以看出这一发展过程的几个特点:

(一) 总统幕僚的异军突起打乱了行政部门内部传统的权力格局,幕阁关系 发展是一个幕升阁降的过程,双方的冲突在所难免,这种必然性表现在两个方面:

主观上,作为总统的高级顾问和行政官员,幕阁双方都有影响和参与总统决策的强烈愿望。在总统决策中占居优势,是掌握重要权力的标志。这对一群极力追求权力或胸怀变革社会的政治家和学者是相当有吸引力的。如帕特里克·安德森所说,白宫班子“共有一个特点即追求权力和荣耀的不寻常的野心以及影响权力和上层的狂热。”〔11〕在参政的强烈愿望驱动下,幕阁双方都极力追求总统的青睐。角逐中,长期居总统重要政策顾问的阁员自然不甘心让位于未正式授权的总统幕僚,更难以接受幕僚位居其上的状况,千方百计维护自己在总统面前的发言权。而幕僚倚仗着与总统的密切关系及经常见到总统的便利,利用一切机会和方式向总统提供建议,施加影响,同时阻碍阁员与总统的直接联系。因此,双方主观的对立决定了双方在争夺参政议政机会时彼此的排斥。

客观上,幕阁双方均缺乏法律基础,职责不清造成双方权限的重叠和交叉。美国宪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总统可以要求各行政部门主管长官以书面形式就其所管辖范围的任何事项向他提供咨询意见。”这是阁员作为总统咨询对象的唯一的法律依据;同时,阁员作为各行政部门首脑,还肩负着领导本部门贯彻执行总统政策的责任。因此,为总统提供政策咨询以及实施总统政策一直是阁员固有的职责。有关幕僚行使的权力及其方式,《布朗洛报告》规定,“他们的责任是为总统提供咨询服务,协助总统履行职责。他们应该始终位居幕后,不下命令,不做决定,不发表公开讲话,……不按自己的意愿行使权力。”〔12〕这实际上为以后有关幕僚的一切规定提供了蓝本。《美国政府手册》规定,“总统助理奉总统命令行事,促进和保持总统与国会、各行政部长、新闻界及公众的联系。”〔13〕由于这些规定十分笼统,为总统使用幕僚留下极大的伸缩性。因为,“总统想要”赋予幕僚无限的权力,他们作为总统脑、耳、目、手的延伸,做那些总统有时间会自己去做的事情,全面卷入了从决策到执行,从战略规划到具体项目设计的一切领域,这便严重侵犯了许多传统上属于阁员管辖的范围,如基辛格所说,“你必须削弱行政部门……他们想做或正在做我在做的事。”〔14〕而且,随白宫班子的不断膨胀,许多人搞不清楚自己的职责,喜欢到行政部门去“找”工作做,〔15〕争夺完全归行行政部门管辖的事务。因此,幕僚权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

是以阁员权力的削弱以至丧失为代价的，幕阁之间侵权与反侵权的斗争始终不断。

（二）随幕僚地位的上升和巩固，幕阁之间的冲突呈现越来越激烈的趋势。一方面，冲突涉及的人数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罗斯福到尼克松之间，幕僚权力飞速发展，但是，幕阁冲突还是在极个别、小范围内发生，而在卡特和里根年代，幕阁冲突成了司空见惯的事，绝大多数幕僚与阁员卷入冲突，双方形成全面对立的状态。另一方面，幕阁冲突的结果也越来越严重，矛盾常常激化到“总统必须做出取舍”（16）的地步，阁员不再是仅仅受幕僚排挤而是最终被赶出政府。

（三）总统的个人因素对幕阁关系的变化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幕阁双方争夺的目的在于追求对总统决策权的最大影响，与总统关系的亲近与否直接决定了他们参与决策的机会多少和权力大小。总统有奉行阁员中心主义和推崇幕僚制两种类型，不同类型决定幕阁冲突的程度和结果有所不同。正如总统问题专家托马斯·克罗宁所说，“今天，一个强有力的、健康的内阁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总统希望它如此。”（17）1969年，腊斯克在回顾其国务卿生涯时说，“政府在最高层次上如何组织，这并不是教科书或机构图表所能说明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从总统那里得到信任。”（18）同是国务卿，他在肯尼迪和约翰逊两位总统任上处境却有天壤之别，此番议论于他实在是感触良深的。总统态度对幕阁冲突的影响还表现在，当总统旗帜鲜明地推崇幕僚制时，幕阁冲突反倒减弱，因为“当权威被称为‘合法’时，冲突就会缩小到最低程度。”（19）因此，在罗斯福、肯尼迪、尼克松任上，明确推崇幕僚制的总统制约了幕阁之间的冲突，而在卡特和里根任上，由于总统言行不一，态度暧昧，反倒加剧了幕阁的矛盾。

（四）阁员个性的强弱和能力大小也能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较大地影响幕阁冲突发展的方向。权力关系既是一种法定职位的关系，也是拥有权力的个人之间的关系。在幕阁关系的演变过程中，“个性起着难以捉摸然而极为重要的作用。”（20）虽然阁员地位及影响的不断衰落是阁员个人难以扭转的趋势，但是，同样在国务卿、财政部长、内政部长这些容易与白宫冲突的职位上，由于担任这些职位的阁员个人素质的差异，幕阁冲突的结果往往相去甚远。一些个性强、有能力、背景特殊的阁员成了幕僚夺权路上的巨大障碍，这些阁员的抗争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决策权力向幕僚方面的过度倾斜。正是因为认识到阁员个人因素在幕阁权力对抗中的作用，奉行幕僚制的总统就有意识地任命一些性情温和、没有特定选民背景的人入阁，从而减少幕僚行使权力的阻力。政治学家纳尔森·波尔斯比发现这是总统任命阁员的新倾向。（21）

三

幕阁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在这一冲突中，幕僚为什么会迅速发展甚至取代阁员成为总统依靠的首要力量呢？这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可概括为：

（一）客观形势的发展以及美国政治体制的一些特点，为幕僚的迅速上升创造了有利的前提条件。

本世纪以来，美国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极大地促进了总统权力的迅速膨胀。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政府加强管理经济的职能，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又促使这一要求变得更加迫切，两次世界大战使得总统承担了异乎寻常的重大责任，其在危机期间扩张的权力在危机之后大都保留了下来。二战后，美国作为超级大国、资本主义阵营的盟主，使其化身——美国总统也成为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个人。因此，客观形势的发展使总统的责任越来越广泛，越来越繁重，已经远远超出了总统个人能力所能负担的限度。

为了有效地履行自己的职责，总统需要寻求他人的帮助，但是，在现实政治体系中他找不到可以信赖的力量。首先，总统无法从国会中得到必然的支持和效忠。美国总统与议会制

首相不同,他不一定属于议会中的多数党,与议会之间完全是一种平等协商、讨价还价的关系;其次,内阁无法令总统满意。总统虽有权任命阁员,但是,内阁只是一个非正式的咨询机构,阁员只就本身负责的事务向总统提供咨询,内阁全体没有连带责任。由于阁员各自关心本部门利益,较少关心有关政府全局问题,内阁会议往往流于空泛,冗长乏味,难以解决总统所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特殊问题。最后,行政部门的状况也难于适应总统的需要。行政机构日益庞大,难以驾驭,其内部官僚主义盛行,效率低下,职业文官对走马灯般更换的政府官员采取消极态度,甚至歪曲和篡改总统的政策,总统对他们的保密能力也缺乏信心,根本不能依靠他们实现自己的政策目标。总之,现行政权体系最大限度地造成了美国总统的孤立。当总统候选人获胜入主白宫时,环顾左右,他唯一可以信赖、最为可靠的只有长期追随自己的亲信和朋友,他们才是其实现任期目标的得力工具。

(二) 总统个人的权力欲是幕僚迅速发展的强大动力之一。

每位总统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依赖、重用幕僚,其原因不仅出于客观的需要,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他们个人追求权力的本能。作为政治家,总统追求、占有和长期行使权限广泛的权力是他的理想。当总统在现有政权体系中找不到行使这一权力所必需的理想的依靠力量时,他必然十分重视自身权力的巩固,转而建立符合自己口味和习惯、忠实贯彻实施自己意图的机构。由于幕僚作为总统个人的延伸,他们行使的权力实质上就是总统的权力,因此,总统推进幕僚制便是加强自己的统治能力、巩固自己统治地位的最有效、最简便易行的措施。而且,由于处于权力顶峰的总统职位特有的孤独感,每位总统都有要求部下忠诚的强烈愿望。总统选择幕僚的首要标准不是经验或才能,而是“毫无疑问的个人忠诚”。(22) 约翰逊说,他所需要的“不是小写的忠诚而是大写的忠诚”。(23) 而在现代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下,只有总统个人任命、不受任何机构监督、对总统竭尽效忠的幕僚班子才能满足总统这一愿望,对总统个人的忠诚实际上是总统幕僚班子的真正特征。

(三) 幕阁双方不同的任命制度以及与总统关系密切程度的差异,是幕僚在双方冲突中占据有利地位的根本原因。

两种不同的任命方式使幕阁代表的利益不同,从而直接造成了双方在参与总统决策过程中地位的优劣。1939年《议会改组法》规定,幕僚的任命不须像阁员那样经参院批准,总统可以依自己意愿随心所欲地任命和撤换他们。这便使幕僚除对总统一人负责外,不向任何机构负责,议会不能以任何理由质询他们。总统的利益便是他们最高的利益,他完全可以站在总统的角度,全面地、综合地观察和解决问题,从而成为总统意图最忠实的实施者。这种任命制度不仅使幕僚成为总统个人不会走样的延伸而深得总统的信赖,而且,由于总统是唯一由全体国民选举产生的官员,表面上总统是代表整体的“国家利益”,而不是代表某一地方、某一阶层的局部利益,总统代表利益的广泛性、综合性使总统幕僚在参政议政过程中较少受特殊利益的约束,处于较为超然、客观的立场。这样,既加深了总统对他们的信任,也使得他们有可能成为各种利益的协调人和仲裁者。

美国宪法规定,“经参议院同意和批准……总统有权任命一切合众国的官员。”从理论上讲,总统可以任命任何人为阁员,但实际上,这一任命不仅要依法受参议院批准,而且,按习惯总统还要考虑诸多因素,以求国内各种重要的政治力量在其政府的高级职位中尽可能地达到力量平衡。因此,内阁成了国家团结一致的标志,成了各种社会力量和派别代表的大杂烩。处于这些职位的阁员,其思想和行动受到多种利益关系的限制。他要上对总统负责,在政府内外贯彻实施总统的意图和计划;下对他所管辖的行政部门官员负责,在精神和物质上促进职业文官的利益;同时,他必须为支持他的利益集团以及和本部门有关的大利益团体服务;另外,他还要为自己今后的政治生涯考虑,他必须坚持特定的思想倾向和政治观点,以求给选民造成深刻的印象,并使自己政绩成为今后的进身资本。凡此种种决定了阁员在总统面前成为某些特殊利益的倡议者和辩护人,在与总统意见分歧时,他会坚持己见,向总统

的权威挑战,即使是忠于总统的阁员也不得不把各种特殊利益置于最优先的地位。鉴于阁员的这种“本位主义”倾向,曾在哈定、柯立芝、胡佛三届政府中任职的查尔斯·丹尼斯说,“阁员是总统的天然敌人。”(24)因此,总统根本不能指望以更换阁员的方式改变这一状况。

总统幕僚与总统特殊亲近的关系决定了幕僚必然超越阁员成为总统最重要的依靠力量。许多阁员在入阁之前可能与总统仅仅是一般相识或者根本不认识,他们得以入阁或是基于自己的名望和才能,或是得到强有力的利益集团的支持。而大多数总统幕僚却是追随总统多年的亲信,他们都在漫长、激烈的总统竞选运动中不辞劳苦地为总统候选人冲锋陷阵,总统候选人能登上总统宝座主要是他们的功劳,而在竞选过程中锻炼得更加精干、团结、高效的竞选班子在选举胜利后几乎全部过渡到总统幕僚班子中。总统与幕僚这种长期形成的私人间的密切关系,奠定了幕僚权力的坚实基础,是他们与阁员及其他政治力量斗争的上方宝剑,也是他们抵御外界攻击的唯一的护身符。正如索伦森所说,“要不是由于我同肯尼迪总统的关系,我将一事无成。”(25)除了幕僚与总统个人关系外,幕僚班子的办公地点就设在白宫西翼及地下室,他们经常地晋见总统,这种便利也极大地促进其权力的上升。前总统顾问比尔·莫耶斯说,“在华盛顿,权力的来源有二,一是信息另一个是接触总统的机会,两者决定权力平衡向幕僚方向倾斜。白宫班子现在得到信息的速度比或至少同国务卿和国防部长一样快,他们又比部长们能更快地见到总统,这就使白宫班子占据极大优势。”(26)

(四)幕僚本身的一些特点使他们能够比阁员更有效地为总统服务,从而进一步加深总统对他们的依赖程度。

幕僚双方对所管辖事务的知识背景不同,使得一部分幕僚在决策过程中明显地占居智者的优势。总统决策面临的问题都是政府中最复杂、最困难的问题,靠感觉和经验难以作出正确判断。而一些幕僚正是充当了政府内部智囊人物。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研究工作与现实的紧密结合,这一特点创造了大量学者亦官亦学的条件。历任总统一直重视在大学、研究机构中挑选学者充实到自己的幕僚班子中来,这些学者理论功底扎实,智慧超群,在决策中甚为活跃。而阁员多是政治性任命官员,往往对其所在部门的专业知识有限,或者根本就是外行;而且他们还受到所获情报的限制,难以从整体上把握事情全貌,因此,在决策过程中,面对精通业务、论辩有力的幕僚,阁员往往显得无能,从而失去总统的信任,减少了在总统面前发言的机会。

另外,幕僚较阁员对任期更强的紧迫感使得幕僚在气质和行动上都更为积极主动。总统幕僚完全是随总统去留的。总统一任只有四年,上台之后组建班子、适应环境花去相当多的时间,连任的竞选又总是几乎提前一年开始,因此,总统及其幕僚班子实际能有所作为的也就是任期的第二、三年。如此短暂的任期造成幕僚班子急于成就的心理。而且,大多数幕僚都年轻气盛,不像阁员那样受以往政府工作经验的束缚。因此,任期的紧迫感和少受传统约束,使得新计划、新设想在白宫不断涌现,这种不断创新的特点正好符合总统争取连任和在历史扬名的心理。而混迹官场多年的阁员,依靠着行动迟缓、循规蹈矩的行政机构,是无法适应幕僚班子快节奏的竞争的。

四

总统幕僚班子的地位及作用日益突出,打破了旧有的行政机构内部的权力格局,给美国政治制度带来了一些变化,同时产生了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评价和估计幕僚关系变化的影响及发展前景,是我们此项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应该承认,建立幕僚制的最初设想是积极的、有效的,幕僚参政适应了总统权力和责任迅速增长的客观要求,正常的幕僚班子的工作有利于总统更有效地履行其作为国家元首和行

政首脑的职责,既提高了政府的工作效率,又使得总统能够在瞬息万变的形势下迅速作出反应和决定。如果没有幕僚的辅佐,总统许多值得夸耀的成就无法想像。

另外,还应看到,大量学者、专家和能以总统助理、顾问身份进入政府,参与各项政策、计划和方案的创制工作,有利于总统决策的正确性和创新性,符合科学决策的原则和趋势。因此,有人说,“总统幕僚班子是政治机构中唯一具有创新能力的地方。”(27)

尽管幕僚参政有其积极合理的一面,但是,幕僚班子权限的急剧增长,特别是它严重侵占、超越阁员的现象,对美国现行政治体制也造成了一些恶劣影响。

首先,幕僚制的迅速发展以及超越阁员的状况,极大地削弱了国会的权力,破坏了美国政治制度的根基——分权与制衡原则。分权与制衡原则是美国政治制度的基石,宪法的精髓。它规定了美国政府行政、立法、司法三权的分立及相互制约的关系,目的在于防止权力的集中或滥用。现在,非选举产生、不受任何机构监督的总统幕僚制度向这一原则提出了极大的挑战。幕阁之争从表面看是行政机构内部的权力之争,其结果似乎也只是权力在行政机构内部发生转移。但由于权力是从受议会监督的阁员手中转移到不受任何机构监督的总统幕僚手中,因此,阁员权力的削弱和丧失实际上变成了议会对行政机构监督权力的削弱甚至丧失。这主要表现在:(1)幕僚班子越来越多地包揽了政策的创制工作,议会也越来越习惯于讨论和通过那些总统通过各种方式提交的现成议案,这便使议会的立法权限进一步缩小;(2)总统办事机构的成员单位之一——行政管理与预算局(OMB)负责编制、审定和监督各行政机构的预算开支和执行情况,是最具实权的单位之一,议会只能对该局编制出的十分精细庞杂的预算表进行修修补补,无法实质性地行使其财政权;(3)幕僚日渐取代阁员掌管大量事务,阁员因此对许多情况不是不知便是所知有限,议会无法通过质询阁员而达到有效监督政府工作的目的,而又不能要求总统幕僚就政策执行状况进行说明。由此可见,幕僚不仅篡夺了议会大部分的立法权和财政权,而且使议会的监督权也失去了意义。它已经成为政府机构中最有权力又不受约束的核心集团,作为美国政治制度最重要标志的分权与制衡原则在政权结构的最顶端出现了一个令人遗憾的大空缺,分权与制衡原则要保证权力的平衡,保证没有一个总统变成国王,但由于这个空缺的存在,总统便可以通过其幕僚班子侵占剥夺议会及行政机构权力,破坏三权之间的平衡与制约关系,民选总统实际上变成了“帝王般”的总统。

其次,幕僚取代阁员作为总统施政的主要工具,加深了资本主义政治生活的肮脏程度。由于总统幕僚不受议会及其他机构的监督,他们在幕后为了总统的利益可以不择手段,为所欲为。从70年代的水门事件、80年代的伊朗门事件,以及一些偶然败露的政治丑闻和许许多多尚未为人所知的阴谋中,总统幕僚公然违反法律与道德,采用欺骗、偷窃等等非法手段为总统效劳,最终在人们愤怒指责的浪潮中代总统受过,充当替罪羊。水门事件以来,美国国民中长期存在的对政府的信任危机恰好证明,人们正是从幕僚身上进一步加深了对政府反民主本质的认识。

再次,总统幕僚班子内部形成的阿谀奉承、唯命是从的风气,给资产阶级民主宪政的体制蒙上了总统个人专制的阴影。由于幕僚的地位和权力“很少与他的正式头衔或在组织机构中的位置有关,而几乎完全取决于他与总统的个人关系”。(28)因此,幕僚班子无论是最精干的还是很平庸的,都极力顺从总统的意愿,而且,由于总统经常鼓励和要求幕僚班子对自己的忠诚,从而更加促使幕僚们相信,要保持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必须支持总统的每一观点,实践总统之所想,而不是反对他的意见,因此,幕僚班子很少有人敢跟总统争辩,更少有人批评总统的想法。肯尼迪总统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曾说,“当总统在场时,人格改变了,甚至强人也经常发表那些他们认为总统喜欢听的意见。”(29)因此,总统幕僚班子内部存在的顺从迎合总统的风气损害了他们公正、客观地鉴别总统命令和行动的能力,严重扼杀了其创造性,降低了其参与决策的水平。同时,总统长期处于这些溜须拍马、竭尽效忠的排外

的小顾问团体的包围, 容易形成唯我独尊的帝王意识, 从而造成决策偏差。

最后, 幕僚班子自身机构及权限的严重膨胀既不利于行政部门工作效率的提高, 又使幕僚班子本身丧失了其原有的优势。幕僚班子由过去少数几个人组成的私人顾问团体发展至今几乎成了无所不包的“总统部”, 结果是“幕僚班子开始染上了行政机构特有的官僚主义、文牍主义、机构庞杂、缺乏沟通等缺点”, (30) 长此以往, 总统也将像无法控制行政部门那样对哀叹日益扩张的幕僚班子控制乏力, 幕僚班子原有的一些人员精干、政策智囊、决断迅速等优点逐渐丧失, 那么, 幕僚的存在就不是加强而是削弱了总统管理政府的能力。另外, 由于政策的制定多由总统依靠幕僚完成, 而政策的执行许多落在阁员及行政部门身上, 这种决策与执行权力的分离, 既挫伤了行政部门的积极性, 也造成了权力与责任关系的混乱。一旦政策失败, 阁员因没有参与政策决定而不愿承担责任, 而幕僚又总把失败原因归为执行的不力, 幕阁双方极力追求权力, 最终又不承担行使这些权力所应负的责任, 势必加剧行政机构滥用权力的现象。

总统幕僚班子对政治制度的不利影响日趋明显, 水门事件以来的历届政府为平息对幕僚权力膨胀的指责, 为恢复“内阁政府”作了种种努力, 但无论是幕僚人数的一时减少还是幕僚权力的暂时削弱, 都扭转不了政府权力向总统机构集聚的趋势, 消灭不了幕阁之间的对立冲突, 改变不了幕僚专权的状况。其原因在于, 本文第二部分所分析的幕僚上升发展以致超越阁员的原因基本上仍旧存在, 而这些因素的存在注定了总统仍将一如既往地寻求幕僚的帮助, 同时, 由于总统及其幕僚所代表的利益实质上是最有权势的大资产阶级集团的利益, 政府权力向总统方向集中有利于加强大资产阶级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垄断地位。总统地位的稳固与幕僚权势的发展是相互依存、互相促进的关系, 只要总统的权力不受到进一步的限制, 就不能指望总统幕僚的地位及作用在近期会受到削弱。

虽然限制总统幕僚的权力扩张非常困难,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地位和权力会永无止境地上升和加强。幕僚发挥作用的程度直接受到总统态度及能力的限制, 其扩张权力的过程中也始终面临阁员的强烈抵制, 另外总统在政权结构中所受到的制约也同样会作用到幕僚身上, 70年代以来国会要求限制总统幕僚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美国社会内在的权力制衡机制, 如政党、压力集团及新闻媒介的作用, 都在很大程度上阻碍幕僚制的恶性发展。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确定, 基于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及个人主观上的愿望, 今后, 总统仍将十分重视倚重幕僚的作用, 但是, 由于幕僚班子本身的局限以及重用幕僚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种种限制, 未来的行政决策体制将不会回归以往单一倚重阁员或者幕僚的体制, 而更为可行的发展途径将是建立幕阁并重、彼此协作的多元顾问制度, 这一趋势已在最近两位总统任上有所表现。当然, 由于现代总统决策形式趋于多样化、随意化和个性化, 总统幕僚与阁员又始终缺乏特定的法律基础, 因此幕阁之间的具体关系今后还会出现较大变化。

注释:

(1) Aron Wildavsky ed., *The Presidency*,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p. 601.

(2)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Manual, 1989/90, p. 85.

(3) (美) 查尔斯·比尔德著, 朱曾汶译:《美国政府与政治》(上), 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第191页。

(4) 曹绍谦:《美国政治制度史》, 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第101页。

(5) Emmet John Hughes, *The Living Presidency*, Penguin Books Inc., 1974, p. 138.

(6) Report of the President's Committee On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Washington, D. C.: GPO, 1937, p. 5.

(7) (日) 高桥正武著, 胡立品译:《白宫内幕》, 军事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 第10页。

- (8) Clinton Rossiter,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1960, p. 169.
- (9) 吴继淦等译:《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二),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0 年版, 第 87 页。
- (10) (美) 西奥多·索伦森著,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译:《肯尼迪》,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1 年版, 第 134 页。
- (11) Patrick Andrew, *The President's Men*, Gardon City, New York, Macmillan, 1972, chap. 22.
- (12) 同 (6)。
- (13) 同 (2)。
- (14) Thomas E. Cronin, *The State of the Presidency*, 2nd ed.,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80, p. 231.
- (15) Stunley Bach and George T. Saleher, *Perspective of the Presidency*, D.C. Heatck and Company, 1974, p. 186.
- (16) 《实力与原则——布热津斯基回忆录》,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5 年版, 第 49 页。
- (17) 同 (14), 第 291 页。
- (18) Dean Rusk, “成为荣休教授后的国务卿先生的生活”, *Life*, Jan. 17, 1969, Vol. 66.
- (19) 《实力与原则》, 第 602 页。
- (20) (美) 迈克尔·麦德维尔著, 辛耀文译:《影子总统——总统及其高级助手的秘史》, 新华出版社 1986 年版, 第 8 页。
- (21) Nelson W. Polsby, “Presidential Cabinet Making: Lessons for the Political System”,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Spring 1978, pp. 15-16.
- (22) Godfrey Hodson, *All Things to All Men*, Perguin Books, 1984, p. 109.
- (23) *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XIV, No. 2, Spring, 1984, p. 228.
- (24) Theodore C. Sorensen, *Decision Making in the White Hous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3, p. 71.
- (25) 《影子总统》, 第 425 页。
- (26) 同 (14), 第 153 页。
- (27) Robert E. Diclerico,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entice-Hall, Inc., 1979, p. 220.
- (28) 《影子总统》, 第 137 页。
- (29) Robert F. Kennedy, *Thirteen Days*, New York: Norton, 1969, p. 33.
- (30) Louis W. Koenig, *The Chief Executive*, 4th ed.,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Inc., 1981, p. 205.

对美国主流文化的挑战

沈宗美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着的重大变化，并不仅仅发生在某些社会主义国家。柏林墙在一夜之间坍塌，海湾战争大获全胜，苏联八月政变猝然失败，这一连串惊心动魄的戏剧性变故确曾使美国人陶醉，然而这并没有解除他们对自己国内存在的许多伤脑筋问题的忧虑。问题之一，就是其整个制度赖以确立的基本价值观念，在近年来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场挑战目前已经引起了美国思想界的严重关切，各大报章及整个新闻媒体为此而展开了尖锐的交锋。问题究竟严重到何种程度，这里不妨摘录《哈得逊评论》(Hudson Review) 1991年春季号首篇文章作为开场白而引用保罗·奥斯卡·克里斯特勒(Paul Oskar Kristeller)先生的一段话：“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文化大革命。这场文化大革命足堪与中国的那场文化大革命相提并论，如果不是更糟糕的话。中国人已在某种程度上消除了他们的文化大革命，而我所见到的种种迹象却表明，美国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正在日趋恶化下去，并且不会在可预见的将来被扭转。”〔1〕迪奈希·德苏查(Dinesh D'Souza)就目前这场大辩论考察了100多所美国高校，并对加州大学(伯克利)、斯坦福、霍华德〔2〕、密歇根、杜克和哈佛这六所有代表性的大学进行了个案研究，结论也是：“这次席卷美国各大学校园的变革，性质是如此之深刻，以致可以毫不夸张地称之为是一场革命。”〔3〕两处引文中的“革命”，用的都是Revolution这个词。美国著作家对“革命”词义的理解，虽与我们不完全相同，但是这里显然是指其广义上的概念，而非政治学上严格界定的狭义的“革命”。〔4〕克里斯特勒先生将目前美国正在发生的现象比诸中国60、70年代的那场文化大革命，当然亦不尽准确。此处恕我姑且“拿来”，套用“文化革命”一说，以求行文方便，有望读者明鉴。

—

美国的这场文化革命首先发难于高等学校，并迅速地波及整个教育界。

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最敏感的神经中枢，美国的大学是西方文明的堡垒，通过教学、研究和服务三大功能，不仅为社会发展提供人才，更重要的还是将历史形成的价值体系世代相传，并化解由不断进入美国的移民所带来的异族传统，“教育是文化的生殖性腺”。〔5〕但美国的大学校园，历来又是酝酿各种标新立异思潮和观念的温床。这些新异的思潮和观念，往住是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外观朕兆，给既存体制拉响预警信号，同时也常常与主流文化保持一定的超前距离。

1988年春，斯坦福大学学生自发组织集会，抗议该校人文学科传统的以西方文明典籍为基轴的课程设置，高呼“嗨，嗨，西方文化快滚蛋！”〔6〕在学生的强大压力下，校方被迫让步，取消了讲授从古希腊罗马到19世纪欧洲主要经典著作家的“西方文化”这门必修课，代之以“文化—观念—价值”这门新的必修课，把学生的注意力集中到第三世界学者、少数种族人士及女性作者关于民族和两性差别问题的作品上，换句话说，像柏拉图的《理想国》和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这样的名著只好割爱，以便让当今危地马拉一个农妇的自述性小说《我，里葛贝塔·门基》，或罕为人知的弗兰茨·法农(Frantz Fanon)的以宣扬暴力推翻殖民统治为主题的小册子《大地的苦难》搬上课堂。〔7〕

可以设想,堂堂的斯坦福大学当局,自然不会在涉及教学内容这个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上,轻易地俯首听从学生的摆布。然而它终究这样做了,其中必有文章。实际上,风起青萍之末,该校学生的举动只是普遍存在于全美青年一代人当中的反传统情绪要求表达的一例而已。斯坦福学生肇事之后,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教材内容也受到类似的质疑;霍利奥克山女子学院决定,学生可以免修西方文化课,但必须选修一门有关第三世界文化的课程;威斯康星大学的学生亦需选修种族研究的课目,但可放弃西方文化(甚至包括美国历史)的课目。达特茅斯学院的学生不修一门非西方文化的课程根本无法毕业。克利夫兰大学则要求其学生至少要选修两门美籍非洲人文化以及一门欧洲以外地区文化的课程。(8)这种要求彻底修订高等院校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的风潮,实际上正在席卷着美国三千多所大学,也在一定程度上波及到中小学。《哈泼氏杂志》(*Harper's Magazine*) 1991年9月号将30年代末罗斯福时期哥伦比亚大学一年级人文教程必读书目,与80年代布什时期的斯坦福大学“文化—观念—价值”概论教程的必读书目,列表加以对比,颇能说明问题。表如下:

1937-1938 学年哥伦比亚大学一年级人文教程必读书目:

荷马:《伊里亚特》

埃斯库罗斯:《俄瑞斯忒斯》

索福克勒斯:《奥狄浦斯王》、《安提戈涅》

欧里庇得斯:《埃勒克特拉》、《伊菲格涅亚在陶罗人里》、《美狄亚》

阿里斯托芬:《蛙》

柏拉图:《辩诉篇》、《宴话篇》、《理想国》

亚里斯多德:《伦理学》、《诗学》

卢克莱修:《物性论》

马可·奥勒留:《自省录》

圣奥古斯丁:《忏悔录》

但丁:《地狱篇》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

拉伯雷:《巨人传》

蒙田:《散文集》

莎士比亚:《亨利四世》第1、2部、《哈姆雷特》、《李尔王》

塞万提斯:《堂吉珂德》

弥尔顿:《失乐园》

莫里哀:《达而杜弗》、《厌世者》、《情不自禁的医生》

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

菲尔丁:《汤姆·琼斯》

卢梭:《忏悔录》

伏尔泰:《老实人》

哥德:《浮士德》

1988-1989 学年斯坦福大学“文化—观念—价值”概论教程(共8个部分)“欧洲和北美洲”部分必读书目:

圣奥古斯丁:《忏悔录》

左撇子:《老人帽之子》

弗洛伊德:《日常生活中的精神病理学》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马克思:《共产党宣言》

梅尔维尔:《巴特尔比》

圣经节选:《创世记》和《启示录》

左拉·赫斯顿:《他们的眼睛注视着上帝》

阿梅里科·帕雷德斯:《枪在手》

弗朗茨·法农:《大地的苦难》

胡安·鲁尔福:《平原上的烈火》

波浦尔·乌:《玛雅创世神话》

门楚:《我,里葛贝塔·门楚》

桑德拉·西斯内罗斯:《芒果街的房子》

露丝·贝内迪克特:《文化模式》

保罗·雷丁:《骗子》

#10[M]. J. 和 F. S. 赫斯科维茨:《达荷美记》、《非洲的神话和传说》、《荷马对赫耳墨斯的赞歌》

埃斯库罗斯:《被缚的普罗米修斯》

莎士比亚:《暴风雨》

埃梅·塞泽尔:《一场暴风雨》

C. L. R. 詹姆士:《黑色雅各宾》

阿莱霍·卡彭铁尔:《这个世界上的王国》

左拉·赫斯顿:《告诉我的马》

欧里庇德斯:《酒神的伴侣》

简·里斯《辽阔的藻海》

牙买加·金凯德:《安妮·约翰》

弗朗茨·法农:《黑皮肤·白面具》

欧里庇德斯:《美狄亚》

德里克·沃尔科特:《诗集》

埃梅·塞泽尔:《回到故乡去》

约翰·曼德维尔爵士:《游记》

哥伦布:(其第一、三、四次航行中发出的)《信札》

克拉利斯·里斯佩克特:《世上最小的一位女人》

贝纳迪诺·德萨哈贡:《墨西哥征服记》

卡门·塔弗拉:《玛琳切》

贝尔纳尔·迪亚斯·德尔·卡萨蒂略:《新西班牙征服记》

巴托罗梅·德·拉斯·卡萨斯:《为印地安人辩护》

詹姆士·拉利福德:《马什皮人的身份》

加西拉索·德·拉维加:《皇家记事》

菲利普·古阿曼·波马·德艾亚拉:《新纪年与好政府》

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社会契约论》

美国《独立宣言》(1776)

南非《自由宪章》(1956)

埃斯特万·埃切维里亚:《屠场》

惠特曼:《草叶集》

恩贝托·埃科:《神游超境界》

#10[何]塞·玛利亚·阿格达斯:《喷气飞机颂》及《献给我们先人图帕克·阿马鲁的颂歌》

法国《人权宣言》(1789)

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1948)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自传》

胡安娜·曼纽埃拉·戈里蒂:《作恶者必无好报》

弗兰克·劳埃德·赖特:《有生命的城市》

马克西诺·洪·金斯顿:《女战士》

从这两张必读书单,我们不难看出,今天美国大学生们所受到的传统文化教育与半个世纪之前确实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30年代末(更莫说此前),古希腊罗马、文艺复兴和启蒙时期经典作家的名著,构成了美国高校文科教学的基石,亦即美国教育界所谓的“真经”(canon),⁽⁹⁾甚至连美国本国的近代思想大师和文坛泰斗,其宏篇巨制都没有资格跻身于一流学府的神圣讲台之上。称此种现象为“欧洲中心论”,实在贴切不过。人们也不难想像,自幼深受此种教育陶冶的知识精英,对亚非拉美各民族的文明传统,会抱有怎样的偏见。此种偏见又被“白色人种优越感”和基督教的福音“使命感”所强化,从而长期形成了西方人士对欧洲大陆以外各文化体系的蔑视。这也就是平常人们所谓的西方传统。实际上,这是一种封闭的文化观。

美国大学目前正在发生的变革,矛头就是针对这一点。现在斯坦福大学的必读书目,与30年代哥伦比亚大学的必读书目相比,只保留了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欧里庇得斯、埃斯库罗斯、奥古斯丁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莎士比亚,其余一律割舍,同时大量引进了拉美作家的著作,以及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程中制定的重要文献,如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的人权宣言和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等。顺便指出,斯坦福大学的必读书目,只是“文化—观念—价值”课的八份必读书目之一,专供讲授欧洲和拉美文明传统教学时使用,有关亚洲和非洲等其他地区的,另有书目开出,这里虽不及详谈,但读者当能管窥一斑。

对于一个国家的学校教育,第一要义就是确定教材。这一点不应成为疑问。中国自汉至清,其间两千余年,虽曾数度因异族入主而偶有暂时曲折,但儒家经典即相当于美国的所谓“真经”,向来是学校的基本教程,儒学不但深入普通民众意识,循儒学而进身功名的士大夫阶层,更是维系两千年来的王朝政权及其典章规范、意识形态、人伦纲纪的主要力量,故有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夸张说法。设使中国当初没有产生过这一套经典著作,或者自汉以来中国的教育并没有采用这一套经典作为其教材,那中国的历史就会全然是另外一回事。据我们现在所知,世界上有相当数量的民族,尤其是非洲的许多民族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印地安人部落,并没有自己的文字,当然也就没有用文字记录的古代经典著作(尽管有其口头传说)。他们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就缺乏确凿的证据,并且,他们在近代史上往往成为外来侵略和压迫的对象。由此不难看出,任何一个民族,继承、阐扬、改造自己的文明传统对其存在和发展,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美国大学校园的变革之风,还突出地表现在学生招考和教授聘任的政策上。70年代以来,美国就业制度引入了所谓的“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计划,⁽¹⁰⁾规定凡拿到联邦政府合同或受其资助的各用人单位及学校,在招工和招生时必须参照当地居民各种族人数的多寡,按比例录用或录取。显而易见,这种做法,势必与传统的量才录用的标准发生冲突。⁽¹¹⁾1978年最高法院就加州大学(戴维斯)校董诉贝克案作出的判决,部分地抑制了肯定性行动计划的发展趋势。直到80年代中期,在延聘大学教授方面,这种以种族人数为标准而非以学术水平为标准的用人政策,在实际上并未真正被执行,尤其是在一些有名望的学府,尽管我们会发现,几乎任何一家大学的《学事一览》都标明,它是一个“执行肯定性行动计划的单位”。但近几年来,事情发生了变化。现在几乎所有的大学都有明确的指标,招收固定人数的黑人和西班牙裔学生。多数学校还为这些学生安排特殊的教学计划,提供额外奖学金,以使他们不被淘汰。美国大学招生不是采用全国统考的办法,而是根据学生的中学成绩报告和标准化测试成绩。大学要想招到足量的黑人和西裔学生,只好对

他们降低要求。值得注意的是,“肯定性行动”计划照顾的“少数民族”,实际上仅限于黑人和西裔学生,有时也包括印地安人、第三世界国家移民子女、残疾人、同性恋者,但不少亚裔却不在此列,尤其是华人、朝鲜人和日本人,因为其成绩一般比较突出,所以也成了白人子女的陪绑。例如,在加大(伯克利),黑人和西裔学生若和白人或亚裔学生具有同等成绩的话,那前者被录取的可能性就是后者的20倍。该校商学院的恩内斯特·科尼斯堡(Ernest Koenigsberg)教授是招生委员会的成员,他坦率地承认,如果一个申请进入该校的高中比业生中学总平均成绩是3.5分(满分为4.0分),SAT(Scholastic Aptitude Test)标准考试成绩为1200分(满分为1600分),若该生是个黑人,那他就有100%的把握被录取。但如果他是个白人学生或者是个亚裔学生,那他被录取的可能性则只有5%。美国东北部地区那些素负盛名的一流大学,如哈佛、耶鲁、MIT、哥大等,因其历史悠久,钟楼宇舍长满四季常青的攀缘藤,世谓常青藤大学,是地道的“象牙之塔”。但这些被认为是学术和知识象征的学府,雄心勃勃的青年学生无不趋之若鹜,视之为理想的深造之地和进身台阶,所以竞争向来十分激烈,新生一般都有接近4分的中学成绩和1300分以上的SAT成绩。但近来为了求得改变学生种族结构,也只得大幅度放宽黑人、西裔子女的入学标准,甚至中学成绩不满3分,SAT成绩在1000分以下的也招收进来。南部的大学也不例外。(12)对此种现象,科尼斯堡先生说道:“我想,这样做是不公正,但有什么办法呢,规矩不管怎么定,总是有利于某一部分人,伤害另外一部分人。”威斯里大学的历史系教授迈克尔·哈利斯(Michael Harris)说:“当你看到有人使用‘资格’一词时,请记住,这是白人提出的新式口号。”(13)

随着高校学生成分的变化,学校的规章制度、管理措施及条例也进行了重大的调整,人际关系更是今非昔比。最为引起争论的,是学校为执行种族、两性及性爱方向(14)平等所制定的那些严厉的惩罚措施。密歇根大学的一个研究生发现并确认他的同屋是一位同性恋者,于是向校方负责分配宿舍的官员提出调换房间的要求。不料这位官员大为恼火,反倒认为这位研究生有毛病。最后虽然同意给他调换房间,但警告他说,此事千万不可张扬出去,否则就将受到学校的纪律惩罚,理由是他在性爱方向上有歧视他人的嫌疑。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法学院教授委员会在1988年通过一项规定,警告学生不得在种族、性别、出身、年龄或性爱方向诸问题上出言不逊,包括使用过去那些习以为常的带有偏见性的词汇。违反者将不能指望得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因为“我国知识界共享的价值,远超出对公开自由辩论的一般性承诺”。(15)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1989年宾州大学新生入学教育的主要内容,是“提高学生对种族、性别和性爱方向等问题的认识”。有一位女学生对此持有异议,于是给校领导写信,表达她内心深处“对个人的尊重,以及对保护社会所有成员自由的愿望”。校方却把她的信打回,在“个人”二字下划了底线,并指出“‘个人’在今天已是个危险字眼,它被许多人认为带有种族歧视之意,主张个人重于团体的观点,说到底还是维护白人的个人特权。”(16)

所谓“肯定性行动”计划确立的用人指标,不仅体现在大学招生上,也反映在教授的延聘方面。以杜克大学为例,该校在80年代末作出了两项颇有争议的决策。一是开创“新学术”,即大力加强对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读者反映论等一系列时髦学术思潮的研究。本文虽不打算在这里详细介绍这些主义或理论的微言大义或利弊得失,但要指出,它们都认定西方传统的文学、哲学、历史及法学的所谓学术客观性是虚伪的,并认为,过去任何被奉为金科玉律的经典之作,本身并无实质上的固定内容,因此可对其作任何解释。后结构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前主席、现执教于杜克大学英文系的芭芭拉·赫恩斯坦·史密斯(Barbara Herrnstein Smith)曾宣称:“世上并无什么知识标准或选择是客观的。甚至荷马也是某种特定文化的产儿。其实人们不难设想存在着别的一些文化,在那里,荷马根本就是毫无意思的。”(17)关于这种“新学术”的本质,

也许哈佛大学教授萨克万·贝克维奇 (Sacvan Berkovitch) 说得最透彻: “正如 (启蒙运动之前) 一度被视为永恒的天佑、等阶制度和君权神授等后来都被证明并非是绝对的真理一样, 现在的个人主义、自立精神和民主理念也已被证明并不一定就符合自然和思维的规律。”美国学会理事会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在其最近散发的一份题为《为学术辩护》的文件中说, 要在本质上证明民主制政府比独裁专制政府优越是办不到的, 民主制不过是西方选择的一种“思想承诺”而已。在 1989 年的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年会上竟然可以堂而皇之地讨论“女同性恋者的文艺批评理论”及“手淫灵感”这样一些课题。(18)

杜克大学 1988 年的第二个重大决策, 就是硬性规定各系在 1993 年之前必须再加聘一位黑人教授。凡办不到的, 届时将受到行政处罚, 除非能拿出过硬的证据, 表明已尽最大努力而物色不到合适人选。杜克大学这两项政策实际上是有内在联系的。“新学术”既以批判或变革传统学术为己任, 全面否定民主、市场经济及法定程序等西方社会的基石, 所以也就为那些不具备传统学术水平的人, 特别是少数民族及妇女学者开辟了就业机会。杜克大学的这种政策在美国高校决不是孤立的。威斯康星大学同在 1989 年宣布, 它在 1991 年底之前将再聘 70 位少数民族出身的教授, 威廉斯学院则打算在 90 年代初使少数民族教员占其师资队伍队伍的 20%。在这方面普度大学的招数就更绝了: 校方答应凡在近期能招聘到一位少数民族教授的前五个系, 均可获得学校额外的资助, 以便再增加一个教授职位, 就是说, 买到一斤青菜, 学校就出钱帮你再买一斤牛肉。麻省的罕布什尔学院最近几年来聘请的教员, 一半是少数民族的知识分子。卡内基-梅隆大学执意要开风气之先, 在全国首次为本科生开出“后结构主义”课程,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布朗大学、印地安那大学、加大 (欧文)、纽约州立大学 (布法罗) 亦唯恐落伍, 纷纷起而效之。(19)

既然大学都在竞相延揽黑人及其他少数民族的人才, 黑人博士生就成了智力市场上的抢手货, 同时各大学也在相互挖墙角, 以图把他校的黑人教员吸引到本校来。美国今天有 3500 余所四年制正规高校, 教员 70 多万, 1987 年有全日制学生 720 万多名, 半日制学生 550 万多人, 获得学士学位的当年为近 100 万人, 获硕士学位的近 30 万人, 获博士学位的 34839 人 (其中约有 26% 即 7000 人为外国留学生)。在这 34839 名博士生当中, 黑人只有 765 人。更加成问题的是, 黑人博士基本上都是学教育学的, 从事基础学科研究的几乎没有几个, 这就使得延聘黑人教员的难度极大, 形成僧少粥多的局面。而且, 争先恐后聘用黑人的不仅仅是学校, 企业单位也在力求达到它们贯彻“肯定性行动计划”的“用人指标”, 而且有人统计, 黑人博士生毕业后五年之内若在高校从教, 其平均工资为 3 万美元, 而若在其他部门找到就业机会, 同期平均工资却有 37000 美元。在这种情况下, 各大学要招聘到黑人教员实在如大海捞针, 有的出高薪到霍华德、费斯克 (Fisk) 及图加卢 (Tougaloo) 这些黑人院校去釜底抽薪, 有的到第三世界国家去输入, 有的甚至根本不管求职者能否任教, 只要不是白皮肤就行。(20)

二

教学内容的更新和师生成分的改变, 从表面上来看, 反映了美国的教育制度、学术标准和知识结构的转化, 从深层上来看, 则预示着美国社会性质正发生着一场激烈的变革。集中体现出这一点的就是整个价值体系的倒置。

不错, 哥伦布于 1492 年到达美洲之前, 北美就已长期居住着各印地安人部落, 它们亦曾创造出高度发达的文化。但今天的美国社会, 原则上是按照欧洲人的信念建立并演化而来的, 开拓了美国本初 13 州的英国人的影响, 尤为显著, 英国的传统构成了美国的主流文化。英文是美国的统一语言。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期间, 英国人所形成的代议制政府、法律结构以及重视个人自由的观念, 被移植到了北美, 成了美国的基石。美国宪法确立的三权

分立的原则无疑源出于法国伟大的哲学家孟德斯鸠。

新学术,即由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和后解构主义批评家们发展出的所谓文化多元主义(Multiculturalism),对奉欧洲文明为主臬的美国主流文化提出的最严峻的挑战,就是它否认任何一种价值体系在本质上会比其他价值体系更优越,所有的文化生而平等。(21)这句话正好戳到了美国历史的疮疤。我们都知道,作为美国建国理想的《独立宣言》,开宗明义就宣称“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但这“人人”(英文原文是“all men”,即所有的人)却并不包括黑人、印地安人及其他有色人种。应当指出,《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托马斯·杰佛逊本意是“人人”也应包括黑人的,所以在他提交给大陆会议的原稿中专列了一段谴责奴隶制度和贩卖黑奴的条款,但在1776年7月4日的讨论过程中被删去了。(22)美国宪法据此更是公然割裂人性,在规定进行人口普查以确定国会代表名额时,将五个黑人作为三个计算。通过19世纪中叶的内战和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黑人摆脱了奴隶身份和肤色歧视,和其他有色人种一道获得了政治和法律上与白人平等的地位。但在社会和经济方面,客观地说,仍戴着无形的“二等公民”的帽子,尽管在理论上,“机会均等”这一口号已被美国思想界(包括白人)所承认。但是各种文化是否都在本质上具有同等的价值,争论就大了。

我们先来看看文化多元主义者的观点。

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意义500年来虽不能说已有定论,但公认是一次伟大的事件,尽管不少史学家对西班牙王室和哥伦布本人的动机多有微词。现在,文化多元主义者对此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认为不是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而是印地安人“发现了”哥伦布(和欧洲人)。哥伦布是有罪的,罪过之一是引发了对北美土著人民长达几个世纪的“种族灭绝”之战,其二是毁坏了南北美大陆的“生态平衡”。1991年10月初,正当美国(及其他南北美国家)筹备于1992年庆祝哥伦布到达美洲500周年的活动拉开序幕之际,两万多名来自南北美各地,从阿拉斯加到智利的印地安人,在危地马拉集会,打响了反庆祝的开场锣鼓。今年届时无疑会有一场热闹的对台戏。(23)

1691年,非洲黑人多次被荷兰人带到英国人开拓的第一个北美殖民地詹姆士敦(原址在今天的弗吉尼亚州)。(24)文化多元主义者现在劝告学生不要称当时的黑人为“奴隶”(slave),因为这个词不包含“人”这个字,而应当称之为“受奴役的人”,并要求学生“想像当初这批被当作财产来买卖的受害者的亲身实感”。1621年初新英格兰的清教徒庆祝在北美第一次获得丰收,并邀请曾在前一年刚来时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的印地安人赴宴,这本是早期北美外来拓荒者和当地人民相安共处的友好范例,一直传为历史佳话,形成了所谓的“感恩节”。文化多元主义者现在则指控感恩节是欧洲殖民者掠夺和毁坏印地安人的象征,是对欧洲白种人欺诈土著居民的美化。(25)

19世纪后期,美国有过一场大规模向西部推进的开发运动,促成了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根据弗雷德里克·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的看法,这种边疆上文明与蒙昧的进退消长,正是美国民主特点的根源和成熟的条件。但是这种观点已经被文化多元主义者推翻,他们坚持认为,西进运动应当被视为对印地安人的大屠杀,而且“大屠杀”一词坚持用习惯上专门用以指代希特勒夷戮犹太人的Holocaust。纽约州立大学(宾厄姆顿)的阿里·A·马兹瑞(Ali A. Marzrui)教授说:“Holocaust一词不应当只适用于纳粹统治下的犹太人的遭遇,美国印地安人和黑人也有权利利用这个词来描绘自己。”(26)

美国是个移民国家,现有种族约200多个。(27)各种族整合的办法,或曰机制,就是史学家们所说的“大熔炉”理论。现在大熔炉一说也遭到了非难。新理论派人士争辩说,在美国这个大熔炉里被炼焦的,甚至化为乌有的是众多的非WASP(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即信奉新教的盎格鲁撒克逊白种人)种族的历史和文化,有色人种变成了白人的添加剂。因而现在应当强调有色人种的传统和身份,特别要突出他们与白人的区别。也就

是说,美国应当打破大熔炉,让各个种族分灶。(28)最突出的例子就是黑人现在又在办起分离学校。几百年来,黑人子弟一直被剥夺进入白人学校就读的权利。南北战争后,一些地方专门为黑人办了学校。直到本世纪中期的民权运动才最后打破这个种族藩篱,黑人子女得以和白人子女走进同一所学校,这本是消除种族歧视的一大进步。但是某些激进派黑人今天力主“非洲中心主义”(Afrocentrism),提倡“寻根”,恢复并发扬黑人文化,因而主动办起了专收黑人的学校,从而引起了新的司法诉讼,甚至在中国都引起关注,《文汇报》专门为此发了一则消息。(29)民权运动之前,黑人称 Negro,民权运动兴起之后, Negro 成了禁忌,称 Blacks,现在 Blacks 又逐渐成了问题,时髦的称呼是 Afro-Americans。大学里的系主任原来都用 Chairman,后来女权主义者提出反对意见,开始称 Chairperson,时下又流行 Chair。激进派人士并对传统的地理学观念提出新义,理由是原来的东西方定位是以欧洲为中心确定的,故而远东(Far East)和中东(Middle East)应改为东亚(East Asia)和西南亚及北非(Southwest Asia and North Africa)。1991年发表的纽约州教育委员会的官方报告(又称 Sohol 报告,因为 Thomas Sohol 是该委员会主任),甚至尽量避免使用“美国人”字样,以便突出“相互依存的世界公民”的内涵。(30)

被文化多元主义者颠倒的决不止历史。两性也成了不可调合的社会和政治问题。美国宪法没有提到男女平等,其第19条修正案仅保障妇女在政治上有选举权而已。为争取男女平等而修宪的运动已开展了几十年,男女权利平等的法案——即 Equal Rights Amendment (ERA)早就拟好,并且已获得国会通过,但作为宪法的一条修正案,必须有2/3的州的批准方可算数,几经交付表决,皆未打通34个州,现在仍搁在那里。笔者仅在此强调,美国的妇女问题,并不等同于中国人概念中的男女平等问题。美国妇女问题现在的焦点集中在女权主义运动、性爱自由和堕胎这三个方面的争论上。争论的实质是,要否彻底否定几千(万?)年来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形态,不管它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抑或后工业社会。女权主义者的理由很简单,也很过得硬:此前一切文明社会都是妇女亦即半数人类的地狱。美国的女权主义者十分厉害,著名的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曾告诫女权主义者不要搞得太过分,否则就会“引起男人杀女人的危险。你们已实际上把他们逼得发疯了。”(31)有人开过这样一个玩笑说,一对夫妇住在纽约治安不良的曼哈顿西端,曾两次被劫。这对夫妇决心起来自卫,男的坚持要买一把左轮手枪,女的坚持要养一头凶狠的猎狗,二人争执不下,最后妥协,决定请一位女权主义者当保镖。(32)女权主义的健将、罗特格斯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现代语言协会前任主席凯瑟琳·斯蒂姆森(Catharine Stimpson)女士否认一切传统的准则,认为“在捍卫客观性和严谨学风——这本身就是一笔糊涂帐——的伪装下,他们(指正统派人士。——笔者注)正在竭力维护主张异性爱白人男子的文化和政治统治。”(33)女权主义的组织,相当有影响的全国妇女协会(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Women, 或 NOW),最近选举了 Patricia Ireland 为主席。这位女士虽已结婚20几年,丈夫还在,但众所周知(她本人也直言不讳地宣称),她近年来一直公开和另外一位女士保持着同性恋关系。但这并不妨碍她当选为 NOW 的主席!(34)这一事实当然足以加深我们对美国的女权主义的理解和认识。要说美国女权运动意在争得男女平等,似乎尚未充分估计到她们的要求,要说她们的目标是在把妇女地位提到男人之上,当然也无明显的证据,把她们的纲领概括为达到男女对立(至少是平行)也许不失客观。但不管怎么界定女权运动的方向,它都是对美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的严峻挑战,是促进美国社会发生急剧变革的一股强大政治力量。最近,就任命克拉伦斯·托马斯先生为最高法院大法官而引发的“性骚扰”风波,就清楚地表明了女权运动的政治能量。经过里根和布什两届共和政府的努力,在这次任命前,最高法院的九名大法官已形成了保守派占多数的阵势,其中唯一的黑人瑟古德·马歇尔属于自由派。马歇尔因年事已高提出退休后,布什总统提名托马斯继任。托马斯虽是黑人,但却持保守观点,这就激起了文化多元主义者,包括女权主义者的

不满。于是他们就抓住托马斯十年前与一个女人的交往大作文章,采取无限上纲的手法,对之进行“人格刺杀”,硬把那些根本不足以构成暧昧关系的个人隐私,说成“性骚扰”,差一点把这位算得上正直的黑人学者拉下马。顺便说一下,美国工作场所男子对女性的非礼或骚扰确实是存在的,作为一种社会病态,情况也确实较为严重。但就托马斯这一个例而言,事实被夸大了,甚至被人为地搞成了政治问题和党派之争。(35)

人性的分裂和对立,还突出地体现在同性恋问题上。同性恋不但是困扰美国当代社会的一大道德问题,也构成美国人权概念中的一个难点。美国同性恋者究竟占到整个人口多大的比例,笔者手头没有准确的数据(据《幸福》杂志(*Fortune*)1991年12月16日一期估计,美国同性恋者约占其成年人总数的10%左右)。但旧金山有20多万人,休斯顿有10几万人,这是有统计的。80年代,这两个城市的两位女市长D.范因斯坦(D. Feinstein)和C.魏特迈(C. Whitmire)之所以能当选,同性恋者的选票曾起到关键的作用,她们当选后,都曾亲临同性恋者社区的俱乐部和夜总会当面致谢。同性恋者,都归属在文化多元主义的旗下,已经成为美国地方政治的一种不可小视的力量。在美国各级政府里,现有同性恋者公开选出的官员53人。有四个州已通过法律禁止歧视同性恋者。(36)下个世纪,如果有位同性恋者出来竞选美国总统,当不会太令人吃惊。旧金山已有法律规定,同性恋伴侣一方去世,另一方有继承其财产的权利。当今著名的世界网球女星纳夫罗蒂诺娃,最近与其同性女侣分手,只得拿出巨款才得以私了。

同性恋者(Homosexual)在性爱方向及性爱方向所引起的其他法律、社会、就业等问题上,是否具有和异性恋者(Heterosexual)同等的权利,美国法律,尤其是宪法第14条修正案所保障的所谓人权条款,是否应当一视同仁地适应于同性恋者,美国各界人士长期为此争辩不休,莫衷一是。最高法院对此至今尚无判例。只有宗教界和军方的反对声音最响,立场最不妥协。最近在同性恋问题上就“隐私权”引发的一场风波,乃是由一部分持激进观点的同性恋者发起的一场所谓的“曝光”(Outing)运动。纽约曼哈顿闹市区经常突然有人张贴告示,指出文化娱乐界的一些大名人是“不折不扣的同性恋者”。对同性恋激进分子们的这种做法一方面表示他们对长期受到歧视感到难以容忍,意在宣泄其不满,同时也想借助把身为同性恋的名人公诸于众,来向社会表明,搞同性恋的决非全是不耻于高等社会的奸小之辈,以求提高世人对同性恋的接受程度。最近他们特意公布了美国国防部一位高级官员是个同性恋者,且看军方如何动作,因为美国军队对同性恋者向来是毫不宽容的,已经证实而被勒令退役的同性恋者已达1400多人,包括那些去年年初在海湾战争中为保卫“美国及盟邦利益”而出生入死战斗过的军人。支持“曝光”行动的美国小说家阿米斯泰得·茅平(Armistead Maupin)说:“军方根据个人的性爱方向而使同性恋者吃尽了苦头,这位高级军官被曝了光,且看他们怎么办吧。”(37)

三

对传统西方价值观念的反叛,对公认社会行为准则的抗拒,对少数种族(即非白人种族)失落文化的寻索,对怪癖和荒诞行径的迷恋,现在被美国思想界视为一场历史“受害者”的革命。(38)如上文所述,所谓历史受害者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种族主义(Racism)的受害者。这一类人泛指美国近2.5亿人口中除去“信仰新教的盎格鲁撒克逊白色人种”(WASP)以外的一切少数种族。这里又有层次讲究。至少在19世纪末之前,来自南欧地区的操拉丁语言、奉天主教的诺曼民族和来自东欧的信奉东正教的斯拉夫民族,及至犹太人和爱尔兰人都是受种族主义之害的少数种族。但20世纪以来,由于这些少数种族属白色人种,共享欧洲历史文化传统,加之他们在美国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提高,已不再被认为是受害者了,甚至被非白色人种的少数种族视为种族主义者。(39)现在的少数种族,主要是指美国土

著人种印地安人, 非裔美国黑人, 来自中南美的混血拉丁人, 尤其是来自墨西哥的齐卡诺 (Chicano) 人, 以及来自亚洲的美籍人。他们在人数上大致占到美国总人口的 25%。所谓多元文化主义, 就是指这些人所代表的母国历史文化。第二类是性别主义 (Sexism) 的受害者, 主要指妇女、同性恋者以及有其他性变态者。这些人的受害历史就深长久远了, 大致从母系社会解体起就一直如此。第三类是阶级 (Class) 压迫的受害者。这是美国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论点, 其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就是杜克大学的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Frederick Jameson) 教授。受阶级压迫之害的人当然也包括少数种族, 包括白人贫困阶层, 失业者, 无家可归者, 等等。

受种族歧视之害的人 (主要是黑人), 现在已发展起一门崭新的学问, 即“非裔美国学”或“非裔美国人研究” (African-American Studies), 并提出“非洲中心论”作为自己的战斗旗帜。其代表人物有坦普大学非裔美国学系主任莫勒菲·凯特·阿桑特 (Molefi Kete Asante), 康奈尔大学政府学教授马丁·伯纳尔 (Martin Bernal) 和纽约市立大学黑人研究系主任利奥纳德·杰弗里斯 (Leonard Jeffries)。阿桑特 1988 年出版一本专著, 书名就叫《非洲中心论》 (Afrocentricity), 伯纳尔从 1987 年到 1991 年推出了他的多卷本长篇巨著《黑人雅典娜》 (Black Athena) 的前两卷。这几位学者确实提出了不少令人大吃一惊或耳目一新的观点。诸如, 他们断言欧洲文明源出于非洲, 根据就是埃及在非洲, 只因 19 世纪欧洲学者出于偏见, 故意割断了爱琴海文明对埃及传统的继承关系, 创造出“雅利安模式”的近代神话, 从而在近 200 年来, 维持了“欧洲中心论”的虚假历史观。他们说, 实际上, 所谓欧洲文明, 只是非洲黑人古代伟大创造部分地向北方殖民和迁徙的结果, 雅典和希腊充当了非洲文化向欧洲及中东扩张的桥头堡。因而, 不但古埃及法老们和妖后克利奥佩特拉 (Queen Cleopatra) 是黑人, 而且连欧几里德、荷马、苏格拉底甚至连耶稣基督都是黑人。不仅大仲马和普希金具有黑人血统 (这方面的证据颇为确凿), 而现在又有不少人“考证”出贝多芬的祖先也是黑人。不仅作为现代欧美文明基石的西方哲学、政治学、法学和伦理学, 其起源都可以追溯到非洲, 而且像造纸术、指南针、圆周率、杠杆原理这些科学技术上的发明创造, 也是古代非洲黑人的功劳 (中国人当然就更没有份了)。利奥纳德·杰弗里斯还有一个关于人种学的高见, 即整个人类可以分为冰人 (Ice People) 和“太阳人” (Sun People) 两大类, 地球北部的“冰人”生性贪婪好战, “太阳人”则天然乐施好善。杰弗里斯所说的冰人就是白人, 太阳人就是黑人, 他并认为, 从生物学的观点来看, 白人要比黑人低劣, 白人价值体系发展的顶峰就是德国的纳粹主义; 白人的基因在冰川时代遭到毁坏, 而同期的黑人的基因却被“太阳价值系”所强化。不知是历史的巧合, 还是我们对远古的知识太过贫乏, 现在人类学家几乎已有定论, 整个人类的起源确实可以追溯到东非 (这离埃及就更近了)。(40)

在美国, 任何问题, 一涉及到肤色, 那就永远不会找到科学的根据, 也永远没有解决办法。最近却有例外发生。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家自然博物馆二楼大厅, 从 1966 年以来就展出一个根据考古学所构塑出的非洲猿人头部。这种非洲猿人 (Austra-Lopithecus) 被人类学家迄今公认是最可能的人类直系祖先。现在这个展厅却被迫关闭了。因为哥伦比亚特区的一个名为图瓦莫佳 (斯瓦西里语, 意思是“我们是一家”) 的非洲研究团体向该馆提出抗议, 说这个猿人头部酷似乘五月花号来美的那些 DEWM (Dead European White Male) 即死去的欧洲白人男性, 而不像黑人, 强烈要求对这个猿人头部进行整修。相应地, 该馆一楼大厅关于人类起源和进化的大型壁画也需重绘。史密森博物院 (国家自然博物馆是其一部分) 现已和该团体进行了五轮会谈, 以便“确定”白色人种究竟是在过去 20 万年以来的哪一个阶段上才出现在原本是黑皮肤的人类大家庭的。

持“非洲中心论”观点的学者并非都是黑人, 贝纳尔就是一例。此公有犹太血统, 原是英国人, 本是东亚问题专家, 对中国、越南和日本颇有研究, 其父曾是蒙巴顿勋爵的秘书。

在来康奇尔大学执教前,突然产生发古思幽之情,赴希腊和埃及考证古籍,遂成其说。黑人学者当然也不都是“非洲中心论”者。哈佛大学非裔美国人研究系主任亨利·路易斯·盖茨(Henry Louis Gates)一针见血地指出,非洲中心论者在逻辑上自相矛盾,因为他们一方面竭力贬低欧洲文化,另一方面却又千方百计证明欧洲文化渊源于非洲。“更何况,”盖茨问道,“假设柏拉图就是个黑人,那又能证明什么呢?”难道非要把人类最伟大的历史成就归功于白人或黑人不可吗?难道黑人和白人不都是人吗?为什么一定要把人类按肤色分等次呢?盖茨提醒说,切不可让非裔美国人研究给种族激愤情绪所吞噬,应当以批判的眼光,客观而公正地研究各种文化,要提防文化观被埃及法老的幽灵所纠缠。人性是共通的,要鉴赏米尔顿,不一定非是个白人、非是个盎格鲁撒克逊人、非是个新教徒、而且非是个瞎子不可。类推到中国,就是说,要借鉴《史记》的教益,不一定非是一个黄种人、一个汉人、一个儒家知识分子、而且非得被阉过不可。(41)

文艺批评方面的各种新理论(即结构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等),美国历史肤色论或曰种族论,两性对立的女权论,同性恋的平等论,世界文化的非洲中心论,皆从不同的角度对美国的基本价值观念发起了挑战,这是显而易见的。应当看到,这种挑战的性质不能完全用学术观点的争鸣和探讨来概括,它带有政治性。波士顿大学社会学教授布里姬特·贝格(Brigitte Berger)的一席话,可能打到了点子上。她说:“总之,美国学术界现在已成为争夺如何界定社会现实的战场。大学以其自身特有的性质而为交战各方提供了某种象征性领地,处在危急之中的远超出纯学术的圈子。虽然辩论各方都选用哲学理念的术语来参战,但他们所体现的,都是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不管其用词是何等的含混不清。正因为如此,所以参辩者无不在感情上十分冲动。也正因为如此,所以美国高校知识分子之间的战斗决不局限于争夺美国下一代的思想。今天问题的关键在于大学对自身的理解,更在于整个西方学术传统和这种传统赖以立足的文化价值体系是否还有合法性。”(42)贝格女士并指出,这场深刻的文化危机并不是美国独有的,几乎在同一个时间框架内,其他西方社会也不约而同地在文化观念方面发生了类似的新旧对立,且攻守双方的格局也大体相仿,“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出现在地球那一面的巴黎、法兰克福、伦敦和阿姆斯特丹的论战,与地球这一面的伯克利、哥伦比亚、哈佛和密歇根所进行的交锋,简直如出一辙。”(43)根据加州大学(伯克利)比较文学和希件莱文学系教授罗伯特·阿尔特(Robert Alter)的看法,文化多元论者、非洲中心论者及女权主义者(虽然也包括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等左派人士,或激进派人士,其所以要对传统欧洲文明发起挑战,目的乃在夺取政治权力。在去年由美国人文科学基金会及乔安娜·S·罗斯基金会资助的“变化中的美国大学文化”专题讨论会上,阿尔特先生指出,各种激进派人士正在使学术高度政治化,并确立文艺批评对文学著作本身的优先地位,来夺取教育和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并进而实现新的社会“解放”,这场文化“革命将不是来自枪杆子,而是来自对经典著作涵义的颠倒,来自一语双关的连珠炮,来自对普通英文词语的篡改”。(44)不少黑人学者更是直言不讳地宣称,要改变美国的社会制度。盖茨公开地主张建立起“黑人、左派分子、女权主义者、解构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彩虹联盟”,“当老一代人退休之后,我们就将执掌大权。”

四

无疑,文化多元主义和形形色色的激进派人物在意识形态领域所掀起的这场彻底否定西方传统文化的运动,或者说革命,不会不遭到右翼分子、保守主义者以及大多数开明派人士的反对和批判。据《新闻周刊》今年3月16日一期报道,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派特里克·布坎南(Patrick Buchanan)称文化多元主义为“美国的垃圾堆”。来自纽约州的参议员丹尼尔·巴特里克·莫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在1991年8月份,点名抨击纽约

市立大学那位把人类分为“冰人”和“太阳人”的杰弗里斯教授，并要求纽约市政府把他开除出大学。（45）纽约州州长马里奥·科莫（Mario Cuomo）在1991年纽约市庆祝哥伦布节大游行之际，针对近年来种族团体对这位伟大航海家的非难，公开表态说，哥伦布沟通了新大陆与全人类的联系，并迎来了“500年的开发和民主政府的缔造”。（46）美国文坛近年来对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ism）和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的批判是众所周知的，尤其是在1989年维克多·法利阿斯（Victor Farias）出版《海得哥尔与纳粹主义》，以无可辩驳的证据，表明这位被解构主义大师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奉为其思想之父的德国哲学家，原来是希特勒的忠实信徒和崇拜者；紧接着，与德里达并驾齐驱的另一解构主义健将保罗·德·曼（Paul de Man）也被揭露出是个狂热的亲纳粹分子，曾主张将犹太人全部关到一个封闭的飞地上，并为法国的维希政府大唱颂歌。德·曼本人则犯有重婚罪，抛弃过自己的家庭，是个十足的伪君子。（47）他在1979年出版的《阅读的讽喻》一书中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任何罪责都是可以原谅的，（因为）经验总是同时作为虚构推理和实际事件的双重可能而存在的，人们从来就不可能断定这两种可能性究竟孰是孰非。”（48）这话说在他自己去世之前，他的历史真面目当时尚不为世人所知。他可能早就有什么预感吧。对种种激进分子的攻伐集中体现在最近出版的三本书中，一本是美国当代颇有名气的历史学家小亚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写的《正在分裂的美国》（*The Disuniting America*），一本是罗杰·金鲍尔（Roger Kimball）写的《在大学获得终身教职的激进分子们》（*Tenured Radicals*），以及迪奈希·德苏查写的《不自由的教育》（*Illiberal Education*）。假如说“欧洲中心论”导致了“种族隔离”，那么，施莱辛格就认为，非洲中心论的历史观开出的只不过是个“思想隔离”的处方罢了。（49）施莱辛格对文化多元主义可能给美国造成的危害深表担忧，他发问道：“美国原本是一个由能够做出自己选择的个人所组成的国家，但现在却反其道而行之，日益变成一个由种族特征无法消除的团体所凑合起来的大杂烩。凝聚力中心还将能维系下去吗？”针对那种认为古往今来所有作家不能划分良莠，每个动过笔的人都有同等价值的所谓有多元概念，著名作家索·贝娄（Saul Bellow）说，“当祖鲁人产生出他们的托尔斯泰时，我们会认真拜读的。”（50）约瑟夫·艾普斯坦（Joseph Epstein）在《哈得逊评论》1991年春季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学术动物园：实践中的理论》，以辛辣的笔触历数了文化多元论者、女权论者和解构主义者的极端荒唐之处。他从政治角度来对待这场文化论战，指出人文科学的政治化，乃是问题的要害。他说：“此种政治化的人文科学所提出的问题，其影响远远超出常青藤校园四壁内的学术。近年来美国高等学府对西方文化和自由制度的谴责之声一直不绝于耳，这决不是一般的清谈，它体现出对社会基础的有组织进攻，而这种社会基础恰恰保障了文化和艺术生活的独立，包括高等教育的独立。在女权主义者和解构主义者以及类似主义的鼓吹者们所设想的那种变革的背后，确有一张激进变革蓝图，意在使得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从我们赋予主流文化的独立地位到人们相互交往的方式，都发生革命性变化。正因为如此，人文科学的传统概念和公认的文化经典才受到学术界新潮人士的恶毒攻击，被诬蔑为西方民主社会苦心孤诣加以确立并维持的那些理想和价值文化卫道士。”（51）

保守派为了更有效地对抗文化多元主义者和其他新潮人物，建立起了自己的组织“全国学者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lars）。该协会总部设在普林斯顿大学，主席是斯蒂文·巴尔奇（Stephen Balch）。分会遍布全国20几个州，成员有几千，像哈佛大学的爱德华·O·威尔逊（Edward O. Wilson），杜克大学的詹姆士·大卫·巴贝（James David Barber）和前驻联合国大使珍·柯克帕特里克这样一些蜚声美国学界的头面人物都是该会的成员。他们还出版了刊物《学术问题》（*Academic Questions*）。他们在新奥尔良的图兰大学、得州州立大学（奥斯汀）、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克拉克大学、纽约市约翰·杰伊学院，最近已与反对派展开正面交锋，在课程设置、教材编写、招生及招聘、评估教授方面寸步不

让,并取得了某些胜利(或妥协)。保守派并开始诉诸法律手段来遏制新潮派对主流文化的进攻。1991年4月,来自伊利诺斯州的众议员、共和党人亨利·海德(Henry Hyde)向国会提交了一份法案,竭力要求阻止文化多元的主张渗透到私立学校,这个动议得到了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的支持。

五

美国目前这场由文化价值而引发的关于西方民主社会性质的大辩论,对于我们观察和理解美国未来的发展,是很有启发意义的。资本主义并非是一成不变的万年江山,美国社会正在循着它固有的规律在演变。关于这场大辩论的起因,美国学者提出了多种解释。本文因篇幅有限,不能在这里逐一介绍和剖析,仅将多数观察家共同认定的几点概述如下。(1) 60年代美国青年造反运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60年代那场反叛,矛头指向有二,一是争取“民权”,二是“反文化”。肯尼迪时代的民权运动在马丁·路德·金的领导下,应当说很有成就,至少在法律上有个了结,但文化问题仍然是笔糊涂帐。永远使人类迷惘的是,文化在历史上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结合美国的具体国情,美国文化对生活在这个文化之中的各个民族,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对这种文化,是认同,还是拒斥,后果又都是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不但一般民众,就是知识界,也是难以判定的。60年代以青年人为主体的那场对抗,简单地对现存文化一概加以否定,所以称为“反文化”(anti-culture)。实践证明,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笼统做法,是无济于事的。现在这场运动,不是60年代的机械重复,可以说是进了一步,提倡“多元文化”(multi-culture)。这里当然包涵了更多的理性思考。所以能发生这种嬗变,因为60年代那批青年学生,有一部分人已成了现在美国的雅皮士,但也有相当数量的人由当年的大学生,变成了现在的大学教授,由 anti-culture 到 multi-culture 的理论演进,代表了美国当今激进知识界在过去20年里对社会哲学思考的进步。(2) 美国大学教育的内容和性质产生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化,正如布里姬特·贝格教授指出,“从结构上来看,美国高等教育在本世纪50、60年代的迅速膨胀,把学院从国家少数精英分子独占地变成了‘开放性大学’,承担起给大部分国民提供教育的职责。同时高等教育又由一度的自我封闭状态扩展为令人望而生畏的巨大研究机器……实质上,这种结构膨胀和内容扩展,已将学术事业转化成了公司实体,惊人地要求按金融市场、资本冒险精神和掠夺规律等项原则行事。”(3) 换句话说,美国大学学术走向政治化和反现实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高等教育的普及,以前为少数有产者独享的大学,教育出来的是维护现存体制得以立足的传统文化和价值的精英,而现在逐渐走向民众化的大学所培养出来的人,由于其本身社会地位的不同,必然要对迄今历史本身产生怀疑。这种看法,不能说没有见地。(4) 美国人口的种族成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根据《时代》杂志1991年7月8日一期的报道,自从1965年的美国移民法改变过去有利于欧洲移民但却限制其他大陆移民的歧视条例之后,第三世界国家入美的移民急剧增加。从1980—1990年的十年间,白人在洛杉矶县就由多数变成了少数。在这十年间,西班牙裔美国人增长了53%,达到2240万,占美国总人口几近10%。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所在的达德县,学校的学生来自全世界123个国家。(5) 在笔者看来,此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本世纪人类的自我意识由于科学技术,尤其是信息的扩张,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加强。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曾经使欧洲人发现了自我,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使他们认识了自我。我虽然不敢肯定现在的美国是否是个所谓的后工业社会或后资本主义社会,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即今天界定这个国家里人际关系(男女之间、种族之间、贫富之间、异性恋与同性恋之间等)的基本因素(财富、权力、等级、身份、肤色等等)已经今非昔比了。世界范围内民族解放运动的持续高涨和独立国家的增多,本身固然体现出以肤色和文化传统为标志的群体,日趋

强烈地寻求自我表达的形式,但也证明,组成这些独特群体的个人已经首先感到了自身存在的价值。更由于美国是个由移民组成的国家,世界各民族在 20 世纪的复兴,进一步反馈到美国种族关系的磨擦和溶混之中。西方资本主义当代流行文化的绝大多数表现方式,都以群众性参与为特征,有别于二战前文艺为少数人占有,多数人被动地欣赏或接受教育的模式。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造就了它所不能容纳的“大众社会”。这个矛盾将在宏观上决定着所谓西方民主制国家未来的发展趋势,美国也不例外。

注释:

- (1) *Hudson Review*, Spring 1991, p. 9.
- (2) Howard University, 1967 年专门为黑人子弟建立的大学,地点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 (3) *The Atlantic Monthly*, March 1991, p. 52.
- (4) 西方政治学对“革命”(Revolution)一词的严格界定,可参见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译本(王冠华等译,沈宗美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9 年版)第五章第一节《通过革命实现现代化》,第 241—242 页。
- (5) 波士顿大学现代外国语言系教授 Roger Shattuck 语,见 *Harper's Magazine*, September 1991, pp. 49-51.
- (6) *The Atlantic Monthly*, March 1991, p. 53; 又见 *Harper's Magazine*, September 1989.
- (7) *The Atlantic Monthly*, March 1991, pp. 52-53; *Time*, July 1991, p. 12; *Harper's Magazine*, September 1989, p. 43.
- (8) *The Atlantic Monthly*, March 1991, p. 53.
- (9) *Partisan Review*, No. 2, 1991, pp. 350-377; *Harper's Magazine*, September 1991, pp. 43-52.
- (10) Thomas Sowell, *Ethnic America: A History*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pp. 99, 223.
- (11) Stanley I. Kutler, ed. *The Supreme Court and the Constitution: Readings in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History*, 3rd Edition (New York, W.W. Norton Company Ltd., 1984), pp. 688-696. 关于“肯定性行动”计划在美国引起的争论(至今仍在进行),可参见 Robert K. Fullinwider, *The Reverse Discrimination Controversy: A Moral and Legal Analysis* (Rowman and Littlefield, Totowa, New Jersey, 1980).
- (12) (13) *The Atlantic Monthly*, March 1991, p. 54.
- (14) 性爱方向(Sexual Orientation)一词,对一般中国读者大概还比较生疏,此种译法是否妥当,亦可进一步推敲。该词指人类性爱的选择对象,即同性恋(Homosexual)和异性恋(Heterosexual)。在有些场合(主要在欧洲和拉美、东南亚)也包括异装恋(从着异性服饰的同性对象获得性满足,又称妖人恋)。美国的同性恋基本上被认为是生理问题而非道德问题,故是合法的。男女同性恋者是争取民权的强大势力。歧视同性恋者被认为是偏见。
- (15) (16) (17) (18) (19) *The Atlantic Monthly*, March 1991, p. 55; p. 58; pp. 62-64; p. 55; p. 55.
- (20) *Partisan Review*, No. 2, A Special Issue, 1991, pp. 336-337. 另见 *The Atlantic Monthly*, March 1991, p. 67.
- (21) *Time*, July 8, 1991, p. 12.
- (22) 见 John A. Scott, *Living Documents in American History* (Washington Square Press, Inc., New York, 1963), pp. 167-168. Scott 在此处详细地说明了大陆会议删除杰佛逊文本中关于贩卖奴隶和奴隶制度违反人权的条款的历史原因,并将杰佛逊当初提交大陆会议的

原稿刊出,以供读者对照阅读。

(23) 见 *Time*, July 8, 1991, p. 9. VOA 和 BBC 1991 年 10 月 12、13 日分别对此进行了专题报道。

(24) Samuel Morison, Henry Commager and William Leuchtenburg,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22-23. 又见约翰·霍普·富兰克林著:《美国黑人史》(*From Slavery to Freedom: A History of Negro Americans*), 商务印书馆 1988 年版,张冰姿等译,宋以敏等校,第 54 页。

(25) (26) *Time*, July 8, 1991, pp. 12-13.

(27) James Paul Allen and James Turner, *We the People, An Atlas of American Ethnic Diversity* (New York, McMillan Company, 1988), p. 312.

(28) *Time*, July 8, 1991, pp. 11-12.

(29) *Time*, July 8, 1991, 又见《文汇报》1991 年 9 月 2 日第四版。

(30) *Hudson Review*, Spring 1991, p. 13. 另见 *Time*, July 8, 1991, pp. 10-12.

(31) 威廉·曼彻斯特:《1932—1972 年美国实录》,商务印书馆 1988 年版,朱协译,塑望、董乐山、关在汉校,第 1677 页。

(32) (33) *Hudson Review*, Spring 1991, p. 28.

(34) *Time*, 1991, 又见《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1992 年 2 月 10 日一期第 19 页。

(35) 围绕克拉伦斯·托马斯任命一事,1991 年 10 月份美国新闻媒介有大量报道。《人民日报》10 月 17 日、《文汇报》10 月 30 日亦有评论。

(36) (37) *Newsweek*, August 12, 1991, p. 31.

(38) *The Atlantic Monthly*, March 1991, p. 52. 另见英国 *Economist*, Oct. 26, 1991, Michael Elliot, "American Survey", p. 16, 及《时代》周刊 1992 年 2 月 3 日一期第 34—39 页。

(39) 可参见沈宗美:《美国种族问题的若干历史思考》,《南京大学学报》1991 年第 2 期。

(40) *Hudson Review*, Spring 1991, pp. 15-17.

(41) 此节内容主要参考发表在 *Newsweek*, Sept. 23, 1991 年一期刊出的四篇专题报道,即 Jerry Adler 与 Howard Manly, Vern E. Smith 及 Farai Chideya 等人撰写的"African Dreams", Sharon Begley 及 Farai Chidleya, Larry Wilson 和 Debra Rosenberg 撰写的"Did the West Begin on the Nile Bank", Molef Kete Asante 写的"Putting Africa at the Center", Henry Louis Gates, Jr. 写的"Beware of the New Pharaohs"。见该刊此期第 46—52 页。关于 Bernal 的 *Black Athena*, 可参见《泰晤士时报》的文学副刊(TLS) 1991 年 10 月 18 日第 4620 期。

(42) (43) *Partisan Review*, No. 2, A Special Issue, 1991, pp. 317-318.

(44) *Partisan Review*, No. 2, A Special Issue, 1991, pp. 284-286.

(45) *Newsweek*, September 23, 1991, p. 46.

(46) *Time*, Oct. 19, 1991.

(47) *Hudson Review*, Spring 1991, pp. 26-27. 又见 *The Atlantic Monthly*, March 1991, p. 78.

(48) 转引自 Denish D' Souza 写的"不自由的教育"(Illiberal Education),载 *The Atlantic Monthly*, March 1991, p. 78.

(49) *Newsweek*, September 23, 1991, p. 48.

(50) 转引自 *Harper's Magazine*, September 1989, p. 43.

(51) 该处转引自约瑟夫·艾普斯坦《学术动物园:实践中的理论》, *Hudson Review*, Spring

1991, pp. 23-24.

(52) *Hudson Review*, Spring 1991, p. 17. 另见 *The Atlantic Monthly*, March 1991, pp. 70-71, 及 *Time*, April 1, 1991, pp. 47-48.

(53) *Partisan Review*, No. 2, A Special Issue, 1991, pp. 315-316.

平庸与浪漫

——读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

赵 梅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美国现代作家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 (F. Scott Fitzgerald, 1896-1940) 的代表作《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 1925) 描写了 20 年代美国富人的生活, 此时的美国经济处于相对稳定繁荣时期, 这个时代被追求个人奋斗、发财致富的“美国梦”所笼罩, 菲茨杰拉德认为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会纵乐、最绚丽的时代”, 是“爵士乐时代”。(1) 及至 50、60 年代, 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麦卡锡主义的盛行、肯尼迪遇刺, 这一系列事件, 使一些美国人不满意社会现状, 但他们又缺乏理想, 不思进取。在文学上出现了几部反文化、特别是反对中产阶级价值观的文学作品, 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塞林格 (Jerome D. Salinger) 的《麦田里的守望者》(*The Catcher in the Rye*, 1951)、杰克·凯鲁亚克 (Jack Kerouac) 的《在路上》(*On the Road*, 1957) 和艾伦·金斯堡 (Allen Ginsberg) 的《嚎叫》(*Howl*, 1956)。两个时期的作品代表了两种文学思潮、两种价值观念。作品中的人物截然不同, 前者奋发向上、始终追求, 后者酗酒、吸毒、颓废, 史家称之为“垮掉的一代”。但令人吃惊的是, 像霍尔顿·考尔菲尔德 (Holden Caulfield) (2) 这样一位四次被学校开除, 对文学、电影特别讨厌, 认为那些东西“假模假式”, 甚至讨厌海明威作品的少年, 他最喜欢的书却是《了不起的盖茨比》。(3) 这不能不使人感到这部小说有着一种超越时代的、引人注目的特质。

—

《了不起的盖茨比》是一部充满了被扭曲的浪漫情调的悲剧性作品。小说所讲述的爱情故事撼人心魄, 使人深深地感受到一种诗意化的古典情怀, 一种只有 18、19 世纪的西方文学才有的浪漫气息。然而, 这部作品不同于古典作品的特质在于它有一种强烈的反浪漫倾向, 诗意化的笔触常因平庸的现实而变得冷酷、扭曲。小说中人物对金钱的贪婪、对纵情享乐的迷恋, 以及唯利是图的狡黠、不择手段的残忍、不负责任的自私……都是如此平庸和丑陋的, 这一切加上带有浓重忧郁、压抑色彩的景物描写, 使人感到浪漫的情感是那么令人神往的超脱, 但又无可奈何地在平庸中被亵渎、扭曲, 直至被毁灭。浪漫是对平庸的超越, 平庸是对浪漫的亵渎, 当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情调难解难分地纠缠在一起时, 便构成了《了不起的盖茨比》的特色。而这一特色鲜明地体现在小说的主人公盖茨比身上, 从他第一次出场到他代恋人而死, 作家始终用两种鲜明的对比色调讲述着主人公的故事。

在小说的第一章, 尼克 (Nick Carraway) 是这样评价盖茨比的:

……盖茨比，他代表我所真心鄙夷的一切。……它是一种异乎寻常的永葆希望的天赋，一种富于浪漫色彩的敏捷，这是我在别人身上从未发现过的，也是我今后不大可能会再发现的。〔4〕

小说的最后一章，还是尼克对盖茨比一生的感慨：

当我坐在那里缅怀那个古老的、未知的世界时，我也想到了盖茨比认出了黛西的码头尽头的那盏绿灯时所感受到的惊奇。他经历了漫长的道路才来到这片蓝色的草坪上，他的梦一定似乎近在眼前，他几乎不可能抓不住的。他不知道那个梦已经丢在他背后了，丢在这个城市那边一片无垠的混浊之中不知什么地方了，那里共和国的黑黝黝的田野在夜色中向前伸展。

一个具有诗人气质的青年人的梦消失了，破灭了，现实的庸俗吞噬了理想的浪漫，孩童般的单纯被织进用金钱铸造的社会中，苦苦挣扎是徒劳，梦粉碎之后只留下“恶浊的灰尘”。

那么，盖茨比的梦是怎样破灭的，难道仅仅是由于黛西（Daisy）的无情和庸俗吗？不，粉碎这梦的正是他自己。在他身上，执着的爱之梦和所爱的对象以及实现梦的手段之间形成了难以调和的尖锐的冲突。

一方面，盖茨比第一次见到黛西之后就深深地爱上了她，但这次爱的占有是以欺骗为手段实现的。黛西厌恶贫穷，她在乎的不是感情而是金钱和财富。为了得到她，他谎称自己有百万家财。当黛西发现他一文不名时，就抛弃了他，嫁给了一个俗不可耐却既有地位又有财富的富家子弟汤姆·布坎农（Tom Buchanan）。这对盖茨比无疑是致命的打击，也是金钱对感情的戏弄。但盖茨比是坚强的，并没有因此沉沦，他发誓要重新得到黛西，他全部生活的目的仅仅在于此。为了这份爱，他肆无忌惮地、不择手段地聚敛金钱和财富；在黛西家遥遥相对的地方租下宫殿般豪华的房子，每晚凝视着黛西家的那盏绿灯；他公开、直率地向黛西的丈夫布坎农挑战，说“她不是你”；他宁愿替黛西受过，最后替她去死。盖茨比记着他与黛西那短暂的相处时的每个眼神、每种声音、每个场景、每个动作。他永远铭记那星光迷离夜晚的吻。这一吻，铸成他终生追求的起点，成了他为之生、为之死的梦：

当黛西洁白的脸贴进他自己的脸时，他的心越跳越快。他知道他一跟这个姑娘亲吻，并把他那些无法形容的憧憬和她短暂的呼吸永远结合在一起，他的心灵就再也不会像上帝的心灵一样自由驰骋了。因此他等着，再倾听一会那已经在一颗星上敲响的音叉。然后他吻了她。经他的嘴唇一碰，她就像一朵鲜花一样地为他开放，于是这个理想的化身就完成了。

这种浪漫的、执着的、全身心陶醉的爱，其痴迷和纯洁犹如婴儿第一眼看世界的眼光。这种爱在现代社会中已不多见，它带有西方 18、19 世纪的理想色彩，好像歌德笔下的痴情少年维特。

另一方面，盖茨比对黛西的这份纯情所面对的是混浊的世界。在那里，金钱成为至高的价值尺度，一切都染上了铜臭气，爱也不例外。黛西就是金钱的象征，连她的声音中都“充满了金钱”。盖茨比要想获得她，实现自己的爱之梦，就必须把自己投入平庸的金钱现实中，用现实的价值标准来满足对方的要求，得到黛西的唯一方法就是付出金钱，拥有财富。这种爱与所爱的对象、追求爱的理想与追求爱的手段之间的分离、对峙，决定了盖茨比追求爱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择手段地追求金钱的过程，人类最圣洁的爱无能为力地屈从于金钱，从而使之商品化、庸俗化、邪恶化。不论盖茨比内心多么圣洁，但他的行为已经对他的爱进行了最残酷的自我毁灭。

关于盖茨比的发财过程，作家没有正面叙述，只是通过其他人的议论略显一二。但是，寥寥的几笔就已经明确显示出，盖茨比的财富沾满了丑恶、欺骗、残忍，甚至还有人的生命。他发迹归来后，时刻处在金钱的包围中，为了赢得黛西，他不仅在五年后与黛西见面时倾其家财显示他的富有，而且向所有人炫耀其富有。他的住宅宫殿般豪华，每天都用丰盛的食品、香槟酒、橙汁、柠檬汁款待络绎不绝的客人。他还有远远超出家庭需要的乐队，为每晚的大

宴宾朋助兴。他灯光通明的住宅成了热闹的社交中心。每晚的宴请结束后，八个仆人和一个园丁要苦干一天来收拾残局。而这一切最最平庸的行为恰恰是为了追求一种神圣的感情，这难道不是盖茨比的自我讽刺吗？难道目的高尚就可以不择手段吗？悲剧在于，他别无选择。表面上看，他发迹了，但在骨子里，他失败了。退一步讲，假定他追求黛西成功了，他的爱就圣洁吗？绝不，即便他与黛西结婚，也是由于财富，而不是爱。黛西所看重的根本就不是盖茨比的爱和浪漫气质，而是金钱和社会地位。

二

平庸与浪漫矛盾也表现在盖茨比和黛西这两个主要人物的内在与外在的分裂上。盖茨比的内在浪漫和外在的平庸之间、黛西的外在浪漫和内在平庸之间的巨大反差，形成了作品的一种奇妙的整体效果：盖茨比的内在浪漫征服不了黛西的外在浪漫（美），盖茨比的外在平庸却征服了黛西的内在平庸。

尽管作家在许多地方用浓重的笔墨写盖茨比的富有、挥金如土，写他家中的繁华和热闹，但在内心深处，盖茨比极为孤独，他与这种富有、热闹格格不入，像一座汹涌澎湃的大海中寂静的孤岛。这种内在的孤独充分显示了盖茨比的浪漫气质，与他对爱的始终如一的追求有种内在的契合。他的金钱和慷慨使他处在人群的献媚的包围中，但他常常远离这些人群，沉浸在个人的内心冥想中。作家在两处用点睛之笔表现了盖茨比的孤独。而这两处的背景描写都是灯火辉煌、人声鼎沸、欢歌笑语、杯盏交觥的社交场合，而且都是盖茨比本人的住宅中。

第一次是当尼克还没见过盖茨比，只惊奇于他的邻居的豪华和富有时：

……五十英尺之外一个人已经从我邻居的大厦的阴影里走了出来，现在两手插在口袋里站在那里仰望银白的星光。从他那悠闲的动作和他那两脚稳踏在草坪上的姿态可以看出这就是盖茨比本人……

……他朝着幽暗的海水把两只胳膊伸了出去，那样子真古怪，并且尽管我离他很远，我可以发誓他正在发抖。我情不自禁地朝海上望去——什么都看不出来，除了一盏绿灯，又小又远，也许是一座码头的尽头。

盖茨比孤身一人站在海边眺望的，正是黛西的家。

第二次盖茨比孤独地出现，是在经过层层铺垫之后。作家开始大书特书盖茨比住宅的豪华、晚会的热烈以及人们对盖茨比的议论。有人说他杀过人，有人说他当过德国间谍，有人说他谎称毕业于牛津大学……总之，来盖茨比这里寻欢作乐的人，大都认为盖茨比的财富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获取的。而在人们的议论、猜测中的盖茨比，在音乐弥漫、人声喧闹的大型宴会上的盖茨比则孑然一身，孤独地远离热闹的人群，他仿佛厌恶这喧嚣的世界，只喜欢陶醉于自己孤寂的冥想中：

……盖茨比一个人站在大理石台阶上面，用满意的目光从这一群人看到那一群人。他那晒得黑黑的皮肤很漂亮地紧绷在脸上，他那短短的头发看上去好像是每天修剪似的。随着沆瀣一气的欢闹的高潮，他却变得越发端庄了。

盖茨比奇怪的行为来自于他内心的孤独，他所追求的真正价值——爱情——与这个逢场做戏、及时行乐的世界格格不入。当然，对于盖茨比来说，财富与爱情毫无疑问是不可分割的，它们共同构成了盖茨比追求的梦。但盖茨比真正“了不起”的是，在他心目中，财富不能取代、更不能超越爱情。可以想见，盖茨比的内心世界是多么孤傲，而他的外在世界又是多么的平庸。在这里，热烈与平静、群欢与孤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重要的是盖茨比内在的孤独在他进入坟墓之后，就再也没有外在繁闹的烘托了，为他送葬的只有他的父亲、他的一个朋友和牧师三个人，冷清的葬礼与昔日热烈的家宴形成了令人心酸的对比，那些昔日追逐着盖茨比财富的人们此时统统不见了。他为之死去的黛西，却毫不动心地继续过着她的及

时行乐的生活，对盖茨比之死连一点内疚之情都没有，就更不要说对那份爱的怀恋了。

与盖茨比外在的平庸与内心的浪漫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黛西的外在浪漫与内心的平庸。黛西是个漂亮、光彩四溢的女人，她有着美丽的外表、动人的眼神、诱人的嗓音，她的声音能使所有男人为之倾倒。

这是那种叫人侧耳倾听的声音，仿佛每句话都是永远不会重新演奏的一组音符。……她声音里有一种激动人心的特质，那是为她倾倒过的男人都觉得难以忘怀的：一种抑扬动听的魅力，一声喃喃的“听着”，一种暗示……

如果不深入黛西的内心世界，单凭她的外表，她该是一个多么富有诗意的女人，仿佛所有的阳光都集中在她的身上，她的美足以感动一切。但她却嫁给了一个平庸乏味的富人。从此黛西便在百无聊赖中及时行乐、纸醉金迷，除了金钱和享乐之外再无其他。这是一个空洞的灵魂，而它却安卧在一副美丽的躯壳内。

黛西的平庸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她同样是地位与财富的牺牲品，她的平庸是在金钱世界里人的异化的象征。盖茨比最初遇到的黛西并非像五年后的她那样，盖茨比在她心中唤起过爱情，但她最终经不起财富与地位的诱惑。在充满势力与金钱的环境中，黛西不可能不堕落，而只剩下了美丽的躯壳。

黛西和布坎农结婚后，早已忘记了旧时恋人盖茨比，谈起他来犹如一个陌路人。但当盖茨比腰缠万贯地出现在她面前时，她突然旧情萌发，号啕大哭。但这绝对不是对感情的怀恋，而是对失去的财富痛心疾首。在盖茨比的狂热追求和他巨大财富的吸引下，黛西又与盖茨比约会，并答应离开不忠实的丈夫。但当她知道盖茨比用不正当手段挣来的财富没有稳定的根基时，她又离开了盖茨比。最后冷酷到盖茨比为她去死她都无动于衷的程度。正由于这种平庸的心灵，使她的声音变质：

她的声音充满了金钱。

……这正是她声音里抑扬起伏的无穷无尽的魅力源泉，金钱丁当的声音，铙钹齐鸣的歌声……

金钱，这个在现实世界中主宰一切的东西，其渗透力无所不及，它吞噬了盖茨比的浪漫气质和爱之梦，扭曲了黛西的美，使诗意平庸化，仿佛任何真善美都不足与金钱的力量抗衡。在金钱的世界里，没有浪漫、没有理想，而只有平庸。

三

常有评论认为，《了不起的盖茨比》是菲茨杰拉德对美国“爵士乐时代”的概括性论述，盖茨比的追求和失败标志着“美国梦”的幻灭。（5）我赞同这种观点，同时我以为，这部作品还有着更深层次的含义，它超越了19世纪20年代的“美国梦”。确切地说，菲茨杰拉德在这部小说中既揭示了“美国梦”与生俱来的缺陷：它的冷酷无情；同时又向人们展示了那种超越了具体的现实、追求浪漫情怀的古典的梦。在盖茨比的理想之梦中，既有显赫的地位，也有人类亘古以来始终追求的爱情之梦，这两者的结合构成了盖茨比向往的完美生活。悲剧在于这两者的结合在美国的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存在的。当盖茨比通过个人奋斗，得到了财富与地位之后，实际上他已置身于一个纸醉金迷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没有感情，只有物欲。跻身于这个世界之后的盖茨比，试图最后完成他的理想之梦，便注定要付出代价、直至生命，因为他的追求超越了这个世界。而这种追求不被这个世界所理解，只被其所抛弃。或者说，在这部小说中，破灭的不是追求财富和社会地位的“美国梦”，而是人类亘古以来一直追求的梦——爱的梦、理想的梦。如果仅从崇尚个人奋斗、发财致富这种一般意义上的“美国梦”来讲，盖茨比无疑是成功了，他拥有了人人羡慕、甚至嫉妒的财富，过上了上流社会的体面生活。然而，正是当他的金钱梦变为现实之时，他的爱之梦却化为泡影。他的死

与财富无关，仅仅是为了爱。

对理想的追求、对爱情的渴望，不仅只是披荆斩棘来到“新大陆”的美国人所有，而是人类所共有的。无论理想之梦多么脆弱，但是人类不能没有它，不能放弃对它的追求。这个梦超越一切民族的、时代的、阶级的价值观念，成为人类的精神追求和神圣价值的象征。在尘世上，理想与现实之间、浪漫与庸俗之间的搏斗，往往以前者的失败和后者胜利而告终。但是人应该有那种明知不可为之而为之的坚韧和执着的情怀。有了这种情怀，平庸的世界中才可能具有色彩和声音。“这部小说的重心放在幻象的幻灭上——正是这种幻象才使这个世界那么鲜艳，你不必理会事情的真相，只要它们沾了那份魔术性的光彩就行了。”〔6〕

盖茨比死了，他的财富也化为乌有。但他的梦真的破灭了么？不，长眠于地下的盖茨比不会认输，他的灵魂还活着，梦还活着，不论结果如何，生生死死都要为之奋斗：

盖茨比信奉这盏绿灯，这个一年年在我们眼前渐渐远去的极乐的将来。它从前逃脱了我们的追求，不过那没关系——明天我们跑得更快一点，把胳膊伸得更远一点……总有一天……

这份坚韧、顽强，这种以生命为代价的追求永远值得人类尊重。无怪乎以写“硬汉子”闻名的海明威对《了不起的盖茨比》赞叹不已。〔7〕盖茨比对爱的执着，就像海明威笔下的那个与大海搏斗的老人一样坚韧，两者之间共有一种内在气质上的浪漫——追求、搏斗、失败，哪怕永远失败，也决不屈服。人可以失败，但是永远不会被打败，海明威的这句名言言成了盖茨比精神的最佳注脚。

注释：

〔1〕 F. Scott Fitzgerald, "Echoes of the Jazz Age", *The Crack-Up with Other Pieces and Stories*, Penguin Books, 1981, pp.9-19.

〔2〕 霍尔顿·考尔菲德是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主人公。

〔3〕 J.D.塞林格著，施咸荣译：《麦田里的守望者》，漓江出版社1983年版，第178页。

〔4〕 本文《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引文均引自菲茨杰拉德著，巫宁坤译：“了不起的盖茨比”，《菲茨杰拉德小说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并参阅 F. Scott Fitzgerald, *The Great Gatsby*, Charles Scribner's Son's, New York, 1953。

〔5〕 参阅何欣：《二十世纪美国小说家》，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民国72年版，第262—266页；董衡巽：“‘美国梦’的寻求与幻灭——评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美国现代小说家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25—139页；毛信德：《美国小说史纲》，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第455—456页；潘绍中：“‘美国梦’的诱惑与破灭——从菲茨杰拉德的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谈起”，《美国研究》1991年第4期；马库斯·坎利夫（Marcus Cunliffe）：《美国的文学》（*The Litera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下卷，美国大使馆文化处1983年版，第270页。

〔6〕 菲茨杰拉德语，转引自何欣前引书，第266页。

〔7〕 Ernest Hemingway, *A Moveable Feast*, Charles Scribner's Sons, New York, 1964, p.176.